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政治家卷

罗斯福

盛震江编著

Luosifu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的政治家之一，是举世无双的一连四任当选的美国总统。他自 1933 年上台后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即是所谓的“新政”，克服了美国多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缓和了该国的各种矛盾。在他执政的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特别是从 1941 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到他 1945 年 4 月间辞世，他亲自领导了美国彻底粉碎德、意、日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为世界各国作出了伟大贡献。

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辞世，就像家中一个亲人的病故，除了他，他们记不得别的总统了。在他之后，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像他那样支配过他们的生活。他的面孔占据着报章、杂志和影院放映的新闻短片及其他媒介，在大萧条的最困难时期，大部分人全靠“新政”给予的救济才得以免于饥馑。

罗斯福的名字虽然仍旧唤起某些人的缅怀之情，但“新政”所激起的感情之火却基本熄灭了。对于年纪较轻的美国人来说，罗斯福不过是这时的电影剪辑中的一个人物，他们几乎不能理解他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所引起的那种热情。关于罗斯福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我国也有美国早年出版的关于罗斯福传略的译本，但当时罗斯福逝世不久，中国发表的资料不多，原作者难于作出全面的阐述与评价。因此，这本书就在于为现代的读者再现罗斯福的形象，一个公正而坚定的人物的真实形象。特别是，这本书试图表明，这个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认为不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乡绅，他怎样成为所有维护精神文明的价值观念的人所信赖的人物，怎样为美国百姓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罗斯福

第一章 童年

1882年1月30日，在斯普林伍德庄园里，一个呱呱落地的男婴，睁开眼睛看着面前的陌生世界，他就是日后成为一代伟人的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和他的母亲萨拉·罗斯福并不想让自己的独生子去从事政治活动。竞选公职不是士绅的职业，尽管詹姆斯的远亲西奥多在1880年被选进州议会时曾使家人吃了一惊。实际上，在生这个孩子的前一年，詹姆斯就曾跑到纽约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去阻止他的乡亲提名他当国会议员。“在富兰克林年轻时你是否想到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总统吗？”他的母亲有一次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最不希望他当总统，或者担任任何一种公职。”她希望他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当个乡绅，甘愿在赫德森河畔过宁静的生活。“我所能为我们的儿子考虑的崇高理想是长大后像他父亲一样耿直诚实、公正仁慈，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人。”

大概没有一个美国总统的童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童年那样幸福和安定。“他是在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多年以后他的姑妈这样说。赫德森河的贵族对各种不幸都默然不予注意。这些人从来不谈金钱，也不谈论社会抱负——虽然二者都被视为准则。文学艺术和戏剧中的新东西被看成是鲁莽的东西，不予以讨论。商人们毕恭毕敬，规规矩矩。这里有的是好客之情、一群一群的马匹与猎犬，真是一个舒适的天地，生活像赫德森河一样从容不迫地流逝。

当时还不曾有儿童心理学，这个孩子的妈妈亲自负责抚育工作，她执行一则旨在“使富兰克林的心灵纯洁高尚”的计划；“但……在做法上使富兰克林从未意识到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这项计划似乎很成功，因为他健康、快乐，而且听话。除了在他7岁时害了一场伤寒外，几乎没有患过什么大病。

由于没有兄弟姐妹跟他争夺父母的宠爱，富兰克林成了他们的小天地的核心。他们不想宠坏他，他的生活受到了严格的、深情的管束。五岁以前，萨拉一直让他留着垂肩的金色卷发，穿着童装，以后又坚持要他穿她的祖先默里族特有的苏格兰式短裙，短裙前配有毛皮口袋，头戴典雅的苏格兰高地式帽子。快到8岁时富兰克林才说服母亲给他买了几套英国海员式的服装。在整个童年，他都必须符合母亲规定的各种标准，甚至在他当了总统后，天气寒冷时她还时常提醒他穿得暖和些或穿上御寒的套鞋。萨拉和富兰克林之间存在着一种温暖而体贴的关系，她给予他以安全感和充分的自信心。

虽然富兰克林对母亲特别依恋，父母并没有在博取儿子欢心方面偏于溺爱。富兰克林把自己的父亲当偶像来崇拜。詹姆斯按年龄可当这孩子的祖父，但他喜欢同孩子亲近，对孩子所提的问题从来不感到厌烦或不屑置答。萨拉说过：“他爸爸从来不笑他，对他经常表示赞许。”有一次萨拉觉得孩子有点捣乱，需加管教一下，于是就要丈夫来对付。父亲把富兰克林叫到一旁，说：“小心揍屁股。”詹姆斯在富兰克林身上花费了许多时间，教他骑马、钓鱼、游泳、驶船。冬季，他们到附近的山坡上往下滑行，他的叔叔约翰·罗斯福用在冰上滑行的船带他出去游玩。富兰克林确是一名出色的骑手，于是不久就得到一匹专用的强悍的威尔士种小马，有了这匹马，他就亲自照料和饲养它。在他8岁时，他就打扮得像是庄园的贵族少爷一样，跟着他父亲骑

马二十英里而面无倦容。

富兰克林的父母想给自己的子灌输一种服务精神和大方知礼的风度，而不汲汲于低卑的金钱利益。萨拉说，当时“家里的大人不让孩子们受到悲伤苦恼的影响”，罗斯福夫妇在教养他们的孩子时也遵从这一原则。詹姆斯认真安排自己的生活，定期去纽约照料自己的商务，但是他们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讨论金钱的事。

大海也与富兰克林结有不解之缘。他入神地听着外祖父沃伦·德拉诺讲述由德拉诺家人掌舵的快速帆船和捕鲸船以及探访先人故居的故事；在费尔黑文，他全神贯注地翻阅他发现藏在阁楼上的帆布封面的捕鲸船和商船的航海日志。他常去那伸进阿库什尼特河中的古老的石砌码头。显赫一时的新贝德福捕鲸船队的最后一支船队曾在这里随着潮水轻轻地颠簸，长长的桅杆高耸在花岗石建造的仓库的上空。布洛克兄弟（罗斯福家族奥伊斯特湾支系的亲属）的冒险事迹使富兰克林倍觉兴奋，他们曾在南部邦联的海军中服役，而且至今仍被这一家族的某些成员视为“海盗”。富兰克林萌发了到安纳彼利斯海军学院学习和从事海军生涯的梦想。

当富兰克林的身材还没有长到他父亲那只 51 英尺长的“半月号”纵帆船的驾驶盘那样高时，他已经在帆船上掌舵了，即使在刮风的时候也不例外。16 岁时他有了自己的小船，一只 21 英尺长的单桅快艇“新月号”。他驾驶这艘快艇勘探了芬迪湾多岩的海岸，附近有他们家的一所避暑别墅，坐落在新不伦瑞克的坎波贝洛岛上。在他出生后不久，罗斯福夫妇就开始到那里去，因为他们宁愿过岛上的简朴生活，而不愿看新港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交际旋流。许多年以后，当富兰克林当了助理海军部长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一带海岸的知识很有用处。他在乘一艘驱逐舰视察缅因州沿岸佛伦奇湾的海军设施时提出，由于自己熟悉这一带水域，可由他来驾船驶过坎波贝洛和大陆之间的危险通道。驱逐舰舰长小威廉·F·哈尔西海军上尉勉强同意让他来驾驶，可是担心这个“穿白法兰绒制服、驾过快艇的人”会不会把船撞在岩石上。哈尔西惊奇地发现罗斯福“很在行”，他把船安全地驶过了危险的海峡。

富兰克林还是一个热心的博物学家。他 11 岁时，父亲给了他一支小口径步枪，因为他已经答应不在巢居季节捕鸟，对赫德森河流域特有的每种鸟类最多只捕捉一只。捕集的飞禽的数量和种类愈来愈多，起初，这孩子试图自己来制作标本，但他对标本剥制技术不熟悉，于是就交给一位在行的人来做。沃伦·德拉诺看到外孙爱鸟，极为欢喜，于是给他弄到了一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终身馆员的资格。有一年夏天，这一张镶有金边的馆员证却在伦敦派上了出乎意料的用场。当时，富兰克林正随同自己的家庭教师阿瑟·邓珀去南肯辛顿博物馆参观精致的鸟类标本，而人们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对一般观众开放，盖因威尔士太子，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即将来到此地主持一个新建的侧所的落成典礼，人们只有凭一纸请帖方能入场。富兰克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乎掏出他的纽约博物馆馆员证悄悄地递给邓珀，邓珀就拿它在一个看门人的眼前晃了一晃，看门人望了一下证件，就挥手让这两个美

詹姆斯·D·布洛克和欧文·布洛克是西奥多·罗斯福出生于佐治亚州的母亲撒·布洛克的兄弟。詹姆斯曾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任南部邦联派驻欧洲的特务人员头目，曾监造“亚拉巴马号”和其他掠私船。欧文以海军学院学员身份在“亚拉巴马号”上工作。他们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未能得到赦免的为数甚少的南方人中的两个。

国人入场，于是他们就像来参观的要员似的受到了接待。

在童年时期，富兰克林很少与同龄的孩子在一起。他的半血亲的侄女海伦和半血亲的侄子塔迪，即是罗西·罗斯福的几个孩子，都住在附近，因此他有时就同他们一起玩耍。罗斯福家和德拉诺家都有许多孩子到过海德公园村，其中有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名叫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她是埃利奥特（富兰克林的教父）与其美貌的妻子安娜·霍尔所生的女儿。她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约莫小三岁，羞答答地吮着小指头站在大门口，直到这生龙活虎般的男孩开始为她表演逗乐，“他背着我……在保育室里爬着转圈儿”，她后来这样回忆说。但有些时候，富兰克林没有玩伴，当他跟着父亲骑马驶过在路旁玩耍的村童时，路人不知道他心中有何感想。其中一个村童后来说，他是“一个值得怜悯的人”，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同父母在一起度过的。

富兰克林的挚友叫阿尔奇·罗杰斯，他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同事阿奇博尔德的儿子，他们住在离他家一英里半路的克龙沃尔庄园。夏天，富兰克林同他在田野里漫步，亲如兄弟。1888年下过暴风雪，他们同在雪地里挖地道筑工事。第二年阿尔奇因患白喉去世了，这是富兰克林有生以来头一回接触到死人的事情。谁也不清楚这个孤单的小孩对自己的密友之死有何伤感。但是阿尔奇的弟弟埃德蒙现在成了富兰克林的玩伴。他们在铁杉树丛中搭起了一座巢屋，把它设想为驶向远方的一艘航船的甲板，然后他们放下一张木筏，随着木筏的下沉，他们的渔具也被带到了赫德森河的河底。当有客人来访时，富兰克林常爱随意地差遣自己的玩伴，萨拉见状后于是建议也应该让别的小孩来发号施令。富兰克林回答道：“妈妈，我若是不发号施令，那就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5岁时，富兰克林的英文已达到能给母亲写信的水平——但得有人帮他拼写单字。他亲手送陈的一封书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萨莉：

你患了感冒躺在床上，我很难过，我今天和玛丽玩了一阵子，我希望明天你能够起床而且高兴地说一声感冒好多了。

你的亲爱的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第二章 学生时代

1888年10月富兰克林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在那时罗杰斯一家请来了一位家庭女教师给他自己的小孩和富兰克林每天讲授两小时德语。富兰克林在那里学了一些基础德语，他对于德语的知识后来又在弗劳莱茵·莱因斯伯格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弗劳莱茵·莱因斯伯格是斯普林伍德庄园聘请来的第一位家庭女教师。富兰克林很快就能较熟练地讲德语，并用德文给他妈妈写信：“我要向你表明，我已能用德文写信。但我却没法进一步提高，以便使母亲大人真正高兴。”弗劳莱茵·莱因斯伯格是个一本正经、寡于言笑的女人，后来因病进了疗养所，由一位年轻的讲法语的瑞士人让·桑多斯来接替她。事实表明她是富兰克林最喜欢的老师。

在多年以后他写信给桑多斯老师说：“你在奠定我的学业基础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谁都大。”这一任务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富兰克林已不再腼腆害羞，而喜欢调皮捣蛋了。但是桑多斯小姐是一位有才能的教师，她曾告诉孩子的妈妈说，她坚信“富兰克林将来会出人头地”，在她管教年轻罗斯福的两年期间，她不仅给他奠定了法语和其他课程的扎实基础，而且还给这个很少接触当时严酷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学生灌输了一点点社会责任感。这在他写的一篇关于古埃及的流畅明快的作文中已初露端倪。富兰克林写道：“劳动人民一无所有，帝王们逼使他们辛苦地劳动，而给予他们的竟如此之少，真可谓伤天害理！他们濒临于饥饿，惨不忍睹！他们庶几衣不蔽体，死者不计其数。”

这个孩子不仅是一个勤奋的读者，而且接受知识很快。萨拉记得有一次给他朗读时，他却趴在她的脚旁专心致志地收集邮票，她蓦地合上书本严肃地说：“我想我根本没有必要再给你朗读了，反正你不在听我念。”为了证明母亲责备错了，富兰克林毫不迟疑地复述了母亲朗读的最后一段。当她表示吃惊时，他说：“妈，我若是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我会为自己害羞的。”

富兰克林读完供儿童阅读的书籍后，就在斯普林伍德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找书看。他喜欢看有关航海和海军方面的书籍。十几岁时他就读名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关于海军力量的书，他也喜欢阅读马克吐温、基普林和帕克曼的著作，他的求知欲望永无满足。他埋头阅读有插图的《伦敦新闻》，这些新闻向海德公园村展现了历代王朝统治下的欧洲的各个壮丽场面。在一个大雨如注的下午，他母亲发现他正靠在床上一页页地翻阅未经删节的韦氏大词典。这孩子也喜欢摆弄小机械和照相，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他的脑子就“像一个塞满了闪闪发光、互不相干的各类知识碎片的老鸦巢。”

富兰克林的世界知识是从阅读中获得的。到14岁时，他已随同父母8次去欧洲，多次旅居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随着詹姆斯·罗斯福年老体弱，一家人就越发频繁地去巴特瑙海姆的矿泉疗养院。1891年当富兰克林9岁时，他进了当地的学校念了六个礼拜的书，这是他在普通学校里读书的惟一经历。他给一个堂兄写信时这样说：“我与一群米老鼠去上公立小学。我们有德语阅读课、德语听写课、西格弗里德写的历史，还有算术课，我只学到笔算‘ 14×71 ’，我很喜欢这门课。”富兰克林对识读地图和军事地形学特别感兴趣，这两门课是最近按德皇威廉二世的命令在德国学校中设置的。德国教师评价他是一个“风姿翩翩、聪明过人的小家伙”，是“学校里大名鼎鼎的儿童之一”。

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个高级铁路职员，拥有自己专用的车厢，因此常常带着自己的儿子一同出差视察，远至威斯康星州的北部，那里有他的私人财产。1892年是詹姆斯官运亨通的一年，那时他被任命为纽约派驻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专员。他们一家人一走下专车，就有个车夫打扮的人前来迎接他们。“吉米堂兄，我是你的堂弟克林顿”，这个人说。原来他是罗斯福家族中迁往西部地区的一个支系的成员，现在他当了一家大马车行的老板，得到政府允许向前来参观博览会的官员提供运输工具。

富兰克林 5 岁时，詹姆斯曾带他到白宫去觐见自己的挚友克利夫兰总统。总统为了报答詹姆斯对民主党的支持，表示要亲自委派詹姆斯任驻荷兰的公使，但他谢绝了这项委任。令他由衷地满意的是，克利夫兰任命了他的曾给民主党捐献一大笔钱的长男罗西为美利坚派驻维也纳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后来由于再次捐献一万美元，他又被派往伦敦担任同样的官职。在少年富兰克林的记忆中，这位领袖的面容憔悴，心情忧郁。当詹姆斯和儿子起身告辞时，克利夫兰按着这个孩子的头说：“我的小朋友，我要向你表示一个十分奇怪的祝愿，祝愿你永远别做美国总统。”

萨拉·罗斯福一直把富兰克林留在自己身边照管，但到了 1896 年当他已有 14 岁时，她的丈夫终于说服了她，使她认识到现在应该送他上学校了。13 年前当富兰克林只有 1 岁时，他的双亲曾到波士顿以北大约 35 英里的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去拜访一位老朋友詹姆斯·劳伦斯。劳伦斯告诉他们那里正在筹建一所新学校，并且还向他们建议，等儿子够年龄时替他报名入学。他们很欣赏正在筹建的这所学校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的水平和他的赞助者 J·皮尔庞特·摩根等人的威望，于是在学校尚未开办以前就把富兰克林的名字登记上了。

1896 年 9 月，在全家人从欧洲返回祖国后不久，萨拉和詹姆斯凄然陪送富兰克林去格罗顿。他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夜晚，帮他打开行李，在备用的宿舍里把他的东西安放妥当，今后 4 年之内这里将是富兰克林的家了。他们把他托付给皮博迪牧师照管。他们回到斯普林伍德庄园后，他的妈妈记下了一则日记：“真舍不得离开我们心爱的儿子，詹姆斯和我都为这次离别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我身心都感到很好”，1896 年 9 月 18 日，富兰克林在父母把他留在学校后不几天从格罗顿给他们写信时这样说。在随后几个礼拜中，海德公园村收到了类似的信——“我和同学相处得很好……我没有受到警告，没有迟到或品行不端”——但格罗顿这所学校使这个孩子引起心灵的震动。他没有思想准备就脱离了家庭的抚爱和保护，投身到寄宿学校这种冷酷的环境中。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不再是学生羡慕的中心人物，而不过是一百名左右顽童中的一个。

富兰克林·罗斯福虽没有给格罗顿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学校却给予他长远的影响。他在那里度过了刻苦磨炼的四年，而且终生都与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保持着一种真诚的交往。在哈佛求学时，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他在格罗顿认识的年轻伙伴，他自己也定期去母校访问。在他结婚时，皮博迪主持了仪式，在他宣誓就任总统时，校长应邀到华盛顿来主持祷告式。他的四个儿子都进了格罗顿，而且多年来都是由他来颁发辩论优胜奖。此后多年内，罗斯福的许多老同学都把他称为“班上的叛逆”和格罗顿的理想的叛逆。但是正如他后来对皮博迪说的：“40 多年前你在老教堂讲道时谈到，在今后生活

中你不能摒弃儿时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格罗顿的理想——我尽力不把它忘记——目前你的话还铭刻在我的心中。”

除了自己的父母外，没有人比这位校长更强烈地影响着少年时代的罗斯福了。皮博迪精力充沛，真诚热烈，焕发出像他的好友西奥多·罗斯福所具有的那种刚劲有力的精神，他曾经邀请西奥多·罗斯福到格罗顿任教。他对待托他照管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他难以容忍对神学的精微问题提出质疑与论辩，他向他们灌输一种以其单纯见长的宗教信仰。正如为他作传的弗兰克·D·阿什伯因说的，皮博迪“具有一颗以绝对之神为满足的心灵，恐怕他未曾因为有必要证明上帝存在这一点而真正苦恼。”少年罗斯福很容易接受这种救世理想主义与朴素务实主义的混合物，而且终生都满足于遵行他从校长那里学来的背得烂熟的祈祷文。格罗顿的庄严的英国圣公会教义和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斯教义不要求有表面上的感情流露，这非常适合富兰克林那种想把内心思想和感情隐藏起来的本能。

在富兰克林成长的关键阶段，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皮博迪主宰着他的生活，人们不需要作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学家）式的揣测就可以推想到，他在这个孩子的心灵中已取代了他父亲的地位。而其生父则已渐入垂暮衰颓之年。富兰克林在当了总统后给皮博迪写信说：“在我性格形成时期，我有幸得到你亲手指引和你的风范的激励，我以此视为我一生的福祉之一……对于你赐予我的一切，我铭感五中。”

罗斯福通常被人们视为学习成绩平平的学生，但在格罗顿，他却总是名列前茅五位。课程内容有人文科学，老师的教法很呆板，虽然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国家领导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乎不讲授有关美国的课程。皮博迪和教师们极其卖劲地让孩子们熟习英文经典著作，每天晚上为他们朗读。在第一学年，富兰克林学了拉丁、希腊、英国和法国文学、希腊和罗马历史、代数、自然科学和神学。他的第一次成绩报告单雄辩地表明，按十分制评分标准他得了比较优异的平均分数——7.79分；在按时作息方面得了满分；在整洁方面得了9.68分。校长在备注栏中批写道：“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诚实的优等生。”

在格罗顿的这几年里，富兰克林一直遵循皮博迪教导的社会福音教义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和慈善事业。他被选进以在附近农村中主持礼拜仪式为宗旨的传教协会；协助开办照顾波士顿贫苦儿童的圣安德鲁斯儿童俱乐部，参与新罕布什尔州阿斯奎姆湖湖滨为同一目的而开设的夏令营的活动。有一年夏天他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夏令营主持人。传教协会曾指派他和另外一个男孩去照顾一位弗里曼太太，她是一个84岁的黑人妇女，是南北战争期间一名击鼓手的遗孀，他们的任务是每周去看她几次，看看她是否缺煤缺水，在暴风雪时要把她从积雪中挖掘出来。“他是一位可爱的老人，关照老人是一项愉快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顶好的消遣”，他向母亲解释说。

临近毕业时，富兰克林表示想考取海军学院，但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指出，作为独生子，他将负责看管一大笔遗产和承担其他责任，因此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攻读哈佛大学或是法学院，将是他未来要走的道路。此外，反正他已决定要实现格罗顿的“提前进修”计划，只需等待正式招为哈佛的新生。按照这项计划，富兰克林已经学了这所大学的15个学时的课程，这使他能够在三年内学完获得学士学位的各门必修课。

罗斯福在格罗顿的进修历程胜利结束了。在1900年6月25日的颁奖日，

他意外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丁文奖，奖品是 40 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他当时的心情是“高兴得无法形容的”。当他准备离开母校时，怀旧和欢乐之情油然而生。他在从格罗顿寄出的一封家信中写道：“进修的历程宣告结束，战斗已获胜利！”今天是一个多么欢快而又悲伤的日子。我辈再也不会再在母校出席朗诵会了，每一位同学都想再当一次一年级新生……”他获得的平均成绩是 B，校长在他最后的成绩单中这样批示：“始终是一个极为忠实的学生和本校的杰出的成员，我真舍不得离开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在格罗顿的表现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他决心在哈佛大学里尽量克服这个不足之处。他以西奥多·罗斯福所特有的那种投身战斗的冲天干劲和热情闯进了哈佛的大门，成了校园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积极参与社交、体育、政治和各种课外活动，最后当上了人人羡慕的校刊“红色哈佛报”的社长即主编。这种热情竟使那些现在左右着哈佛，以后还将从波士顿国家大街的董事室和律师事务所里对校务发号施令的懒惰成性的年轻人惴惴不安。

当 1900 年 9 月 25 日罗斯福从纽约来上学时，哈佛大学正处于黄金时代，当时的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是在美国推行自由选修课程制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哈佛大学已经当了 30 年校长，在他治理学校的最后十年内，这所学校就由一所小型的地方性大学变成了著名的高等学府。教员中有不少著名人士，例如乔赛亚·罗伊斯、威廉·詹姆斯、乔治·桑塔雅纳、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爱德华·钱宁、乔治·皮尔斯·贝克、乔治·莱曼·基特里奇和查尔斯·汤森·科普兰等。在大约 1750 名大学生中，既有犹太人和西部人的贵族阶级的纨绔子弟，又有为哈佛大学争光的优秀的外地人。这是绕着不同轴心旋转的两个天地，二者仅在教室里或运动场上有所接触。

富兰克林因为是罗斯福家族的一个成员，立刻受到了比康山和坎布里奇女服务员们的青睐，有些人认为他是那位英俊飒爽、当时正与麦金利搭伙竞选副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子。这个小伙子长得英俊迷人，就像是理查德·哈丁·戴维斯通俗小说中下巴方正的主人公，因此颇受“交际花们”的垂青。他自己备有一匹马和一辆汽车，没有一个周末他不去参加宴会、舞会和晚会。

西奥多·罗斯福这颗正在升起的明星也许已在召唤富兰克林来担任公职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富兰克林选读了特别适合于政治生涯的课程。他在五花八门的课程中选择了历史和政治作为主修课，而把英文和演讲作为副修课。他也学习拉丁文、法文、地质学 and 经济学——虽然他后来这样说：“我在大学里学了四年经济学，但教给我的全部知识都是错误的。”正如后来《哈佛校友简报》所描写的那样，这个课程表“决不轻松”。但罗斯福不是个学究。他对一位无吸引力的、近视眼的英国史教授的讲课感到厌烦，于是跟着班上的同学一个个从窗口和太平门溜了出去，他拜过哈大的许多名流为师，但是谁也没有激起过他的求知欲望。事实上，乔赛亚·罗伊斯的哲学课他只听了三个礼拜就放弃不学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大部分功课的成绩介乎 B 减与 C 之间，对于富家子弟来说这已算是挺不错的成绩；尽管他是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但那是荣誉称号而已，这一点与西奥多·罗斯福迥然不同，后者是在 1880 年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结业的。罗斯福的功课很重，而且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因此他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已是难能可贵了。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自此以后的几年里富兰克林也对自己在哈佛受到的教育感到不满，指责哈佛的教

员未能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用。他曾对莱恩罗普·布朗说过，他学的课程同哈佛大学以外的现实已经脱节，不少课程就“像是没有电线的电灯，你需要电灯是为了求得光明，如果你不能把电灯扭亮，那它就毫无用处了”。

罗斯福不想亲自把灯扭亮，因为他通常太忙于参加校外活动而无法旁顾自己的功课。但是，如果他对某门功课颇感兴趣，他也会聚精会神地攻读。美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门课；他在大学二年级中就曾以《新阿姆斯特丹的罗斯福家族》作为论文的题目。他写信告诉母亲说，“我一直在图书馆里查阅旧档案，但并无多大收获，请你替我摘录那本旧的荷兰文圣经上的所有资料，并且邮寄给我……我必须尽快获得这些资料。”他在论文中谈到这个家族的“进步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时说：

“罗斯福家族之所以具有活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民主精神。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可以游手好闲而取得成功。相反，他们觉得，正因为出身高贵，如果他们不能尽到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他们就会得不到原宥。”

富兰克林通过对本家族“真正的民主精神”的强调为他自己跻身于政界提供理论依据。这种精神被认为是民主的，并不是指与群众打成一片或主张人类的根本平等。相反，它带有杰斐逊主义的味道，即要求富贵人家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谋求福利，而不光是为了赚钱。富兰克林就是这样开始形成自己对于精神遗产的看法；这样一种看法加上西奥多·罗斯福的模范和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教导，推动了富兰克林去担任公职。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说过，查尔斯·汤森·科普兰是坎布里奇那些名士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特别是在演讲风格方面。她说她丈夫经常提到他和同班同学聚集在一起听尊敬的科普兰朗诵圣经和英文经典著作时的那种激情。科普兰的朗诵像演戏似的，“那样生动，那样忠实地传达原作，使得谁也难以忘怀”，与罗斯福同在哈佛学习的罗洛·布朗这样写道。科普兰也要求他的学生们朗读各自的论文。布朗补充说，虽然他们开头时总是一身冷汗，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舌头灵活了，“以致能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这一类练习极为有助于提高罗斯福的朗读和公开演讲的能力。

罗斯福读到一年级时父亲去世，终年 72 岁。詹姆斯·罗斯福多年以来就害着心脏病，在 1900 年的一年内病情不断恶化，因此他的去世并不出人意料。12 月初，正当詹姆斯同妻子住在纽约市西 43 街文艺复兴饭店时，他的心脏病再次严重发作。12 月 7 日，富兰克林和异母哥哥一同被叫到床前同父亲诀别。第二天詹姆斯一早就死了。“2 点 20 分，他在睡眠中去世了。当我写这一行字时，我不知道在他撒下我们后我今后该怎样生活”，伤心的萨拉在日记中倾吐着自己的心曲。詹姆斯给每个儿子留下了一笔 12 万美元的信用存款，每年约有六千美元的利息收入；斯普林伍德庄园及其余遗产归其遗孀所有；她在两年前当其父亲去世时已继承了将近 130 万美元的遗产。

富兰克林一回到哈佛大学，萨拉就感到斯普林伍德庄园一片寂静凄凉，苦闷异常。这时萨拉只有 46 岁，还得生活下去。她写道：“我想多干点事，但很难。我把富兰克林养的鸟儿全部放了出会……日复一日，日日如是。”20 年来，我把自己的爱均分给詹姆斯和富兰克林，现在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詹姆斯在遗嘱中要富兰克林“听从母亲管教”——于是她就承担起这个责任。萨拉把事务一安排就绪，就迁到波士顿，在靠近儿子的地方

租下了一间房子——“它离大学不太远，以便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可就近加以照料，同时也不太近，以免碍于他的大学生活。”

富兰克林有时在母亲的宅所举行联欢会，有时则又几乎忘记她的存在。她刚愎自用，总想控制自己周围的人们，包括富兰克林在内。姑娘们由于仰慕罗斯福家族的名望和富兰克林的容貌，争向这位英俊的哈佛大学学子靠拢，但她们都很讨厌他受母亲的控制。一些人认为他是“惟妈妈之命是从的孝子”，表面上的自信掩盖着永恒的稚气，并且说他的名字的首位字母“F·D·”是代表“羽毛掸子”〔feather dwsler〕，或者说是轻量级。

但是，这完全是对这个年轻人性格的误解。富兰克林尽管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总是对他百般体贴和温存，但他已经学会驾驭她了，仅在符合他的心意时才服从她的指挥，如不称心则只管听着，不与争辩，实际上还是我行我素。萨拉·罗斯福从未窥见到富兰克林心灵深处的秘密，即使间或发现一些不顺心的事，她也丝毫不在意。另外，富兰克林也并不是时常被人错怪的轻薄少年。他对不如自己幸运的人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是他父母和皮博迪一向给他灌输的，而且被一种高贵者对不幸者的同情心所增强。富兰克林继续为圣安德鲁斯儿童俱乐部的贫苦孩童服务，他在哈佛为救济关在南非英国集中营的布尔族妇女儿童发起过募捐运动。这项募捐活动引起了波士顿报刊对他的注意，错误地认为他是总统的侄子。有家报纸说他具有“许多像他叔父那样的出类拔萃的品质”；但是谈论他的高贵、富有和民主作风的言词听来令人难受。他说：“我对这类评论腻烦透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为在格罗顿时就学了大学课程，所以在三年中就进修完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但是为了在这一学期内当选为《红色哈佛报》主编，他必须继续在坎布里奇呆一个学年。因此在1903年9月他报名考进了研究生院，其目的不在于获得更高的学位，而只是为了争得主编的职位。“我的全部余暇都用在在这份报纸上”，他后来说。“我在大学里为从事公职所做的准备也许就是……办《红色哈佛报》。”

当时的《红色哈佛报》是一张有四个专栏、四至八页的小报。社论由主编执笔，其观点保守，对学校当局尊重，自在意料之中。青年富兰克林初次获得担任领导的机会，但他并非是一个打破现状者，因此对报纸的观点和内容并未作任何改变。对入学的新生，他宣传服务的道理，说一个哈佛学生负有“对这座大学，对它的班级和对自身的责任——履行这个责任的惟一道路就是永远踊跃积极。可显身手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他从体育运动一直讲到宗教活动，接着又补充说，“其他项目……定然有的是。”——甚至于包括学业在内。也许只有一篇社论是针对哈佛大门以外的那个天地的，这篇社论建议政治俱乐部勇敢地渡过查尔斯河，去考察茂密生长在波士顿的那片奇异的政治丛林。罗斯福写道：“由某个老手带一批人进去是不难做到的，这样在二天之内就可比听课获得更多的知识。”

但是，他写的许多社论却是专门谈论足球和爱校精神的。和他同住在一间房里的莱恩罗普是足球队队长，这可能是促使他选择这种题材的原因。罗斯福以其本家族所固有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号召体魄健全的学生出去锻炼，参加有组织的啦啦队去呐喊助威——在有一次比赛中他甚至担任了啦啦队队长，尽管当球队失利时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军事……教官……”似的对队员的“差劲表现”发起火来了。包括亨利·詹姆斯第二在内的一批读者对报纸的过分刻薄的批评感到不满，罗斯福于是就把社论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罗斯福写的最后一篇社论是针对哈佛校方的，他要求给哈佛大学的宿舍配备适当的消防设施。在社论发表后的第十三天，芝加哥的伊罗夸伊戏院失火，烧死了 588 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有一个人给主编寄来了一封不署名的信，暗示校方也同芝加哥的政府官员一样犯了渎职罪，罗斯福并未接受这个意见，大概是因为他深信只有改革者本身负起责任，改革才能取得成效。他以克制的措词继续要求给宿舍配备更多的消防设施。五月份这次活动终于获得了成功，更多的消防设施被安装起来了。

罗斯福曾在班长竞选中失败，但是他却能易如反掌地当选为班委会常任主席，因此，1904 年举行毕业典礼时，他便同显要人物一起坐上了主席台。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格罗顿的授奖典礼；因此他在毕业典礼结束后便立刻赶去参加。“你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实惠，因此我们有权利期望你们作出更大的贡献”，西奥多·罗斯福对列队站在格罗顿草坪上的学生这样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带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谛听这番话，因为他已经向总统的侄女埃莉诺·罗斯福求婚了。

第三章 爱情

谁能够说明男女爱情的神秘历程呢？粗略地看来，人世间似乎找不出比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更不相同的一对年轻人了。富兰克林潇洒英俊，热情奔放，雄心勃勃地去迎接生活。而埃莉诺向来都不流露自己的感情，自我描绘成一只“丑小鸭”。富兰克林能歌善舞，衣冠楚楚，是个很受女士垂青的人。埃莉诺严肃到了缺乏幽默感的地步，似乎在命中注定要忍受孤独的痛苦，认认真真地干一辈子活。在这位腼腆而性格含蓄的姑娘眼里，富兰克林准是一名开着笑口把利剑抛向空中的勇敢的骑士。

1902年夏天，他们第二次相逢。这次相逢之后他们的友谊发展成为纯洁的爱情。在沿着德赫森河岸疾驰的纽约市中心铁路公司的一列火车上，当富兰克林走过一节车厢时，看见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独个儿坐着，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的一位远房堂妹。他停步同她谈天，埃莉诺告诉他，她在英国念了三年书，刚刚回乡，此刻正前往那位住在海德公园村北面的蒂沃利的她外婆的庄园消暑。富兰克林挺喜欢和她聊天，在火车到达波基普西之前，他邀请埃莉诺到隔壁的一节豪华的车厢里去见他母亲。萨拉·罗斯福使这位少女看呆了。尽管她丈夫辞世已有一年半了，她却仍穿着黑色的寡妇服装，戴着长长的面罩。这装束特别惊人地突出了她那优雅的姿态。

在这次邂逅相遇之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常常在河边的乡间宅第或纽约市内举行的宴会或舞会上相会。他觉得自己逐渐被她吸引住了。毫无疑问，她的一部分吸引力在于她是美国总统的侄女。但她本人也挺聪明，长相似乎也有迷人之处。她体态优美，满头金发，眼睛闪现出令人迷醉的光辉。富兰克林本来对女人就富有吸引力，也喜欢和女人相处，他曾向几位姑娘调情。其中有他的表妹穆里尔·德拉诺·罗宾斯、海伦·罗斯福（他的侄女）、玛丽·纽博尔德，还有弗朗西丝·佩尔。在哈佛求学的时候，他与两位来自波士顿名门望族的姑娘多萝西·昆西及弗朗西丝·达纳常有往来。但是在他的日记中开始频繁地出现埃莉诺的名字。有一次，他同母亲一起到纽约去买圣诞礼品时，他悄悄溜走，“同埃莉诺一起喝茶”去了。

那年冬天，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华盛顿。特德叔叔邀请埃莉诺到白宫去度假。安娜·罗斯福·考尔斯夫人邀请富兰克林到北街1733号她家中去过新年。考尔斯夫人是埃莉诺的姑妈拜伊和萨拉·罗斯福的好朋友。拜伊钟爱自己的侄女埃莉诺，她大概猜到埃莉诺对富兰克林越来越感兴趣了。他被邀请到白宫和埃莉诺及艾丽丝·罗斯福一起饮茶。1903年元旦，他和家庭其他成员一起站在“内圈”中，入神地观看总统热情地与成千上万个祝愿的人握手。吃罢晚饭，他们一起去看戏。富兰克林在埃莉诺附近就座。当时他在一页日记中写道：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天”。

一个月以后，埃莉诺应邀参加在海德公园村举行的富兰克林21岁生日庆祝活动。以后，她又几次应邀到海德公园。那年夏天，当富兰克林从欧洲旅行回来后，她曾到坎波贝洛。他们在树林中长久地散步，一同驾帆船，一同野餐，晚间在炉火边一同读书，一同听故事。亲密的关系很快发展成为爱情。尽管他们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在许多地方却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是共同的美国社会的产物，接受过相似的教育，都有着相同的道德观念，对生活也有相同的看法。对埃莉诺说来，她对这样一位王子式的青年人醉心于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有点胆战心惊。很可能，生气勃勃的富兰克林使她想起了

她敬爱的父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她向他敞开了胸怀。

埃莉诺即便是在童年时代也显露出强烈的社会道德心，后来这种道德心成为既令人讨厌，又令人高兴的东西。她说：“我小时候就意识到在我周围有遭受苦难的男人、女人和孩童。”她父亲曾同她去看罗斯福家族创办的慈善机构，如在西18街上为无家可归和被遗弃的孩童兴建的报童住宅、纽约矫形医院等。埃莉诺说：“当然，我并不完全理解我所见到的许多事情，但我觉得这些事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我终生难忘。”一回到纽约，她就产生了要帮助那些不幸者的欲望，并且将它付诸于实践，加入了新成立的少年联盟。她被派往东南区里弗顿街上的安置区去给贫民窟的孩童教舞蹈和健美操。

像许多上层阶级的姑娘们一样，她在安置区工作与其说是去教育别人，莫如说是教育自己，因为这使她亲眼看到了都市里的穷人们是在何种条件下过日子的。埃莉诺加入了消费者联盟并被派到做人造花和羽毛的血汗工厂去调查工作条件。她克服了害羞心理，步履维艰地爬上黑洞洞的楼梯，走进屋子里。她所目睹的使她惊骇不已。“我亲眼看到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坐在桌子旁边劳作，有的简直累得晕倒了……”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不顾当时严格的风俗习惯继续恋爱。埃莉诺回忆说：“你只有在很了解一个男人时才写信给他或者接受他的信。除了花、糖果，有时或者是一本书之外，你不接受男人的礼品。从没有与你订婚的男人手里接受一件首饰被看成是放荡的行为，在订婚之前让他亲吻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有在我脑海中出现。”富兰克林有几次到安置区去看她，那些姑娘们都想知道这个英俊的年轻人是不是她的“对象”。有一次，埃莉诺带他同去探望一个生病的学生。富兰克林从来没有想到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会看到这种景象。她说：“当他看到这个学生住在那冷冰冰的房屋中时，他心里十分震惊，嘴里不住地说他真不敢相信人竟会过着这种生活。”

1903年11月21日，埃莉诺应富兰克林的邀请到坎布里奇去看哈佛大学对耶鲁大学的足球比赛。在比赛中富兰克林当啦啦队队长。次日他到格罗顿去找她。她是到格罗顿去看在那儿上学的霍尔的。他在日记中用自己才看得懂的密语写道：“午饭后，我与我的亲爱的人作了一次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散步。”就在那个静谧的星期日，当二人在那熟悉的地方散步的时候，富兰克林向她求婚了。埃莉诺并没有立刻答应他。她回到纽约之后，把富兰克林向她求婚的事讲给外婆听。霍尔夫人问她是否真的爱上了他，埃莉诺“郑重其事地回答‘是的’”。事后她承认“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恋爱，什么是爱情”。

这对年轻人正式宣布订婚后，特德叔叔首先向他们表示祝贺。他对富兰克林说，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高兴”。他这样写道：“我很喜欢埃莉诺，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喜欢你，也相信你……祝愿你们永远幸福。”他不但答应去参加订于1905年3月17日举行的结婚典礼，而且还答应他要亲自去把新娘交给他。埃莉诺请艾丽丝·罗斯福当女宾相，尽管她们姐妹二人的关系不太融洽，艾丽丝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次请求。“这事挺有趣，我十分高兴……你让我去当个女宾相，心眼真好。”

在此之前两个月，富兰克林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念哈佛大学法学院，目的是要居住在离埃莉诺近些的地方。他和他母亲在麦迪逊大街200号租了一套房子，每逢周末就到海德公园村和蒂沃利去。他

从蒂沃利来信提到，埃莉诺嗜酒的舅舅“瓦利一直蛮不错——似乎他受到我的良好的影响”。他在海德公园村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投了西奥多·罗斯福一票。他后来说：“我觉得他是比民主党候选人更优越的民主党人。如果我重新投票的话，我也决不会改变主见的。”特德叔叔以25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奥尔顿·B·帕克。在当天晚上，他对妻子骄傲地说：“亲爱的，我并不是偶然当选的。”1905年3月4日，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走到华盛顿去参加就职典礼。美国总统对美国人民说：“已经给了我们不少东西，理所当然地期待着从我们这儿得到不少东西。我们对别人有责任，也对自己有责任，我们不能逃避这两种义务。”

富兰克林在几年后说：“你知道你在最好的法学院里也学不到多少法律，你要学会怎样去思考。”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到了两者之中的何者。像25年以前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一年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富兰克林也感到厌烦，心神不安，因为他看到学校传授的知识与法律实践的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他在邀请他的老校长皮博迪博士来主持他婚礼的信上流露出他对大学学习缺乏热情：“没有你，事情就不同了。我正……试图去熟识一些法律工作，当然，我还会继续下去。”但是，问题似乎就在于他缺乏兴趣，而不是懂与不懂专业知识。罗斯福发觉学习法律枯燥无味。而且他也不像在哈佛大学念书时那样，担任《红色哈佛报》主编，也没有其他课外活动来调剂一下生活。埃莉诺非常了解这种情况。她对拜伊姑妈说：富兰克林“如果不能凭藉学习法律来和人们广泛接触的话，那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法律是不会觉得满意的。”

法学院的问题不久就被期待已久的婚事所淹没了。圣·帕特里克节假期，他们举行婚礼。当日下午天气晴和。东76街上毗邻的6号和8号两座埃莉诺亲戚的褐石房子窗户大开。第5大街上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游行队伍合唱的《穿起绿色衣裳》的声音透过窗户，几乎淹没了《嗨，答应我吧！》的乐曲声。报纸上已经登载，说美国总统检阅完游行队伍后要在婚礼上将他的侄女交给富兰克林，所以从清早起，人们就聚集于街头巷尾。一个个挥舞着旗帜、手绢，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一起涌到刚刚到达的伯登和温思罗普家人周围。临近三点半钟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高呼声“特德万岁！”总统面带人人熟悉的笑容，纽扣里插着一支天兰花，站到了房舍的台阶上。

富兰克林端坐在一间小小的接待室里，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结婚仪式，与皮博迪博士和莱恩罗普·布朗一起回想着格罗顿的往事，布朗代替因病缺席的罗西任男傧相。他们谈笑风生，以致有人提醒他们站到旁边去。那时婚礼队伍已经上路，总统马上就要挽着新娘，走近那座摆满粉红色玫瑰和棕榈的圣坛了。埃莉诺打扮得异常漂亮，这使一些客人想起了她的母亲。她穿着镶有花边的、笔挺的白绸子礼服，拖着很长的后摆，用她生母的钻石别针别住面纱，脖子上挂着一小串萨拉·罗斯福送的珍珠项链。一位报道社会新闻的记者发现她比总统的个子长得更高。

家里的直系亲属才出席结婚仪式。婚礼以后，两幢房屋之间的滑门拉开了，以便举行招待会。客人们簇拥着新郎和新娘，高声祝贺。特德叔叔拉开他的嗓门高兴地说：“富兰克林，哪儿还有比亲上加亲更好的事了。”但是过了片刻，房间里就剩下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了。因为总统像块磁石那样，把

即3月17日，原为爱尔兰人的节日。

来客个个吸引到备有茶点的图书室里了。埃莉诺后来这样说：“总统待的那间屋子里站满了来客，他们对他讲的饶有风趣的故事发出一阵阵笑声。”新郎和新娘只好跟着他去了。

因为他们要等到富兰克林在法学院念完春季学期后才能开始度蜜月，所以他们在斯普林伍德只住了一个礼拜。在回到纽约后，他们在西45街韦伯斯特的一间公寓里居住。埃莉诺说：在那个地方，“我一点家务劳动都不用干”。6月，他们登上“大洋号”，同去欧洲游历三个月。在船上，6个日本海军军官引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注意。这几个日本军官是去英国接收供帝国海军使用的两艘战舰的。罗斯福和这些军官作了几次交谈，想了解一些关于日本的情况，后来发现他所掌握的情况倒比他人所掌握的更多。

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埃莉诺发觉罗斯福有梦游的毛病。有一次幸亏她叫了起来，要不然他就要走出他们的客舱了。在苏格兰的时候，她发现他常做噩梦。有一次，他在野地里走得疲倦极了，到了晚上“我被我旁边床上的尖叫声吵醒了”，她说。富兰克林笔直地坐了起来，手指着天花板，大声喊道：“你看见了吗？你没看见这房梁在旋转吗。”

威尼斯是罗斯福夫妇旅行中最难忘的一站。“我们的船夫非常有趣。乍看起来他活像一个善心的强盗，带领我们在运河上逛了大半个晚上，”埃莉诺这样说。夫妇泛舟于运河上，欣赏着铁栅栏门后宫殿式的粉红色建筑和房屋后面的花园。他们还拜访了住在其中一幢房屋里的萨拉·罗斯福的几位朋友。夫妻二人在穆拉诺的玻璃器皿厂定做了一套带有罗斯福家族纹饰的杯子。夫妻俩在日光下沐浴，像埃莉诺小时候那样，独个儿坐在圣马科广场周围的桌子边上，喂着鸽子。二人看了不少教堂，直到富兰克林“不愿再看了”。9月初罗斯福结束了这种田园诗般的日子，他必须在月底返回纽约，做好法学院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埃莉诺没有养成坐船的习惯，所以在回家的航行中，一直不舒适。回到家中后仍未好转，她就去找大夫，结果诊断她怀孕了。她说：“我一向害怕不会生育，这下我真的松了一口气。不然的话，我丈夫肯定……会很失望的。”埃莉诺在性生活上很幼稚，也很节制。她承认在订婚前，她始终不让富兰克林和她接吻。她还想对她女儿说：“性爱是一种非忍不可的痛苦。”

第四章 混乱的局面

这时候，富兰克林已是个有自己的家庭的男子大丈夫，他要对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负责。他在法学院用功读书。他补考契约和辩护论这两门课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合格成绩。1907年早春，他通过了纽约州律师考试，因此就没有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完为获得学位所必修的课程。

由于家庭的关系，他在华尔街保守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律师事务所当一个职员。第一年富兰克林未曾获得薪俸，这对二位年轻夫妇说来，并没有影响，因为他俩每年可从信托财产基金总共获得 12 500 美元左右的收入，而当时血汗工厂的工人每星期只能挣得 5 美元。富兰克林虽像父亲那样富有进步的同情心，但他对美国产业之间的竞争都不太理会，他已经练就一套本领，严格地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

罗斯福对自己的地位并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他称他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办公室人员”。他所承担的任务是为事务所的合伙人研究先例、记录案情及其他一些琐事，他自我暗嘲地写了一张广告，让大家知道他愿作有关法律方面的任何杂事：“处理未付款的汇票是本人一大特长，免费回答女士们提出的有关酗酒的问题。乐意告发因过度节育而造成的种族灭亡。免费为小犬施行麻醉。在很熟练的老婆婆的指导下育养婴儿，如此等等。”在事务所里，他不久就深刻体会到学校教育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他后来这样说：

我已进入了纽约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报到后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明天上午到最高法院去参加一次案情例会……”

我有生以来没有进过法院，但我却是一个正式律师……翌日有人给我一张转让地产的契约。他对我说：“把它送到县文书办公室去。”我从未进过县文书办公室。但是我毕竟去了，从理论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一名正式律师。

卡特·莱迪亚德不仅要办妥比较重大的法律事务，而且要为美国捷运公司及其他类似公司处理一大批较小的诉讼。像罗斯福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就被派到市立法院去反驳对这些公司提出的小额赔偿要求。因为他得同那批无恶不作的律师斗法，所以他一向十分警觉。但他在这个乱云密布的美国干得挺带劲。他第一次和普通人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思想面貌，他们的生活。他也学会了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处理事情。这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平等交易是个挺好的训练。他后来曾向一位同事说：“我常常觉得，我在市立法院的工作比我的生活上的任何其他要素都更有利地为政治前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约莫经过一年的训练期之后，富兰克林被派到律师事务所的海事部。他对于船运和海洋均感兴趣，这看来是个蛮好的差事。但是，他经常觉得心烦意乱。有一天，路易斯·C·莱迪亚德发现他游手好闲，就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富兰克林像平时那样喜笑颜开、漫不经心地回答：“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这个高级合伙人想要熟悉一些情况，而不是要部下表示赞同。他气得厉声呵斥：“富兰克林，你烂醉如泥！”于是忿忿然拂袖而去。

到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的生活格局已经一目了然了，他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律师。甚至老莱迪亚德也觉得他“有出息”。他有着可靠的背景、随和的性情，一定会成为有利可图的合伙人。他是入会条件严格的一些俱乐部的成员，就中包括尼克博克俱乐部和纽约游艇俱乐部。他在天气晴和的时候打高尔夫球，扬帆驾船，星期天在大学俱乐部打扑克。某些慈善团体争相使用

他的名字。他们家里人常在斯普林伍德度周末，他在他自己买的土地上采用科学方法植树。他是雄鹰引擎公司和钩梯救护公司的成员，此外还是圣·詹姆斯主教派教会的教区委员。年轻有为的富兰克林不费劲地随波逐流，经历了后来被埃里克·H·埃里克森称之为“心理社会活动的暂停期”。

1906年5月3日，他的女儿出世了。按她母亲和外婆的名字，给这个女孩取名为安娜·埃莉诺。在安娜之后，1907年，詹姆斯诞生；小富兰克林生于1909年3月，年内就夭折了；埃利奥特生于1910年；第二个小富兰克林出生于1914年；1916年，埃莉诺生了约翰。

当地的几个民主党人在波基普西的大街上“绑架”富兰克林，在达切斯县警察的一次野餐会上他被迫向警察发表演说；后来他喜欢说他的政治生涯是从这时开始的。也许是如此，但是特德叔叔给他作出了榜样，这个叔叔多次地说罗斯福家族的年轻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他一直在考虑要走他这位杰出的亲戚走过的路。他的一位律师同事格伦维尔·克拉克清楚地记得罗斯福说过，“他不会一辈子担任律师这种职务的。他准备一有机会就去竞选公职。他认为他真会有机会当上总统的”。

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律师也给他自己设想了一条走进白宫的道路。首先进入州议会，赢得一个席位，被任命为助理海军部长，当选为纽约州长。“凡是当上纽约州长的人只要有点时运就有机会登上总统宝座的。”这是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坐在犯人候审间里说的一席话。

富兰克林·罗斯福始终支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准备主动出击，回敬那批诋毁总统的人。在格兰梅西公园大厦里，弗朗西丝·珀金斯和他第一次见面。当有人蔑视地说到特德·罗斯福的“进步”思想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姓罗斯福的年轻人起来激动地为西奥多·罗斯福辩护。他和埃莉诺结婚后，常到白宫或白宫附近拜伊姑妈家里去做客。在1906年艾丽丝·罗斯福与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尼古拉斯·朗沃思的豪华婚礼上，富兰克林异常殷勤地安排了新娘的一行人让官方摄影师拍照。他和外界人士交往，有助于他深入了解特德叔叔。有一次，总统在白宫的壁炉前忿怒地踱来踱去，厉声斥责几个众议员。他们因为自己选区捞不到油水而反对总统建议的资源保护法。特德叔叔说：“哎，若是我既是总统又是国会就好了！哪怕只当它十分钟也好。”

1904年选举之夜西奥多·罗斯福作出的许诺招致各种各样的麻烦。他那时说：“他‘决不’会在4年后重新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一许诺使他丧失对国会的控制权力。国会拒绝通过他提出的关于遗产税、所得税以及其他改革立法，说这种措施不合乎宪法要求。总统用如下词句回答说：“宪法不应被理解为束缚手足的紧身衣……而应被理解为使本国得以生存并健康发展的工具。”若说西奥多·罗斯福未能使国会通过他的计划，他已使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正为反对企业界和政府中的掠夺性势力而战斗。

富兰克林家里的大多数人，包括富兰克林的妈妈，都劝他不要介入“混乱的局面”。但是在他最后采取行动之前，决定征求特德叔叔的意见，特德刚刚结束了他卸任后的非洲和欧洲之行。富兰克林请拜伊姑妈探明这位前任总统会不会反对他当达切斯县的候选人，如果特德反对，那对他说来将会是致命的打击。老罗斯福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富兰克林应该进入政界，

埃莉诺此时正在怀胎，没有参加婚礼。

根本不要顾虑我是否表示赞同。”

富兰克林用罗斯福式的热情投入了竞选活动。他对大会代表们说：“我接受提名是独立自主的。我并不效忠于某一个人，我也不受任何势力的支配。我今后也将如此……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们，在即将来临的竞选中，我不打算停步不前。”富兰克林以民主党人身份出现，这未出乎共和党人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当地农民不能忍受他那纨绔子弟般的穿着和他贵族老爷的口音。波基普西的《鹰报》在提到他时，总是把他的名字拼错；并表示，因为他的捐款“大大超过四位数”，所以他被提名为候选人。甚至连波基普西的一家《企业晚报》也说“罗斯福先生……比其他候选人都更不为人所共知。”

罗斯福遵守他的关于“艰苦的月份”这一诺言，乘坐一辆两边插满旗帜的鲜红的马克斯韦尔旅游车参与竞选，这就使得人们大吃一惊，因为这是罗斯福在当地竞选中第一次使用汽车的缘故。富兰克林的一些支持者担心这辆引人瞩目的汽车会使农民和畜群受惊，但是汽车的速度优越于马车，所以他能够在选举日前的数周跑遍了整个选区。在理查德·E·康内尔的陪同下，他开始了旋风般的竞选。

在波基普西和其他城镇有组织的民主党人的选票是不必担心的，因此，候选人的争夺重点转向农村。他们乘坐那辆既没有顶篷也没有挡风玻璃的马克斯韦尔汽车，颠簸于丘陵之中和乡间满是车辙的路上，沐风浴雨，一身尘土，骨头架子都要被颠散了。就这样，他们走遍了每个村落，访问了每家商店。年轻的罗斯福由于他第一次参加竞选而情绪激昂。他回忆道：“每当我们遇到马匹，……我们就得停下来，不仅把车子刹住，还要把马达熄火。”这些预料不到的停车使富兰克林有机会与农民或车夫交谈。如果日程上没有会议，他们就在当地的酒吧间或旅店买饮料接待每一个进门的人。尽管车子不停地抛锚，车胎不断地破裂，他走了大约二千英里的偏僻路程。甚至摔倒摔疼了也不能使他放慢行速。在碰破的膝盖上涂了消毒药以后，罗斯福又一瘸一拐地去参与竞选活动。

罗斯福鼓吹一种不太明确的进步主义观点，他把“党魁专政制度”和英明的政府视为竞选中阐述的主要问题。他也极其重视选区内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严厉地谴责塔夫脱政府强加于农民的保护主义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收税法。农民们说这一法令逼得他们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但却以高价购买一切成品。他也十分强调他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关系并在自己的演说中夹杂着许多西奥多常用的“强者”这个字眼。在一次集会上他这样说：“我不是特德。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他晓得我不是特德。我于是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那么厉害哩。”

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和前任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次竞选中当然是一笔可贵的资本。在1910年，共和党内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政治风暴的中心。他从国外旅行回来时未满53岁，很想在政治舞台上大干一场。他很快发觉塔夫脱背叛了他的政策。新总统心地善良，脾气温和，也很保守，他认为应从以前的改良主义的压力下松口气了。塔夫脱和罗斯福之间很快就出现了分裂。共和党由于它的领袖之间的分裂而分成两大派：效忠于总统的“保守派”和团结在“勇猛骑士”周围的“造反派”。

当罗斯福寻求政治纲领时，他偶然发现了赫伯特·克罗里写的《美国生活前景》这部书。这部书批驳了杰斐逊式的英明的政府是最少进行干预的政

府的概念。克罗里大肆鼓吹一种“新民族主义”——一个组织起来的美国去实现增进人类幸福的“民族历史使命”。一个雄伟的中央政府是克罗里所设想的机构的基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足以与托拉斯抗争的政府。克罗里并不把托拉斯视为有害的机器，他相信一切托拉斯都有益于经济效率，务宜认真地加以节制，而不能用政府的暴力去解散它们。

在纽约州，共和党内“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愈演愈烈。党魁小威廉·巴恩思和坦慕尼厅破坏了共和党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推行的改革。休斯对斗争感到厌烦，接受了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命。在经过一次艰苦奋战后，罗斯福从巴恩斯及其追随者手中夺得了控制州党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决定提名亨利·L·史汀生接替休斯，“保守派”勃然大怒，在竞选中竟以袖手旁观来报复。这样看来，由民主党提名的保守的、公正的企业家约翰·A·迪克斯会在11月份被选为州长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形势。他对拥护共和党的农民们说，华盛顿和奥尔巴尼的党魁们把他们出卖了。他还说，大家都投民主党的票是对特德·罗斯福的致命的打击。在取得休斯派的共和党人支持后，他指责他的对手，共和党参议员施洛塞蓄意破坏休斯在奥尔巴尼的改革，并为党魁巴恩斯在该地区的主要助手卢·F·佩恩效力。罗斯福用他那华丽词藻宣称：“我确实知道他并没有代表我，我也确实知道他没有代表你们。”

罗斯福的略嫌浮夸的竞选使得共和党人暗自冷笑，他们根本不去理会罗斯福。他们都意识到他在农民中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于是急急忙忙发动反攻。众议员菲什斥责罗斯福把家安置在纽约市，其实并不是该选区的居民。他们还费尽心机，把他同华尔街联系起来。在竞选期间，波基普西《鹰报》几乎未曾提到罗斯福的名字，这时读者们也出来警告它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所代表的是和西奥多·罗斯福所代表的完全相反的异端。”它还强调他与卡特—莱迪亚德律师事务所的相互关系。“这个参院选区的选民们务必要记住，这个事务所的人都是为几家大托拉斯辩护的律师……”

选举日来临了，天空阴沉沉的，还下着雨。民主党人都认为这是个吉兆，因为天气恶劣，许多支持共和党的农民会呆在家里。富兰克林一早就在海德公园村政府大厅投了票，然后就回到斯普林伍德等待选举揭晓了。

选举结果是罗斯福个人的胜利。使人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以15 708对14 568票击溃了施洛塞——这对民主党说来是史无前例的多数。他的票数不仅在波基普西城区占先，而且在农村地区也独占鳌头。民主党在各个地区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约翰·迪克斯获得了州长的职位；在最近20年中民主党首次赢得了纽约州参、众两院的多数票；理查德·康内尔以微弱多数获得了他朝思暮想的国会中的席位。在举国上下反对塔夫脱总统的抗议浪潮中民主党人赢得了辉煌胜利。他们赢得了众院的半数以上的州长席位，包括新泽西州在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为州长。

共和党内的分裂促成富兰克林第一次选举的胜利，这次胜利为他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章 较量

选举中的僵局打破了，保守派尽管取得了胜利，然而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也大伤元气。共和党内的腐败和党魁专制这个怪物已遭到沉重打击……而少数派从未设想他们要让多数派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富兰克林·罗斯福仍然博得了公众的信任。

富兰克林抓住了有利的机会到了奥尔巴尼。在还没有对任何一个法案投票之前他就成了纽约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人物了。他是一个新当选的州参议员。一名爱挖苦人的新闻记者刘易斯·麦克亨利这样说：“他是历来只配充当‘介乎……看门人和委员会办事员之间’的角色。但是，‘第二个罗斯福要走上’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就已赢得声誉的舞台却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事情。”记者们匆匆忙忙地发表关于这个年轻贵族的专题报道：……参议员罗斯福还不到30岁，穿高领衣服，戴金色夹鼻眼镜，身材魁梧，脸色红润，轻巧自如……就凭他那漂亮的长相，就能够在舞台上赚大钱，使看日场戏的姑娘们春心荡漾……

但是，鲍厄里的党魁，大块头蒂姆·沙利文却不那么钦佩地向他瞟了一眼。他对坦慕尼厅的头目查尔斯·F·墨菲说：“如果我们抓到的是个罗斯福，我们莫如把他拉下来扔到一边去。江山易改，罗斯福们秉性难移，这小子也会对我们干出特德上校对共和党干的那种事来——把党搞得分崩离析。”没有多久，墨菲和沙利文都为当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懊悔。

富兰克林在国家街248号每月花四百美元租了一幢三层楼的褐石房屋。元旦那天，全家都搬了进来。这所房子离议会很近，又有足够大的地方招待来客，不久后事实表明这所房子竟成为罗斯福的一笔政治资产。

民主党人为庆祝该党结束20年的在野生涯又重新掌权而举行盛大宴会。坦慕尼厅的坚定分子，保守的克利夫兰的追随者，进步分子，北方的，南方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挤满了旅店大厅和酒吧间。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党魁墨菲，在布鲁克林说一句话就是金科玉律的约翰·H·麦科伊；还有像帕特南县的威廉·邱奇·奥斯本这样的改革者以及奥本的前任市长、民主联盟的奠基人托马斯·莫特·奥斯本出席了“施行民主”的集会。为了让大家高兴，罗斯福也把约莫400位选民邀请来参加盛会。他们要在州长约翰·迪克斯的就职典礼后，在这位参议员的新居里高高兴兴地庆祝一番。

那天晚上，罗斯福得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迪克斯告诉他，作为一个和解姿态，党魁墨菲同意抛弃长期任职的参院临时议长托马斯·F·格雷迪。格雷迪精明能干，而且本性嗜酒，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现于政治舞台时就在奥尔巴尼的一个议员。迪克斯告诉富兰克林，他可能被选出来接替格雷迪。尽管富兰克林在日记中坦率地说，“抛弃参议员格雷迪的决定大快人心”，他还是没有接受州长要他接替格雷迪的建议。格雷迪是个老牌参议员，在遭到摒弃后很可能会“大喊大叫”的。

墨菲选中了33岁的德国出生的移民罗伯特·F·瓦格纳来接替格雷迪当参院的民主党领袖；推举37岁的下东区出生的、在富尔顿渔业市场接受教育的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担任众议院的党的领袖。尽管这两个人都是老牌子的坦慕尼分子，他们都很精明能干，并且得到众人的信赖。事实上，改革派

这是为了让民主党摆脱坦慕尼厅的控制而成立的组织。

对政治机构中的领导人的能力往往不予以重视。对瓦格纳的提名，罗斯福一人代表州的北方代表团给予大力的支持。他说：“我觉得瓦格纳是个杰出的人选，他有良好的愿望，惟一的障碍是来自他自己的政治机器的压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代表造反派发表了一项宣言，说明他们拒绝参加党的会议是因为“他们深信代表人民的选票不应在党的核心小组里被扼杀……人民应该知道他们的代表们是怎样投票的……任何候选人得到的多数票都应归功于议会中的代表们，而不是议会之外的任何人。”宣言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罗斯福的名字极为引人瞩目。罗斯福这样说，部分造反派支持谢泼德，另一部分维护其他候选人，但是所有的造反者都“坚决反对威廉·F·希恩”。他们是“在反对党内的腐败和党魁专制”，他们誓不屈服。

所有的议会活动都停止了，僵局持续了十个星期。罗斯福不是这次造反的领袖，只是一位指导者。党组织中的政客们轻蔑地把他看成一个“大学里的臭老九”，“一只刚出娘胎的牛犊”。保守分子们甚至把他视为一匹特洛伊木马，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指示，一心想破坏这个党，但是这个年轻人兴高采烈地投入一场激烈的战斗。

那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造反者在坦慕尼这只发怒的猛虎的利爪下，受到很大的伤害。有人暗示他们的贷款要被追还，要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一个靠印刷政府文件来维持现状的地方报纸老板接到了警告，说他如若还不就范，那么合同到期后就不准续签。有人还被告知，他们的政治生涯就要结束了，因为以后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了。这些造反者的案头堆满了选民们在各地的希恩分子煽动下作出的决议。和罗斯福作对的民主党州委会委员珀金斯散发了一份请愿书，要他遵循党的核心小组的意愿。罗斯福认为这是“一种宣传伎俩”，于是不予以理会。在那个共和党势力很大的地区，他发现他的反对坦慕尼的立场还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对许多造反者来说，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好几次，这个联盟好像要破裂了。埃德华·特里对斗争感到厌烦，他说：“人们说叛逆者要走的路是艰苦的，但和一个尽责的议员比较起来，叛逆者要走的路还是轻松的。议员们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诱惑。”

罗斯福竭力不让这次造反遭到失败。他想和共和党党魁威廉·巴恩斯做笔交易。他建议民主党的造反者和共和党达成协议，推选一名双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巴恩斯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觉得还是让民主党内四分五裂更好些。

议会失火后打破了这个僵局。3月29日晚，议会遭到了严重破坏，议员们不得不挤在窄小的奥尔巴尼市政厅里开会。瓦格纳和史密斯不耐烦地对墨菲说，如果不能很快找到一个人选，他们就不能使他们自己的人再在奥尔巴尼呆下去了。他们打算投任何人一票，这样就可火速离开这个地方。党魁已经在担心罗斯福和共和党可能结成某种联盟，听到消息后，马上登上开往奥尔巴尼的第一列火车，一大早就精疲力竭地抵达奥尔巴尼。他提出州最高法院法官维克托·J·道林充当一个折衷候选人。造反者们争辩了两天，在瓦格纳和史密斯调解之后，才勉强同意这个提案。

当造反者们正欲离开罗斯福的宅邸时，他们得知对手的高招已把他们击败了。道林拒绝了提名，墨菲已经又提出以前坦慕尼厅的巨头，詹姆斯·A·奥戈尔曼法官作为候选人。这不仅使参议院这个席位由一个比希恩更为他器重的人占去了，而且也为他的女婿丹·卡哈兰在州最高法院留了个空位。罗斯福义愤填膺地谴责这一举动，矢志继续履行自己的使命。但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造反者们不能拒绝奥戈尔曼。自从他当上法官后，他就不介入政治斗

争，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据传如果奥戈尔曼的提名再次遭到拒绝，党魁巴恩斯就要和墨菲做交易，推选希恩了。因此，造反者中多数人都决定投奥戈尔曼一票。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在内，都同意在议会上投他一票，但拒绝参加核心小组。

3月31日晚，当罗斯福和其他强硬分子鱼贯进入议会厅投票时，人们对他们发出一片乱哄哄的欢呼声和嘘声。有人开始为坦慕尼唱凯歌：“坦慕尼……坦慕尼……击败他们，击败他们……胜利属于我们。”不一会，乱哄哄的人群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议员们和旁听者在大厅里挤来挤去，嚷嚷着，拥抱着，根本不理会议长在那里用木槌拼命敲桌子要大家肃静。议长终于使吵嚷声低了下去。这时，共和党少数派领袖埃德加·布雷克特奚落造反者说：“上帝的旨意真是捉摸不定啊。即使我能够，我也不会让民主党蒙受更大的耻辱。”罗斯福在人们的叹息声和嘘声中开始发言，还想为这次惨败挽回一点面子：“两个月以前，我们民主党人觉得我们有责任不同意党内有人在选举联邦参议员问题上的做法。……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良心去做，也履行了我们应有的职责。我相信民主党因此而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是民主党人——不是朝秦暮楚的民主党人，而是始终不渝的民主党人。我很高兴地投詹姆斯·A·奥戈尔曼法官一票。”

但是，僵局的最后结果还是具有双重意义的。造反者不得不接受奥戈尔曼，但他们却阻止了希恩当选。尽管墨菲最后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搏斗中他也挫伤了锐气。罗斯福于是从这次“希恩事件”中得到了一个向现实政治学习的机会。在这个不平静的课堂里他学会了耍弄手腕，变换花招，也学会了怎样对待互相冲突的政治抱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

罗斯福担心奥戈尔曼的当选会对自己选区的选民产生不良影响，他只好匆匆忙忙赶回海德公园村。选民们支持他的造反，但也担心他们会把这次造反的结果看成是在坦慕尼厅面前屈膝投降。他很高兴地发现没有一个人抱怨，他的选民们“根本不认为这是墨菲的胜利”。他于是借此机会应用熟练的政治手法把这令人屈辱的失败变成了可喜的胜利。

第六章 崭露头角

富兰克林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的惊人的毅力赢得了广泛的称赞。美国的社会局面充分地表明全国绝大多数选民支持进步主义。在什么是进步主义的问题上，美国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进步主义包括什么内容，美国人还是打算试一试进步主义。

1911年底威尔逊和罗斯福第一次会面。罗斯福和其他许多民主党人朝圣般地去特伦顿的州议会，想看看突然成了民主党内令人振奋的一股新力量的学者兼政治家威尔逊。那时，威尔逊才当了几个月的州长，但已经把党魁专制的新泽西州变成了实行进步主义的楷模，因而在全国遐迩闻名。他迫使州议会通过改革派所梦寐以求的许多法案：顾主责任法，直接预选法，反贪污法以及加强对铁路、公用事业与其他企业的管理的法律。威尔逊和罗斯福接连谈了好几个钟头，讨论了进步的立法和6月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威尔逊获得提名的前景。

罗斯福后来在说明为什么他支持威尔逊，为什么其他进步人士应该投威尔逊的票时，认为威尔逊是“改善美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的处境的那次运动”的先驱。他又说，威尔逊“十分了解广大工人的劳动福利和社会福利问题”，坚定不移地开展旨在“改善各类人的生活状况”的斗争。在关税、对托拉斯的控制、保护自然资源等重大问题上，威尔逊的立场鼓舞着所有的进步人士。威尔逊在整顿政治、提高政治道德水平方面是一位卓有贡献的领导人。

前不久富兰克林尝到过坦慕尼厅威力的滋味，这一经验使他清醒起来，成了他毅然加入威尔逊阵营的原因之一。罗斯福认为参与全国性政治可以避免坦慕尼厅的打击。若是他支持的候选人登上总统宝座，那么及早加入威尔逊的行列就有希望给自己在华盛顿谋个官职，那时坦慕尼厅要报复也无能为力了。

在反对希恩的斗争之后，罗斯福的工作远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了。他刚刚登上政坛的时候对进步主义只有肤浅的认识。实际上他给政治下的定义是“诚实问题……是为争取廉洁政府而斗争”。他对于哲理思想，对于抽象的观念，很不得心应手。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他认为必须由人民来重新控制政府，政府应该维护“公众利益”而不是维护贪得无厌的“个人利益”。尽管两位罗斯福都没有对“政治”一词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他们二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年轻的罗斯福全盘接受了机械主义的改革措施，它是进步主义的主要内容。第一步并不困难。在“希恩事件”上陷入僵局之前，罗斯福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纽约州的国会议员们支持有关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的宪法修正案。4月份的州议会休会后不久，这项决议案便付诸讨论了。在罗斯福的带领下他们辩论了五个钟头，随后决议案在参议院以28票对15票获得通过。四天以后，州众议院又通过这项决议案。

罗斯福选区的选民并不介意他搞唐·吉珂德式的行动来攻击坦慕尼厅，只要他关心选民的要求就行。罗斯福是林业、渔业及狩猎委员会主席，随后又担任农业委员会主席，本身也是个绅士、农场主，所以极力地维护选区在农业方面的利益，并支持采取保护资源的措施，特别是与木材资源有关的措施。进步主义基本上是中产阶级主义，罗斯福选区里为数众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场主、商人和专业人员都同情进步主义，反对坦慕尼厅的阴谋。

由于大多数选民反对妇女有选举权，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次表态是很暧昧的。当罗斯福最后支持妇女有选举权时，埃莉诺感到震惊。她后来这样说：“我那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男人本来就比较优越，比女人更懂得政治……我现在不能说我早在那时就是个女权主义者。”

由于不了解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残酷现实，罗斯福很难明白劳资关系的非人格性，对劳动人民为得到一种活命糊口的工作而激烈竞争的情况，对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繁重单调的劳动情形一无所知。然而值得赞许的是，罗斯福毕竟能够提高认识，改变看法。在为改变阿迪龙达克铁矿的极其危险的劳动条件的斗争中，罗斯福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支持了三角公司火灾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工厂安全措施。罗斯福后来提出一项“每周休息一天”的法案，既得到选区里的教徒的赞同，也得到工会的支持，罗斯福终于支持了妇女每周工作不得超过54小时的法案。路易斯·豪甚至说，是罗斯福在议会的那篇演说才使得这项法案得以通过。

在决定追随伍德罗·威尔逊不久，罗斯福想准备一篇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观点的声明。这就是罗斯福于1912年3月12日在纽约州特罗伊向人民论坛发表的一篇讲演。这篇讲演隐隐约约地勾画出“新政”的某些轮廓。罗斯福主张让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以便为民众谋求更多的福利。同时他还义正词严地反对在私有财产的便利与公共福利发生矛盾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斯福的这篇讲演的精神实质是取自西奥多·罗斯福与赫伯特·克罗里的“新民族主义”，而不是取自威尔逊的理论。

罗斯福相信，有关个人自由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美国的社会动荡，他主张采用对付这种挑战的新理论。他说：“事实表明，竞争在一定限度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超过这一限度就不起作用了。而我们目前必须力争的合作却能发挥竞争所起不到的作用。”罗斯福不愿将合作说成是“公有的利益”，他也不愿将合作说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因为这听起来太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对合作所下的定义是“为整体的自由而奋斗”，而不是“为个人自由而奋斗。”

罗斯福指出在18世纪的德国，地主有权按自己的意志使用自己的土地，甚至有权将树木全部砍掉，150年之后，只能按国家规定的科学方式砍伐树木，以便维护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地主的利益。这样，德国人就“超越了个人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资产的自由”。在纽约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开始认识到，为了全州百姓的健康和幸福，有必要对个人和木材公司加以限制，不允许它们像阿迪龙达克公司或凯特斯基尔公司那样为了赚钱竟在森林里任意砍伐。”

如果州政府可以强迫个人按照某种规定的办法使用木材，难道不能在其他生产资料方面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吗？罗斯福愿意将这一做法推而广之，支持政府指导国民经济。

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与塔夫脱决裂以后，他的支持者们“就像铁屑被磁石吸引着一样”纷纷聚到奥伊斯特湾，怂恿他争取竞选总统的提名。罗斯福的支持者由各种人物组成：进步的理想主义者、长期以来仰慕他的人、野心勃勃的政客以及认为“新民族主义”能保障垄断资本的大商人、大金融家。1912年初，西奥多·罗斯福上校就作出如下回答：“我的帽子在竞技场。”

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又丰富了政治语汇。

为要获得这一闪光的称呼，罗斯福首先得设法确保威尔逊在纽约州获胜并使自己获得竞选州参议员的提名，继而重新当选。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出数周，罗斯福和奥斯本就将威尔逊联合会改组为纽约州民主党人组织，并使它成为进步人士的永久性组织。路易斯·豪继续主持宣传事宜，奥斯本仍然主持财务，而罗斯福则在州里四处奔走，为威尔逊寻求支持者，并设法确保进步的候选人被提名担任地方政府中的职位。有人提到罗斯福可能当州长，而他刚满 30 岁，政治上经验不足，连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为时过早，虽然听起来心里倒满舒服。然而，因为奥斯本资金不足，罗斯福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纽约州民主党人组织没有过多久也就宣告解散了。

罗斯福害病以前业已获得竞选州参议员的重新提名。罗斯福在会见自己选区内的民主党“亲信”以后，给坎波贝洛的“宝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坦慕尼厅与‘利益集团’确在设法阻止我的重新提名。”它们又翻出希恩事件的老账，着重指出富兰克林在纽约州民主党人组织中的作用，斥责他散布“不和”。但在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中，罗斯福却是挺受欢迎的。甚至波基普西的《鹰报》也揭示：“看来当地的民主党领导人也不大可能摒斥罗斯福。”8月24日，罗斯福获得一致的支持，被再次提名为州参议员候选人。连当地的民主党领导人也真诚地希望罗斯福能在选举日得到他应得的奖赏。

有人曾把豪称为“中世纪的守护神”，而他也以这一绰号为荣。他身高不足五英尺，瘦骨嶙峋，满面皱纹，看上去俨像魔鬼而不像圣·乔治。然而就是他挽救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治生涯。这时候年轻的候选人患了伤寒，豪匆忙赶到他的病榻前，迫不及待地谈了在候选人不能露面的情况下怎样开展竞选活动的策略。许多年来豪一直在寻找一位需要自己的经验与专长的人物。他与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初次会面后没多久就感到这个仪表堂堂、雄心勃勃的年轻参议员就是自己要找的人物。许多年以后，豪对詹姆斯·罗斯福说他早就为使自己的友人当上美国总统拟就了一个详尽的计划了。他说：“我们准确地按计划行事。罗斯福并不晓得计划的详情，别人也不知晓，因为我从未向外人吐露过。但我心里早就想好了何时是采取行动的有利时机，时机一成熟，我们就行动，而且成功了。”

西奥多·罗斯福的毅力赢得了广泛的称赞，然而人们的赞扬并不能代替选票。这位上校虽然在竞选活动上搞得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大多数共和党进步人士的支持，但没能和支持威尔逊的民主党的改革派结成联盟。威尔逊在选举中获得 6301254 票，西奥多·罗斯福获得 4127788 票，塔夫脱只得了 3485831 票。选举结果表明全国绝大多数选民拥护进步主义。

富兰克林·罗斯福随时准备应召去华盛顿任职，于 1913 年 1 月回到奥尔巴尼，出席州议会会议。这时民主党又控制了州议会的参众两院。罗斯福被任命为农业委员会主席，这就使得他有机会去为通过豪在竞选中代表他许诺的那项农业法案而努力。但当这一法案获得通过时，罗斯福已离开州参议院，开始了新的政治历程。罗斯福到华盛顿参加威尔逊 3 月 4 日举行的就职典礼。在去华盛顿的途中他遇见已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威廉·麦卡杜。麦卡杜提出由罗斯福担任助理财政部长或者纽约港港监。港监的权力很大，可以用来扩大自己的政治组织，因而这一职位特别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就职典礼的那天

意指“我参与竞选”。

早上，罗斯福在威拉德饭店的休息厅里碰到了内定要担任海军部长的约瑟夫·丹尼尔斯。

“到华盛顿来当助理海军部长，你觉得如何？”丹尼尔斯问道。

“我很愿意担任这个职务”，罗斯福答道。据丹尼尔斯后来回忆，罗斯福听了这句话以后高兴得笑逐颜开。罗斯福又说：“这个职务棒极了，我很喜欢在新政府里任职。我从小就爱上轮船了，又是研究海军的人。我最爱担任助理海军部长这个职务。”

两天之后，丹尼尔斯和威尔逊谈起了助理海军部长的人选问题。威尔逊总统说自己还没有想过由谁来担任这个职务。这时丹尼尔斯建议由罗斯福出任此职。

据丹尼尔斯回忆，威尔逊问他：“你很了解罗斯福先生吗？他担任这个职务合适吗？”

“在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以前我未曾和他见过面”，这位海军部长答道，“但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他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到纽约又遇见他了。那时候正在竞选，更觉得他很能干。自从他在纽约州参院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一个在巴尔的摩支持你的提名的自由派当选以来，我对他非常钦佩。此外，我知道他从小就对海军很感兴趣。”

“好吧，将他就任助理海军部长的事向上呈报吧”，威尔逊说。

丹尼尔斯非常器重罗斯福，相信自己和这个年轻人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丹尼尔斯在海军、舰艇、海洋方面的知识很少，而罗斯福却一直对海洋事物很感兴趣；丹尼尔斯来自南方，而罗斯福来自北方，此外，罗斯福这个姓很有名，丹尼尔斯可能因为罗斯福在他部下任职而感到满意。

罗斯福被任命为助理海军部长。1913年3月17日——罗斯福与埃莉诺结婚8周年纪念日——富兰克林·罗斯福进入海军部，担任了西奥多·罗斯福曾担任的助理海军部长的职务。此时他在政治舞台上只呆了三年左右。

第七章 繁重的工作

置身于新的环境之中，罗斯福为熟悉新的工作像一台滑轮机似的拼命干……为适应军事需要，罗斯福以战士般的热忱投入了新的战斗，就像在死气沉沉、昏睡不醒的海军部的官僚机构当中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

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提名任助理海军部长，提名获得批准，然后就宣誓就职，没过多久约瑟夫斯·丹尼尔斯离开华盛顿，由罗斯福暂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年轻的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对记者说：“今天罗斯福在忙碌着。你们记得上次另一位姓罗斯福的人担任同一职务时发生的情况。”这无疑指的是西奥多·罗斯福。

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这两位罗斯福之间存有许多共同点，并大胆预言，这位年轻有为的罗斯福俨像义勇骑兵团的骑手老罗斯福一样，从助理海军部长开始，继而担任纽约州长，最后登上总统宝座。纽约州赫德森县的文书兰德尔·桑德斯在给罗斯福的书函中这样说：“我为你的鸿运而衷心高兴，并希望你能沿着第二个罗斯福的道路坚决走下去，从目前的职务直至你当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本人也寄来书函，对他担任“我曾担任过的职务之一”，由衷地表示欣喜。

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 7 年半的经历为他后来在战争中担任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助理海军部长比起现在的同一职务要重要得多，在海军的指挥系统中，地位仅次于丹尼尔斯，当海军部长不在时，罗斯福代行部长职务，并参与内阁会议。罗斯福主持军部的日常事务，其职责包括采购、文职人事、预算事务及船厂船坞的管理等，这些工作为罗斯福提供了宝贵的行政管理经验。他学会在危机时怎样管理一个庞大的联邦机构，总统在战时怎样行动、怎样与盟国制定共同的方针以及一个民主国家怎样适合全球性的战争中的军事需要。

没有过多久，这位头戴礼帽、身穿高领外衣、身材修长的年轻人就成了海军官兵们重视的人物。他到处视察舰艇和沿海设施，或是钻进机房，或是攀上船索，想亲自熟悉海军情况。他兴致勃勃地说：“无论什么事我都要过问，这可是法律允许的啊！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把本职工作同个人爱好有机地结合起来。”海军当时有一艘潜艇失事，艇上全体人员丧生，罗斯福闻讯之后立即乘坐另一艘潜艇出海，以此证明他对新型武器的使用充满信心。

罗斯福上任之后立即将路易斯·豪带到了华盛顿，他留用了给前几任助理海军部长当秘书的查尔斯·麦卡锡，但仍想在身边安排自己的人。罗斯福给“亲爱的路德维格”写了封信，说：“这儿有个肥缺，年薪 2000 美元的秘书职位，外加一套新制服。望于 4 月 1 日赴任。”豪虽是虚情假意地说秘书这一工作“非把我累死不可”，但他还是满意这项工作的，因为他的收入有了保障，就不必再去担心失业问题了。豪在奥尔巴尼新闻界的一位同事得知讯息后竟自作聪明地拍手叫道：“噢，海军！路易斯一定得和水打交道，让我们多赠他几块香肥皂，也许，到头来他就不这么脏了！”豪刚当上秘书时，毫无经验，只是站在罗斯福的办公桌旁边，把他在文件上签名的墨迹压干而已。但很快豪就成了解决麻烦事的能手，他冲破繁文缛节，藐视惯例，对传统和等级不予理会。他在一份公文中说：“助理部长希望把附给奥布赖恩议

罗斯福本人的年薪为 4500 美元。

员的信件的第一段重写一遍，以便使它明了易懂。”诸如此类的公文很快就惹恼了海军部的将领们。

豪的任务包括收集资料，有时为罗斯福和丹尼尔斯草拟讲稿，处理海军文职人员的雇用事务，督促落实建造舰只的重点项目，甚至负责调查海军所在地的城镇的卖淫及赌博问题。他还负责施与恩惠或委派职务等事宜。为罗斯福起草给选民的信，从政府那里为选区争得几个邮政局长的职位，为报答一些民主党人而给他们安排在造船厂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罗斯福的形象，扩大其政治势力，以便未来能向党魁墨菲和坦慕尼厅挑战。豪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罗斯福的事业，竭力维护和提高他的威望。

罗斯福长期以来就是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信徒，马汉是极力鼓吹海军力量的作用，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罗斯福在对扩充海军进行宣传的组织——海军联合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嘲笑国务卿布赖恩提出的为维护和平应缔结一系列仲裁条约的主张，他说：“这不是战争或和平的问题，我相信，在海军中也像其他行业中一样，有许多鼓吹仲裁及国际和平的人，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早已决定要保持一支海军力量，而战争仍然会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具备有极高效能的战斗力量。’”罗斯福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美国海军被派往地中海显示实力的情景。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巨大的灰色战舰从眼前驶过，官兵们凭栏而立，多么壮丽的景象啊！真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能目睹这一场面。”

罗斯福被任命为助理海军部长后的头几个月，埃莉诺还和孩子们一起留在纽约，罗斯福自己则住在波哈顿饭店过着单身生活，经常出入华盛顿的交际场所，在这里，其他一些活动正与总统制定的改革展开竞赛；少男少女们跳着探戈舞、交际舞或是狐步舞；妇女在大庭广众中抽烟；裙子越来越短。“世世代代以来，妇女们都炫耀自己的衣着”，一位参议员感叹地说，“现在却适得其反，衣着来炫耀妇女了”。

罗斯福仪表堂堂，身份显赫，与政府里其他官员迥然不同，在社交界大受欢迎，成了最吸引人的官吏。他加入了离他的办公室只隔几条街的很难加入的都会俱乐部，每周至少去一次，出席午宴或者晚宴。罗斯福还到选择会员同样严格的切维·蔡斯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出席剧院的晚会，到艾丽斯和尼克·朗沃思家中进晚餐。罗斯福的老朋友，刚在纽约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莱恩罗普·布朗常在周末邀请罗斯福到豪华的多尔里根庄园去消遣。这座庄园是查尔斯·卡罗尔在马里兰乡下的住宅，现正被布朗租用。对在华盛顿的这种社交消遣，罗斯福后来常开玩笑似地把它说成是：“会客厅、社交沙龙、莎乐美。”“会客厅”是可以随意饮酒的地方；“社交沙龙”则是进行丰富多彩的交谈的场所；而“莎乐美”，是罗斯福给“有轻柔的音乐、软绵绵的长沙发和漂亮女人的府第”所起的称呼。“富兰克林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

政府官员们的妻儿老少一到夏天，就像基普林时期印度的阔太太一样，纷纷离开潮湿闷热的华盛顿。埃莉诺按照家庭的惯例，去坎波贝洛，而不去她的新家。罗斯福这时也和家里人在坎波贝洛逗留了几个星期。使罗斯福的左邻右舍感到惊奇的是，他命令“北达科达号”战舰开到伊斯特港，参加7月4日的独立庆祝活动。罗斯福登上军舰视察时，只穿衬衫长裤，却要求鸣放礼炮，因为他觉得当地的居民希望听到礼炮。罗斯福夫妇在乡间别墅里款待舰上的军官，一名军官后来回忆说罗斯福“太好了，没法再好了”。

1913年夏天，罗斯福夫妇租下了离罗斯福办公室不远的北街1733号拜

伊姑妈的一所旧房子。在房子前面有一块小巧的草坪，房后有个小花园。花园里还有个长满玫瑰花的凉棚，罗斯福全家人常在炎热的夏天在这儿吃晚饭。透过房子的凸肚窗子可以看到两旁长满树木的街道。当时房内仍使用煤气灯照明，没有电灯设备，几乎大部分家具都是拜伊姑妈从她父亲、老西奥多·罗斯福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很笨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式样。埃莉诺迁到华盛顿来，带着三个孩子，又从海德公园村的旧居开来一部汽车，汽车司机也跟来了，还带来四个仆人和一名护士兼家庭教师。拜伊姑妈和她的丈夫、退休的海军上将谢菲尔德·考尔斯家里只雇了两名黑人仆人。

罗斯福夫妇和特德叔叔有着亲密的联系，他们在华盛顿的社交界中甚受欢迎。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首先向罗斯福夫妇发出了邀请。英国大使馆坐落于康涅狄格大道与北街的交叉口附近，使馆的建筑十分难看。1886年特德叔叔和伊迪丝·卡罗结婚时，这位英国大使是婚礼上的男傧相；这位大使曾对一位朋友苦笑着说：“你总得记着这么一点：罗斯福就和七八岁的孩童一样。”法国大使茹尔·茹塞朗也邀请罗斯福夫妇到他们家里去做客。这位大使曾与前任总统涉水走过一条小河，当时虽没穿衣裳，但为了法兰西的尊严，还是戴着手套。主张扩建海军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也常邀请罗斯福夫妇。罗斯福夫妇还常应邀到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家中吃饭。罗斯福也常参加星期天在霍姆斯家中举行的午宴，席间与政府里的官吏们谈论时政。罗斯福夫妇还在性情执拗的老亨利·亚当斯家中共进午餐。亚当斯的家就在白宫前面的拉斐特广场对面。有一天罗斯福提到一件自己极为担忧的事，这时亚当斯说：“小伙子，我在这里住了多年了，见过对面白宫里不知调换了多少主人。你们这些小官员或者白宫的主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对世界历史产生长远的影响！”

第三助理国务卿威廉·菲利普斯及其夫人、内政部长富兰克林·莱恩夫妇及莱恩的助手、经济学家阿道夫·米勒及其妻子是罗斯福夫妇最知心的朋友。菲利普斯的办公室与罗斯福的办公室相隔不远，他曾担任约瑟夫·乔特的秘书。乔特担任驻英大使时，萨拉·罗斯福曾想劝乔特把富兰克林带到英国去。

罗斯福和他的这些朋友组织了一个聚餐会，罗斯福在华盛顿供职的年代里，他们两星期聚餐一次，每逢聚餐，女主人均可自行邀请另外一对夫妇参加。“每逢聚餐的晚上，我们都不拘礼仪，头衔最高的内政部长也可以不坐首席”，埃莉诺回忆往事时这样说。无忧无虑的莱恩总是在集会时讲政府内部的一些传闻，使气氛变得活跃。埃莉诺喜欢在星期天晚上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做客，聊聊天，吃点冷食，喝点可可，尝尝她做的惟一的拿手好菜——炒鸡蛋。

詹姆斯·罗斯福曾把父亲描绘成“世界上最英俊、最坚强、最迷人、最有气魄、最爱好运动的父亲”。罗斯福的孩子都崇拜他。他和孩子们一块用枕头打仗，一同去野餐，一同玩狗逮兔子的游戏。罗斯福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孩子们管教不严，孩子们甚至把装满水的纸口袋扔到刚来的客人头上，罗斯福也不训斥一下，管教孩子的事是由埃莉诺一个人包办。如果她非要罗斯福来教训他们不可，他也“根本不会揍我们”，詹姆斯说。罗斯福有时把孩子带到海军部去，詹姆斯和埃利奥特被大厅里放着的精巧的军舰模型迷住了。“只有一桩事他们不满意”，罗斯福说：“那就是我不能把船从玻璃柜——他们把玻璃柜叫‘窗户’——中拿出来，放到澡盆或河里去开一开。”

罗斯福告诉儿子参观军舰时要面向船尾，向舰旗致敬。欢迎罗斯福的十七响礼炮可把安娜吓坏了，搂着妈妈的腿不敢抬头，即使这样，罗斯福同孩子们的关系中也有不愉快的事。随着罗斯福地位的提高，工作越来越忙，经常回不了家，即使回到家中，也无暇照孩子们的要求和他们一同相处或是谈谈他们心里有什么忧虑，有什么希望。

埃莉诺生性腼腆，多少有些孤僻；和丈夫那热情豪放的性格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她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在事业上协助罗斯福，因而担负起罗斯福在社交方面的重担。“我现在完全习惯了，我从没想过要问问我们该到什么地方去，该做什么事，怎样去做。”她说，“我只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旁贷的，而我的任务就是把事情办妥。”威廉·菲利普斯认为埃莉诺对富兰克林一直起着辅助的作用。有一次到旧金山去，罗斯福夫妇与菲利普斯夫妇一同住在一个套间里。菲利普斯回忆往事时这样说，一天吃早饭时，埃莉诺问起罗斯福是否已收到某人的来信。罗斯福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烤面包片，一边说信已收到了。

“那末，你回信了吗？”

“还没有，但是要回的。”

“富兰克林，难道不应该立即回信吗？”

“对，要立即回信。”他说这话的神态就好像心还放在咖啡上，怕它凉了。“这事我会办的。”

“富兰克林，最好还是现在就写封回信。”

“好吧！”富兰克林答道，“我马上就写。”

罗斯福及时写了一封回信。菲利普斯认为若不是埃莉诺在一旁催促，罗斯福准会把这事置之脑后了。

罗斯福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在威尔逊政府上台后不久爆发的两次国际危机中，他的表现比政府中大多数人都激进。1913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禁止日本人在该州拥有土地的法案后，爆发了第一次危机。在日本，人们举行了反美示威。在美、日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报纸的推波助澜下，人们担心战争一触即发。最高军事计划机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制定了保卫菲律宾的作战方案，并提议将亚洲海军中队驻在上海附近长江上的五艘老式巡洋舰立即撤往马尼拉，以防万一。丹尼尔斯的作战助理布雷德利·菲斯克少将也火上浇油，给海军部长一份秘密备忘录，罗斯福也得到一份副本。在备忘录中，菲斯克少将警告说，日本人可能发动突然袭击。

“战争不仅可能爆发，而且十之八九会爆发”，他在备忘录中写道。

丹尼尔斯确信调动军舰不仅会刺激日本人，而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而拒绝了菲斯克的建议。威尔逊总统也同意丹尼尔斯的作法，并且下令联合委员会不要再为此事召开会议。风暴自行平息下来，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坚定不移地站在激进派一边，深信不采纳联合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是个严重错误。他在写给马汉上将的信中，对将军舰留在长江的决定深表不满。他说：“为将这些舰只调回基地，我已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在1914年4月英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的那场危机中，罗斯福在他的公开言论中采取的态度就远不是那么克制了。约四年前，墨西哥的年迈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被一场革命赶下了台。在往后充满暴力的混乱局面中，铁腕人物维克多利亞诺·韦尔塔夺得了全国的领导权。威尔逊宣布美国希望“墨西哥建立有条理的、正义的民主政府”，拒绝承认“不能进行对话”的韦尔

塔。美国海军的一个中队在加勒比海墨西哥沿岸摆开了架势，以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当时约有四万名美国人居住在墨西哥，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约十亿美元。4月9日，几名非武装的美国水兵在坦皮科登岸，准备装运业经采购的一批供应品，被墨西哥人作为人质抓获。尽管这些水兵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哈里·梅奥海军少将却擅自要求墨西哥就此公开道歉，并以21响礼炮向美国国旗致敬。墨西哥方面很快就对此事表示歉意，但韦尔塔却不愿向美国国旗致敬，除非美国人也向墨西哥国旗表示敬意。梅奥不同意这样做。

局势很快就恶化了。威尔逊反对塔夫脱时期所谓“美元外交”的作法，想与拉美各国改善关系，但以“有条理的、公正的法治进程”作为拉美各国自治的条件。为达到打倒韦尔塔的目的，威尔逊要求国会采取“确保国旗尊严的必要行动”。国会尚未授权采取行动，总统就接到消息说，一艘给韦尔塔运送大量武器的德国船已驶抵维拉克鲁斯海面。4月21日在总统的命令下8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企图夺取海关及那艘德国船。翌日，又有3000人登陆，但遇到顽强抵抗。当海军一个旅的兵力控制了维拉克鲁斯市区时，已有126名墨西哥人和19名美国人阵亡。

“在美国西部，主张打一仗的情绪就像燎原烈火一般”，罗斯福说。“一般看法认为，既然美国终于采取了军事行动，就应该毫不妥协地战斗到底。许多人、许多报纸都公开主张将它吞并掉是解决墨西哥问题的惟一途径。这一呼声正在不断地高涨。”

第八章 备战

1914年8月1日，罗斯福说：“今日是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此时，欧洲大陆正急剧地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乱之中。“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多年来，民族主义的纷争、王朝之间的倾轧使欧洲局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奥匈帝国王储弗朗兹·费迪南德大公遭到暗杀，岌岌可危的平衡局面顿时分崩离析。两大联盟相互对立，一个由英国、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组成，随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个联盟；另一个则由德国、奥匈帝国及土耳其组成，注意力集中在墨西哥的美国人，眼见欧洲40年的和平遭到军事冲突的破坏，都茫然不知所措。

德国向俄国宣战的那天清晨，罗斯福刚从外地回到华盛顿，听到这一消息后，他认为美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匆忙赶回海军部，但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睡梦中。显然不知道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幕即将开演”，罗斯福对在坎波贝洛临产（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的埃莉诺这样描绘了当时的情景。罗斯福与作战助理布雷德利·菲斯克将军一起劝丹尼尔斯下令将派往维拉克鲁斯的舰队调回原地。但是罗斯福说海军部长“根本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因而舰队仍呆在维拉克鲁斯。看来丹尼尔斯“由于自己对人性的信念及诸如此类的理想主义的看法遭到这样粗暴的冲击而感到十分沮丧。我就独自开始了应变的准备，并且制定海军应战方案”。

由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德国对西半球怀有帝国主义野心，富兰克林因而一直持有戒心，几乎从战争一开始他就采取了亲协约国的立场。他在战争初期，就为英国部队登陆、阻止德国向比利时挺进而不胜欣喜。有一次，罗斯福和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爵士在都会俱乐部共进午餐时，发现德国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坐在邻近的一张餐桌旁，试图偷听他们的谈话。罗斯福说：“我完全了解，要按我的意志办事，我就不主张中立”，罗斯福的这番话与威尔逊总统的主见是背道而驰的。威尔逊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美国人应“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保守中立，在想法上和行动上都不偏不倚”。

在竞选美国参议员时，罗斯福作为候选人仍然没有露面，他一直呆在坎波贝洛，直到他的第四个孩子——小富兰克林·罗斯福诞生。那个男孩是在罗斯福家一间简陋的接生室，靠着油灯的亮光接生的。家中没有电话，所以埃莉诺阵痛一开始，罗斯福就乘船到缅因州卢比克去请贝内特大夫，但当罗斯福回到家中时，在女仆的帮助下，婴孩已经降生了。

在纽约市，罗斯福以一比四的选票劣势遭到惨败，这原是意料中事。竞选中的挫折给罗斯福留下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认识到，要想在纽约州获胜，不能公开和坦慕尼厅唱对台戏；而民主党人要想取胜，进步党人和忠于民主党的人们就必须共同努力。

罗斯福回到海军部之后，就与西奥多·罗斯福、伦纳德·伍德将军、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一起为美国做好战备工作而大声疾呼。罗斯福干劲十足，甚至达到不服从上级的地步，到处发表讲话，写文章，强调建设强大海军的必要性。“我们的国防必须扩大到整个西半球，必须向海洋延伸一千英里。”他说。“我们必须建设这样一支海军，它不仅能保卫我们的沿海，我们的领土，而且也能在战时保卫我们的商船。”他制定了使海军能有五万后备军的计划以及一项让大学毕业生在安纳波利斯港受短期训练后参军的方

案。

罗斯福动了阑尾切除手术后正在坎波贝洛休养时，丹尼尔斯通知说总统已在7月21日指示陆海两军部长在国会11月复会前准备好大规模增加军种实力的计划。听到这一消息，罗斯福大为喜悦，遂于8月月中返回华盛顿。这时丹尼尔斯休假去了，罗斯福以代理海军部长身份着手为充分利用海军的造船能力而制定计划。“就要大干一场了”，他满怀信心地对豪说道。总务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全面扩军的建议，建造156艘军舰，耗资达五亿美元；其中包括十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五十艘驱逐舰、六十七艘潜艇，同时增加海军人员编制。威尔逊批准了这项计划，它为美国海军实力确定了一个新标准，“不亚于任何国家的”海军，包括英国海军在内。这项计划甚至超出了海军联合会的主张。总务委员会提出的这项建议虽然得到了主张备战的人们的大力支持，但遭到进步主义和平运动人士的攻击。他们警告说，这项计划是帝国主义分子、军国主义分子、垄断集团及银行家们结成的罪恶联盟的产物。在美国中西部，反对备战的情绪尤为激烈；来自这一地区的国会议员们极力阻挠迅速批准威尔逊的扩军计划。

罗斯福完全支持威尔逊的扩军计划。当时，罗斯福在妻子和医生的坚持下已赴大西洋城治疗喉炎。在那期间，他留心注意报上关于威尔逊正考虑任命他为陆军部长的推测。无疑这些说法是由路易斯·豪授意散布的。当时的陆军部长林德利·加里森在总统拒绝接受他的有关普遍进行军训的主见后已宣告辞职。豪纠集了一些军官、商人、工会领导人及几家报纸支持罗斯福出任陆军部长，但总统威尔逊对罗斯福出任陆军部长一事显然不予以考虑。罗斯福返回华盛顿没几天，埃莉诺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以罗斯福的舅舅的名字起名为约翰·阿斯平沃尔·罗斯福。

当时美国空军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但从一开始罗斯福就坚信如不重视空军，一个国家的战备就是不完美的。罗斯福一当上助理海军部长，就力图扩大海军航空兵种。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指示海军军官们注意欧洲局势的发展。他并且遣派人员到国外去采购飞机和飞机发动机，运回美国进行研究。当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抱怨说很难完成这一任务时，罗斯福回答说，可以不择手段地搞到一架完整的海军飞机。

在往后的两个月里，与德国是战是和，美国一直举棋未定。威尔逊虽然深信参战在所难免，但鉴于舆论，却不能急于从事，只得等待时机的成熟。罗斯福在从加勒比海匆匆赶回来后感到沮丧，并急于采取行动。他当时不了解威尔逊面临的困难。20年后，罗斯福回想起在战争前夕与威尔逊会见时的情景：

我去见总统，对他说：“威尔逊总统，我谨向你请求准予将关塔那摩的舰队调回原地，赴海军船坞加以清整，并且作好战斗准备，以便参战时投入战斗。”总统答道：“罗斯福先生，很遗憾，我不同意这样做。”我继续请求，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将舰队调回的理由，只是说：“不，我不想把舰队调回本国。”这样，作为海军的一名负责人，我只能说“是，那好吧”，然后便告退。我走到门口，威尔逊却说：“回来，我打算向你谈谈我不能公开谈的事，我应该向你说明一下，我不能通过备战采取任何会被历史学家说成是美国对其盟国采取的不友好的行动。”

没过多久美国便参战了。为了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船主们要求海

军为他们提供大炮和武装护卫人员。罗斯福在海军的库存中仔细查看，发现了六门六英寸口径的火炮，并认为，根据从前的一项法律，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将这些火炮租给轮船公司。威尔逊这个条文主义者不愿意去钻法律的漏洞，而是要求国会批准为商船提供武装的立法，威尔逊为此而提出的法案在国会遭到一些人的阻挠，以致未被通过。威尔逊说这些人“是一帮除了自己谁也代表不了的任性之徒”。国会一休会，威尔逊就通过行政命令使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对这项法案的报复。德国人用鱼雷击沉了三艘美国商船，使美国人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心情沉痛。4月2日召集了特别国会会议。人们预料他将要求国会对德宣战。

那天天刚黑，富兰克林与埃莉诺就离开R街2131号的新居前往国会山。这时天正下着毛毛细雨。每个人都想亲耳听听总统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罗斯福费了好大劲才给妻子搞到一张入场券。此时，国会山笼罩在一片蒙蒙雨雾之中。部队已出动，在四处守卫，特工人员在各个大厅走来走去，以防和平主义分子搞示威活动。晚上8点30分，全体众议员就座，最高法院的成员都坐在议长对面；内阁部长们坐在众议员的侧后方；各国外交使节身穿夜礼服，有史以来首次出席国会会议。随后参议员每组二人，鱼贯进入会议厅，其中大多数都手执小小的美国国旗。过了一会，门卫宣布：“美国总统到！”人们站了起来，欢呼鼓掌达3分钟之久，其热烈程度在国会历史上前所未有。

威尔逊不慌不忙地开始讲话：“我之所以要求召开这次特别国会会议，是因为必须作出，而且立即作出重大的，十分重大的政策抉择。”威尔逊扼要地回溯了美、德之间的争执，说德国用潜艇袭击商船是“对全人类的战争行为”。接着他指出，武装中立的政策已被证明是不现实的，而不参战就只有屈膝投降，“我深深感到我所要采取的步骤是严重的，甚至是惨痛的，我也深深感到这一步骤所包含的重大责任……我建议国会宣布德国帝国主义政府在近日的所作所为已完全构成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战争行为，并正式接受强加给它的交战国的地位……我们务必确保世界上的民主制度。”

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怀特曾参加南北战争，对协约国一直持同情态度，他率先起立，接着全体与会者——包括罗斯福夫妇在内——都站起来鼓掌并尽情欢呼。大法官怀特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有的听众兴奋得抓住临坐的人，拍拍他们的脊背，表示祝贺。埃莉诺“聆听”完威尔逊的讲话之后，“对将会发生的变化有些茫然”。罗斯福夫妇二人一回到家中，富兰克林就起草了一篇向报社发表的书面谈话。“威尔逊总统的讲话最明确地表达了美国的尊严和它所追求的目标”，罗斯福学着威尔逊的雄辩之辞说道：“这篇讲话对每个真正的美国公民，无论其政治信仰、种族出身如何，无论来自何方，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第九章 决定胜负的战争

协约国处于危机之中，战争结束的日子遥遥无期……美国为战胜发动战争的德国，就应当付出自己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英国海军基地的反潜艇安全网的出入口打开了，六艘饱经风霜的驱逐舰在大西洋一起一伏的波浪中从昆斯顿驶进了港口。军舰抛锚时，一片欢呼声、汽笛声在英国基地四周的上空回荡。1917年5月4日，第一批美国军舰驶抵欧洲海域，参加击溃德国潜艇的战斗。驱逐舰停泊稳当之后，约瑟夫·陶西格海军中校向指挥这支舰队的海军中将路易斯·巴利爵士报告。巴利向陶西格问到驱逐舰在什么时候能出海作战，陶西格肯定地回答：“长官，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

美军已做好参战准备这番话受到大西洋西岸人们的赞赏——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好体现了这种精神。美国对德国正式宣战之后，罗斯福就立即着手执行动员海军的任务。他到处奔忙，征召大量海军人员，下令扩大海军训练营，为海军订购大量军用物资和装备。主动地提出意见。“找罗斯福谈谈吧”，这句话成了战时华盛顿的口头禅。罗斯福办事的这种高效能引起白宫的注意。宣战后不久，罗斯福应召去白宫觐见威尔逊总统和陆军参谋长休·斯科特上将。“助理部长先生，对不起，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把能够买到的战备物资全买光啦”，威尔逊向罗斯福眨眨眼睛说。“你得把物资分一部分给陆军嘛！”

罗斯福虽然有五个年幼的子女，他还是打算辞职，穿上军装，奔赴前线。这不仅仅是出于爱国心，而是因为西奥多·罗斯福就是沿着这条路登上总统宝座的。西奥多·罗斯福在美西战争中当过骑兵，他三番两次鼓励罗斯福参军，这使他妻子埃莉诺深为不满。而威尔逊和丹尼尔斯却劝告罗斯福，说什么继续担任助理海军部长也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位三十五岁的助理海军部长所具备的优秀品质——有胆识、办事灵活、充满自信心、敢于冒险——在这场战争中是十分可取的。威尔逊和丹尼尔斯不愿在此时失去具有优秀素质的人。伦纳德·伍德也要求罗斯福继续留在海军部。“富兰克林无论如何都不宜考虑利开军部的问题”，他说。“在目前情况下允许他利开海军部会是国家的灾难。”

总统威尔逊向全国发出了战斗号召：“……武装起来，最大限度地武装起来！……”然而在波托马克河两岸，人们对美国为战胜德国到底要做多大贡献怀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一般想法是美国将给协约国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也可能派遣一支不大的海军部队。谁也没想到在往后的一年半之中，美国军队的总人数增到了四百万，其中约一半驻扎在法国，同时美国的工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奇迹。美国参战时，海军部尚未制订作战计划。4月之中制定的计划也仅仅是派遣战列舰与驱逐舰在美国大西洋海岸巡逻，同时在太平洋保持一支强大的舰队监视日军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约瑟夫·丹尼尔斯与罗斯福之间较少地发生摩擦是不太现实的。两人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处事谨慎的丹尼尔斯要求采取克制态度，罗斯福则有所不同，他急于采取行动，并显然认为自己比丹尼尔斯更善于领导海军作战。

威尔逊总统一旦作出派遣美国部队到欧洲作战的决定，海军就得承担运送部队的任务。运输部队需要大量船只。每运输一个陆军师的兵员，就要用

四倍的船只运送其装备给养。由于美国几十年来对发展商船不十分重视，因此船只极少，几乎得从零开始。为大量营建商船成立了应急船舶公司。在新船造成之前，海军没收了 1914 年以来闲置于港口的大约 60 万吨德国船只，其中包括 5.6 万吨豪华邮船“发特兰号”，该船成为“海中巨兽号”运兵船。1917 年 6 月，运送美国部队的第一支船队抵达法兰西。第二年夏天，每天有一万名美国士兵在布列斯特及其他法国海港登陆，在此期间美国未曾损失一只海船或一兵一卒。海军本身的力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强了。1917 年底，海军已有 269000 名官兵，而在宣战时海军只有 6.7 万。战争结束时，海军的兵力几乎达到 50 万男女。海军第一次接受 11275 名女兵，其中有埃莉诺·罗斯福的社交秘书露西·默塞尔，志愿当了海军“文书女军士”。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丹尼尔斯和本森过分地谨小慎微，因而未能对协约国面临的危机迅速地作出反应，为此罗斯福甚为恼火。他所发出的备忘录如果不是目空一切，也达到了鲁莽无礼的程度：“时间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流逝，多么希望见到美国采取具体行动啊……我们若是还打算建造新式驱逐舰，不管建造哪种型号的军舰，现在就得提出预算来……很可惜，情况实际上并未好转，许多本来该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做成……”1917 年 7 月初，罗斯福对考尔斯上将说：“海军部里墨守成规，讨厌死了，我们的方针不是使海军具有攻击能力，只是由于侥幸取胜，全国就一直认为海军继承了优良传统。我觉得今后非得吃大亏不可。”罗斯福不仅在私人函件和政府内部文件中诉说自己的不满情绪，还在公开的讲话和文章中申明了这些观点。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总统以后，观察家常常提到他乐于采纳新政策或新计划，只要这些政策或计划看起来似乎可能成功；而当这些政策或计划不能发挥作用时，他又用更大胆的新计划去掩饰原计划的失败。罗斯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极力推行对付潜艇威胁的大胆计划时，人们就开始注意到罗斯福的这一特点。“他是一位敢于在失败中摸索前进的伟大人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担任海军主要教官的埃默里·兰德上将这样说道。1917 年，罗斯福想出了两个主意：采用一批小舰只进行反潜巡逻，在北海布雷，构成一个使德国潜艇不能进入航运线的巨大的防护带。专家们认为这两个建议都是不太现实的。但由于罗斯福的坚持，并且使用了巧妙的招数，这两个主张得到了实行，但其结果却是成败参半。

1917 年夏天，罗斯福确实担心德国潜艇随时有可能出没于美国沿海，来攻击商船或炮击没有设防的港口。“万一德国潜艇到达坎波贝洛湾开始炮轰伊斯特港或普尔港，我坚决要求你将孩子们带到森林中去”，罗斯福这样警告他住在坎波贝洛的妻子埃莉诺。“不要顽固地呆在原处不动。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虽然这种可能性只有 1/5，但毕竟还有这么一点可能性……”为防范在驱逐舰造成之前发生某种紧急事件，罗斯福坚决要求建造长达 110 英尺的木壳驱潜船，藉以执行沿海巡逻任务。这种船一共造了四百多艘。由于这些船只质量极佳，其中许多都能摆渡大西洋。这支“木板船队”多半是由后备役人员驾驶。这些人员在乘船横渡大西洋前都没有航海经验，但在从摩尔曼斯克到地中海的水域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标志着行政权迅速向联邦政府集中的开始，这种集中到罗斯福执行“新政”时达到了顶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始终支持这种集中。德国的战争机器的效率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美国参战前就要

求总统成立国防委员会以便制定工业动员计划。威尔逊当时不主张采取“战争恫吓”手段，直到宣战前夕他才接受这个建议。在国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国家成立了一大批权力很大的机构，每一机构掌管某一经济部门，其权力之大是以往任何联邦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战争结束前，威尔逊手中的权力比包括德皇在内的任何战时领导人的权力都更大。

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总是提倡锻炼身体，他请耶鲁大学足球教练沃尔特·坎普到华盛顿来，为海军部官员办了个训练班，自己每周四天在早上七点一刻就离开宅邸，去和海军部的其他官员以及国会领导人一起在坎普指导下进行训练。

海军部经过整顿终于能够有效地指挥战斗了。这时，罗斯福提议由他或者丹尼尔斯去战区亲自视察海军的设施。“我们俩人中得有一个去亲眼看看战区的实况”，他对丹尼尔斯说。“否则，就只能像摸着黑下棋一样指挥战斗。”威尔逊希望丹尼尔斯留在身边，随时听取他的指示，因此丹尼尔斯去不成了，就派罗斯福去视察战区。这正中他的下怀。罗斯福乘坐一艘新近下水服役的驱逐舰——“戴尔号”，于1918年6月9日跟着一支护航队驶离商业城纽约。这是罗斯福第二十一次横渡大西洋。

在写给埃莉诺的很长的日记信件中，罗斯福描述了他的这次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充满着他对大海的热爱。出海的第一个夜晚，夕阳的余辉勾勒出五艘大运输舰的轮廓“影影绰绰，像静止一般毫无生气。然而，军舰载着它的人员，前进着……明天清晨，军舰会从黑夜的掩盖下重新出现，破浪前进。去迎接新的一天。上千名海军官兵将在前甲板列队——如果敌人的潜艇不在黎明时分乘机捣乱……”但驱逐舰毕竟不是游艇，“戴尔号”很快就遇到风浪了，前后左右颠簸起来。而富兰克林对此却洋洋自得。“军舰内，人们随时随地都得抓住一点东西才能保持平衡，走路时也必须一手抓牢后另一只手才能松开。不少陶瓷器皿都摔碎了。大伙儿无法在餐桌旁就餐……不得不用绳子将自己联在舰肋板上，然后才能坐下来腾出手来端住盘子。舰上有三名军官晕船，到现在为止，我一切尚可。”

7月21日，“戴尔号”军舰在修好发动机后驶抵英格兰的朴次茅斯港。罗斯福受到西姆斯将军及英国海军部其他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在随后的十天当中，罗斯福忙于听取一个又一个汇报并视察了英美两国的海军基地。罗斯福即次访英的高潮是在白金汉宫觐见英王乔治五世。罗斯福对欧洲王室一直很关注，因此这次会见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国王面带迷人的微笑，会客时态度和蔼，思路敏捷，给人以一种亲切感”，罗斯福在寄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他的身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矮小。我觉得他的面容也比我们从照片上看到的更加坚毅，这也许是他讲起话来一针见血的缘故。后来他讲起德国在比利时所犯的罪行，气得连牙齿都咬得格格作响。”当罗斯福告诉英王他在德国求学时曾亲眼看到德国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工作，英王说他也在德国求过学。“我在德国也认识一些人”，英王眨了眨眼睛说。“但坦率地说，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一个有教养的德国人。”

在罗斯福得肺炎后休养期间，埃莉诺吃惊地发现她的丈夫同露西·默塞尔的隐私。埃莉诺在罗斯福被人从“海中巨兽号”抬走后收拾他的个人什物时，发现了他的前社交秘书写给罗斯福的信。25年后，埃莉诺对约瑟夫·拉希说：“我的一切全完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视自己，正视自己周围的事

事物物，正视现实。”看来这证实了埃莉诺一贯的想法：自己并不漂亮，没得到丈夫的爱。她不能肯定露西与富兰克林的关系到底什么时候发展到这种地步。到了1917年夏，种种迹象加深了她的怀疑，使她凄坐不宁。露西四月间离开埃莉诺，到海军部去担任文书工作，她住在佛罗里达大道的德凯特公寓，离罗斯福的住所不远。埃莉诺尽管每年都带着孩子去坎波贝洛走一趟，那年她却不愿意去。她觉得丈夫心里巴不得自己带孩子离开，就决定推迟行期。埃莉诺后来到坎波贝洛去了以后，富兰克林于1917年7月16日给“最亲爱的宝贝”写了封信，显然是想向她赔罪。信中说：“你不在，家里空空荡荡，我实在受不了。你若是认为整个夏天我都不希望你在我身边，那你就未免太多心了。我不愿离开你，你是晓得的！”翌日，罗斯福又写道：“你走后，我真是度日如年，万分想念你。你不在家，想起这事就心焦。”

无论罗斯福对这件事有何种内疚，当他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报道后，心中就坦然多了。那篇报道说，食品局的勤俭节约处选定罗斯福的七口之家（加上家中的十名佣人）作为大家庭在节约方面的模范。报道说：“罗斯福太太自己采购物品，家中的厨师力争不浪费一点食物，洗衣服的女佣人也绝不多用一点肥皂，佣人们互相监督，厉行节约。”报道引用埃莉诺的话说“叫十个佣人帮助我勤俭持家，这不但很有必要，而且是件很有益的事”。

埃莉诺·罗斯福过分严肃，到了一本正经的地步，她有时犹如清教徒一般，对别人存有戒心。兴奋时，她那声调嫌高的嗓音变得“像琵琶一样刺耳”。而露西则富于女子气，很妩媚，有南方淑女那种能使男人感到轻松自如的本事。她的一位亲戚说：“她高高的身段，端庄而又文静。肌肤细润，她笑口一开，真是迷人极了。”罗斯福由于动员海军这一事务的繁重，常常“不谙情理，易于激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此他所追求的是比自己的妻子更灵活、更温存的伴侣。而对露西来说，她所喜爱的是他的美貌和地位。詹姆斯·罗斯福说，他母亲后来得到了证据，证明罗斯福和露西曾以夫妻名义在弗吉尼亚海滩旅馆过夜。

埃莉诺结婚十三年，生了五个子女，竟遭到冷遇，丈夫去追求比她年轻貌美的女郎，她感到万分痛苦，主动提出离婚的问题。但据安娜那篇未发表的文章说，埃莉诺“要求罗斯福花点时间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再给她答复……他主动保证要结束任何‘浪漫关系’，似乎是认识到他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罗斯福为什么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离异会给子女造成不良影响。他的母亲威胁说如果他抛弃埃莉诺，就同他断绝母子关系，而且离婚会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毁灭性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使罗斯福必然要把婚姻关系维持下去。

罗斯福夫妇最后重归于好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原先那样融洽了。埃莉诺可以原谅罗斯福，但对过去的事总也忘不掉。她一直到死都在医治心灵上的创伤，但是又不让它完全愈合。她变得越来越具独立性了，再也不是丈夫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是要走她自己的生活之路。“我母亲有她独特的铁一般的执拗劲”，埃莉奥特·罗斯福这样说。“她痛下决心不再同父亲有任何来往，尽管父亲尽力委曲求全地设法在她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再没恢复真正的夫妻关系，而是建立了某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终生；它变得极为密切、融洽，充满了爱——但从不是肉体的爱，而是精神上的爱……但在他们之间很少有轻松愉快的时刻……他们在这短暂的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快快活活地享受人生的乐趣。”

第十章 不会停止的战斗

富兰克林·罗斯福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随着情况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战斗方式。停战协定一生效，他就立刻将注意力从如何作战转移到复员工作上来……富兰克林在新的形势下高高地举着战斗的火炬，一鼓作气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和平的缔结给富兰克林带来了新的使命。1919年1月2日，运输舰“乔治·华盛顿号”缓缓开入赫德森河，然后朝大海方向驶去。罗斯福和埃莉诺同群众一起站在船上，望着曼哈顿高楼大厦那铅灰色的轮廓在地平线下渐渐消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正式使命是去欧洲监督处理美国海军在战争中积累起来的资产。这批颇大的资产包括若干处电台、54个沿海基地、大约八万名官兵及其359艘军舰。对个人来说，罗斯福重返欧洲是想亲眼看看十天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三星期以前，威尔逊总统已经前往欧洲，他是在职期间离开美国的第一位元首。

富兰克林自从和露西一刀两断以后，一直设法向埃莉诺赔罪，更多地关心妻子，抽出时间同孩子们相处。每逢星期天上午都带着全家人到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去，而不是到切维·蔡斯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连罗斯福也没料到，他的这种作法被教会看成是虔诚的表现，竟任命他为教区委员会委员。

1月6日，舰上的无线电传来西奥多·罗斯福逝世的消息。六十年的紧张生活搞垮了西奥多·罗斯福的身体。有人劝告他说，若不从速减轻工作重荷就有可能在轮椅中中了此残生，他听后付之一笑。他说：“好吧，我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干活！”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表明，他将是共和党参加1920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之一。他极力抨击威尔逊总统关于成立国联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着重指出，1918年11月选举时各地的选民都很坚决地反对威尔逊推行的政策。实际上，当威尔逊离开美国前往巴黎时，西奥多·罗斯福对他的诅咒在举国得到响应。“目前威尔逊先生无权代表美国人民”，罗斯福警告他说。“不久前美国人民反对威尔逊的领导。”陪同威尔逊去意大利访问的记者们注意到，他对宿敌的去世的反应先是感到意外，接着就表示痛惜，最后认为是“极大的胜利”。

和会正在召开，巴黎到处呈现着一片狂欢的气氛。各个大饭店门前都飘扬着某个外国权贵人物的旗帜，来自世界各地的恳求者（有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身着长袍由一位面部轮廓分明、名叫劳伦斯的英国人陪伴的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留着小撮胡须的印度支那人）都麇集在巴黎市。这些人都想以邻为壑，为自己谋求利益。推销开发油田和钻石矿的计划。到处是所谓的王位觊觎者、开出租汽车的俄国大公、密探、拉皮条的人、妓女以及皮包里装着通向乌托邦捷径计划的古怪人物。巴黎市民充满了希望，等待胜利的协约国领导人在会议所在地钟表大厅制订建立新世界的蓝图，伍德罗·威尔逊在国内可能会遭到反对，但在巴黎和会上却成了中心人物。欣喜若狂的人群走上街头欢迎来自西方的这位先知，助长了所谓威尔逊具有的救世主变态心理。在有些地方，农民们甚至在威尔逊画像前燃起蜡烛，以示其感激之情。

威尔逊为使与会各国同意把成立国联列入和约的内容，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信并作出了重大的让步。1918年1月威尔逊宣布的“十四条”虽已保证

“公开达成……公开的盟约”，会议还是在幕后举行，没有直接参与讨论的人，譬如罗斯福，对会议进程几乎一无所知。一直到2月15日，罗斯福与夫人埃莉诺乘火车前往布雷斯特去搭乘“乔治·华盛顿号”回国时才看到国联盟约，“我们当时是多么希望国联能成为防止今后爆发战争的机构啊”，埃莉诺在许多年后回忆道。“我们迫不及待地看完国联盟约，当时并没有想象到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

富兰克林坚定地支持国联，但在发现美国人民的情绪正在改变时就认真听取了抨击国联者的反对意见。作为现实主义者，最初他认为国联“仅仅是一种美妙的幻想，是乌托邦”；但经过欧洲战场之行，他坚信，为维护世界和平，有必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现在是理想主义时代，我们应该具有更多的理想”，他说：“在大洋彼岸，所有的男人、妇女、儿童都期待着我们实现我们参战时所抱有的崇高目标。”

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激进主义的威胁也感到不安，因而主张限制言论自由，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在报纸上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1919年9月，丹尼尔不在海军部时，罗斯福代理海军部长，那时库利奇州长要求海军协助他们镇压波士顿警察的罢工，富兰克林·罗斯福镇静自若地答复说，如果准许联邦给予协助，他将按照总统的命令行事。在波士顿市长安德鲁·彼得斯的尽力协助下，罢工的问题解决了，但库利奇却乘机使自己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

在联邦政府任职七年之后，罗斯福感到在经济上碰到了困难，兼之通货膨胀无法加以控制，因而加剧了经济困难。到1919年11月份，生活费用比1914年增加了82.2%；半年之后，其增加幅度达到104.5%。罗斯福的收入比支出多不了多少，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实实在在够破产的条件了。”家中的食品费用、房租、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由罗斯福负担，妻子埃莉诺的个人收入用来给自己和孩子添置衣服，对慈善事业的捐款由两人共同承担。后来罗斯福常对他的助手说，他的工资不知不觉地全都“花光了”。但他对收藏珍品的癖好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穿他父亲留下的外衣，衣服穿到破了为止。两美元以上的衬衣他是决不买的，但他所喜爱的一张邮票、一本书或是一幅图片，不管有多贵，也要设法弄到手。

萨拉·罗斯福在儿子经济困难时帮了他的忙，她经常是这样表示慈爱之心的。罗斯福三十八岁生日时慈母给他一张款额相当大的支票。“我知道你不仅是我的天使，而且是我紧急关头到来的天使！”罗斯福对他母亲说。“因为当前的问题不是为詹姆斯的手术向米奇尔医生付款，医生说可以等……问题是要支付煤气费用、肉类食品费用，不然的话，孩子们就得成为饿殍。作为生日礼物，你的支票对我来说真是太丰厚了，它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你真是太好了。”罗斯福给辞去财政部长、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威廉·麦卡杜的信上说：“我不知道我怎样还能在华盛顿再住上一个冬天。我想，纽约的法律事务够多的了，因而我可以去帮你从我们的共和党朋友手里抢一些生意来。”

“带上美酒、女人，尽情欢唱，还有丰厚的美味佳肴，慷慨激昂的演说，温和而令人振奋的气候，阵阵爱国热情。显然，人们已为之倾倒，就像喝足了烈酒一般。”H·L·门肯在回忆19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美好时光时这样写道。这次大会看来也对罗斯福产生同样的影响。弗朗斯·珀金斯记得当时罗斯福是“身材魁梧，体魄健全，仪表堂堂，招人喜欢……是代表大会

的明星之一”。她说，有一次，他跳过一排座位，匆匆地走上讲台。他的热情一部分也许是由于许多人在谈到副总统候选人时提到他的名字而引起的。罗斯福对提名一事表示感到意外，他后来说，他本想在回家后宣布竞选州长或参议员。“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编造出来我要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说法”，他对和他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兰登·马文说。“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

像在 1912 年进行州参议员竞选时一样，有一项决议案主张政府采取行动通过控制中间商来降低昂贵食品等必需品的价格。那项决议案指出：“我们认为，行使联邦政府的全权，消灭美国商界的这些吸血鬼是政府的正当职责所在。”罗斯福和豪提出的其他建议还有：放宽对农民提供信贷的条件，对城镇住房建造者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整顿铁路的经营管理，联邦政府增加对公路建设的资助，确保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为区别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而在税收方面实行改革，以及政府在经济萧条时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采取赤字开支政策。最后，这项建议要求政府授权发行“繁荣债券”，即短期票据，来为修筑公路、开垦荒地和分配土地筹措资金。20 世纪 30 年代这项建议是反萧条措施的先驱。

罗斯福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是人们思考的一种结果。确定提名考克斯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延续了 18 个小时。然后，考克斯的竞选活动负责人爱德华·穆尔给当时在这顿的考克斯州长打电话，问他喜欢什么人作为竞选伙伴。考克斯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对穆尔说，此事我已考虑过了，我选择纽约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竞选伙伴。穆尔问我：‘你了解他么？’我不了解。事实上，我从未见过罗斯福；但我向穆尔解释说，从代表不同地区的角度挑选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是符合条件的，人们都认为罗斯福在党内是采取独立立场的，而罗斯福又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考克斯知道墨菲厌恶罗斯福，就叫穆尔去请坦慕尼厅的这个头目批准对罗斯福的提名。“墨菲已经上床睡了，但穆尔还是找他谈话”，考克斯在回忆录中接着说。“我可确切地引述墨菲当时所说的话：我不喜欢罗斯福，他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什么名气。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投魔鬼的票，若是考克斯想要我这样干的话。告诉考克斯，我们一开会，在第一轮投票就会提名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

安斯伯里来到讲台提名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时，得到本州代表支持的其他几个候选人已被提到了代表大会。安斯伯里在讲话中说罗斯福年纪不大，但“有担任公职的丰富经验”。艾尔·史密斯和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戴维斯附议支持罗斯福。得到本州拥护的其他几个候选人很快退出了竞选。代表们以欢呼声提名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罗斯福！我们要罗斯福！”代表们一边高呼一边跺脚。根据惯例，这时罗斯福已离开会议大厅。约瑟夫斯·丹尼尔代表他发言。为打消人们对他与罗斯福之间存在不和的猜疑，丹尼尔说：“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代表大会一致确定头脑清楚并有才干的行政官员，纽约州的爱国公民，助理海军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副总统候选人。”

罗斯福把海军部的事务清理完毕之后，提出了辞去助理海军部长职务的辞呈。大约两千名工作人员聚集在海军部大楼门口与罗斯福告别，并送给他一只漂亮的杯子。罗斯福与丹尼尔互致热情洋溢的函件。罗斯福在书函中写道：“这封信并非为了道别——经过这些年的密切交往，我们永远是分不

开的战友。我们之间的友情意味着什么，你了如指掌，我现在所写的，实无必要……”从丹尼尔斯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想法：“他是下午离开海军部的，他走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洋溢着友情，真令人感动。当他似乎是站在我的批评者一边时，我从未凭感情冲动行事。”

8月9日，罗斯福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说，竞选就正式开始。这篇演说是在斯普林伍德罗斯福母亲家门前的台阶上发表的。听众约有五千人，其中有党的领导人、罗斯福的挚友和邻居，以及坦慕尼厅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看到我婆婆家的草坪遭到大批人群的践踏，我真有点为她感到痛心。”埃莉诺说。当有记者向埃莉诺问到她的政治观点时，她愣了一下，想了想，答道：“我的政治观点？啊，对了，我是民主党人；可我从小就被培养成地道的共和党人，后来变成了民主党人。我认为，由民主党治理国家，最符合国家利益，因为我坚信民主党是进步的组织。”

罗斯福的演说为他的竞选提出了两大主题：美国必须参加国联，必须整顿联邦政府，以提高工作效率。“下届政府将面临两大课题”，他说。“处理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急需在国内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不能“以昂贵的军备来建筑坚不可摧的围墙，像东方人那样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沉湎于过去的成就。……我们必须睁开双眼，看看现代文明已变得如此复杂，文明人的生活已与其他国家的其他人的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又不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那是不可想象的。”成立国联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罗斯福接着说，不过他支持这种保留意见，美国不应因加入国联而违反美国宪法。

在谈到国内政策时，罗斯福要求动大手术来解决政府工作效率不高这一问题。必须简化几十年都未变动的国会立法程序，改组政府各部和各机构，提高工作效率高的政府人员的薪金，同时应把达不到较高标准的政府工作人员加以解雇。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还包括合理规划合理地使用全国资源——包括美国人民在内。应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受剥削，不受虐待；应为美国大约500万文盲制定教育计划。

罗斯福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讲演还清楚地表明，此时的罗斯福与十年前竞选时犹豫不决、政治上笨手笨脚的罗斯福相比已判若两人。罗斯福“所讲的每句话都充分发挥了它的威力”，《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这样写道。“罗斯福仪表堂堂，无可挑剔——具有大学足球队标准队员的体魄，简直是一副招贴画中的形象……做几个简洁而有力的手势，或是面带会心的微笑，……他嗓音清脆、洪亮，带有一点男高音，与他那不可捉摸、极为诱人而又定能赢得选票的本领配合得相得益彰，甚至可说是天衣无缝。”

两天之后，罗斯福开始了旋风般的竞选活动，在以后的三个月中走遍了32个州。他和随行的一小批工作人员乘坐私人的“韦斯特鲍罗”车厢，挂在正常运行的列车后面，按精心制定的竞选活动时间表，四出游说。竞选开始时，路易斯·豪并未参加。他在华盛顿一直呆到9月下旬，希望能被任命为助理海军部长，接替罗斯福的职务，但并未如愿以偿。罗斯福指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查尔斯·麦卡锡领导他在纽约的竞选活动办事处，并雇用玛格丽特·莱汉德这位年轻妇女担任助手。莱汉德精明能干，美丽动人，每周薪金35美元。曾在海军部负责公共关系的马文·麦金太尔为罗斯福起草讲演稿，并兼任新闻助理。麦金太尔和他的秘书R·F·卡马利尔随同罗斯福参与竞选活动。豪的一位老朋友，曾为美联社采访海军部的记者斯蒂芬·T·厄尔利充

当先遣人员。厄尔利在罗斯福之前到达罗斯福将要发表演说的城镇，去督促当地的政客组织听众，准备相应的宣传事宜，并了解当地选民的情绪和态度。汤姆·林奇负责筹备竞选经费。因为曾一度参加战争，他拥有一笔不多的资金；此外罗斯福自己还出了 5000 美元，他母亲也捐了 3000 美元，均用于竞选开支。

在选举中民主党的候选人注定要失败，但罗斯福还是竭尽全力继续竞选。他发表的演说和露面的次数总共达一千次。就竞选全国性职务的候选人而论，他所进行的竞选活动规模之大是前所未闻的。他从芝加哥开始，到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然后南下到加利福尼亚，从中西部返回，向北折回新英格兰，继而再向西行，这次是由南线西行，每天发表演说少则六次，多则达到 20 次。罗斯福有时也乘汽车，至少有一次采取了革命性的办法——乘飞机。所到之处，罗斯福呼吁人们支持国联，抨击哈定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故意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想安抚拥护国联的人，又想安抚反对国联的人。罗斯福还转换花招，提出新自由的进步改革，并呼吁无党派选民给予赞助。

罗斯福看到选民对自己的热烈欢迎受到莫大鼓舞，明显地觉得民主党有可能在竞选中出乎预料地获胜。有一次早上罗斯福和汤姆·林奇共进早餐，他说他希望林奇翌年三月和他一同到华盛顿去就职。

“富兰克林，听着”，林奇答道，“你去不成华盛顿。”

“为什么去不成呢？”

“你发表演说时，我到选民中走了走，去了解情况。选民会投你一票，但是他们不会投考克斯的票，也不愿投票支持国联。”

1920 年，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选举权。把詹姆斯安置在格罗顿后，埃莉诺就和丈夫一同进行竞选活动。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思想上毫无准备，很难适应竞选中的乱哄哄的场面。不论她多么疲倦，对她听过许多遍的讲演，也得装出聚精会神地谛听的样子，对陌生的选民们也得笑脸相迎；除此而外，差不多无事可做。同时，她丈夫没有工夫照顾她，他不是准备讲演稿，就是筹划竞选方略，或是和同伴们一起打牌，消遣一下。路易斯·豪是惟一关心埃莉诺的人，豪意识到埃莉诺想在竞选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便开始在晚上找她高谈罗斯福的发言稿，研究竞选策略和变幻莫测的报界的反应。“我感到受到了重视，非常高兴。没有过多久对许多问题，我都参加了讨论。”她后来回忆说。埃莉诺第一次感到在豪的爱吹毛求疵的性格后面，隐藏着机敏的智力，开始理解她丈夫与豪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了。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村家中等待选举结果时，估计到他会被人击败，但失败程度却比他所预料的更为惨重。共和党的哈定和柯立芝在选举中赢得了 61% 的选民票及选举团中的 404 票，而考克斯和罗斯福只得到 127 张选举团的票。在总统选举中，如此一边倒的失败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是未有所闻的。在国会两院的选举中，共和党仍占优势。“选举结果不是山崩式的”，威尔逊总统的秘书乔·图马尔蒂说，“而是地震式的”。在纽约州，在州的各个职务的竞选中，民主党全被击败了。内森·L·米勒取代了艾尔·史密斯的州长职务。大多数评论员都认为民主党由于支持国联而遭到失败。这次失败之所以如此惨痛，是因为威尔逊政府所代表的一切遭到敌对方面的否决，而不仅是选民们反对美国参加国联所致。在公众心目中，哈定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代表和平与繁荣，并使该国有可能重新获得平衡与安全。在词典中大概没有“normalcy”（正常状态）这个词，然而美国人民在 1920 年所渴望获得的

却正是“正常状态”，尽管这种状态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选举结果看来并没有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沮丧或气馁。他以“达观态度”接受了“这次惨败”，没有几天，他就愉快地称自己是“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前副总统，已被囚禁。（误传为已死）。”他在研究自己的情况时发现，他确实没有什么损失。他第一次在全国政治舞台上亮相，在全国有了一批追随者，改进了自己的竞选技能，建立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助手班子，他们的专长补充了路易斯·豪的专长。他在这次惨败后不久写信给史蒂夫·厄尔利说：“感谢上帝，我们俩人都还年轻。”

第十一章 病魔缠身

罗斯福在他罹病的几年里经历了一场极为深刻的变化……身心的痛苦与折磨扫除了他先前表现出来的不太严重的傲气，他变得非常热心，风貌很谦卑，思想很深沉……彻底地成为一个同情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者。

罗斯福现在是十年来第一次不在政界担任职务，他必须养活和教育他的偌大的家庭。因此，他积极参加米特—马文—罗斯福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对于一个投机商、做股票生意的人和善于经营的人说来，2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罗斯福也被吸引到华尔街来了。哈定宣称，“美国的生意是每个人的生意”，而卡尔文·柯立芝说得更使人跃跃欲试，“合众国的生意就是生意”。罗斯福似乎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在竭力效法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达十年之久之后，他现在要像他父亲那样，当个有作为的生意人了。

罗斯福挑选了一项工作：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是全国最大的信托债券公司之一。他负责主管该公司的纽约办事处，年薪 25 000 美元，为他当助理海军部长时的收入的五倍。罗斯福的老朋友，巴尔的摩太阳报系的拥有者范—利尔·布莱克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他也像罗斯福一样，很喜欢驾驶游艇，也喜欢紧张的生活。尽管这个公司的董事们想排斥他这个在保险业务上缺乏经验的人，布莱克还是说服了他们，因为罗斯福的名字，他在华盛顿、奥尔巴尼以及在有组织的劳工中的广泛交际对公司说来是很有裨益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工作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又和全家一起住进了第 65 街的宅邸。每天上午他在百老汇 120 号的信托储蓄公司上班，下午就到华尔街 52 号他的律师事务所去。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说：“我很高兴再次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这两项不同的工作看来衔接得不错。”他们仍在海德公园村共度周末。他登记的投票地址仍在原处。孩子们也长大了，最小的 5 岁，最大的已经 15 岁了。他尽量设法和孩子亲热起来。埃莉诺也不像战前那样在茶点和缝纫这种温文尔雅的小圈子里转了。她已经不是 15 年前那个胆小的少女了。她学打字，学速记，也学烹饪，积极参与妇女选民同盟的活动，加入了几个慈善团体的委员会，并与社会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萨拉·罗斯福因埃莉诺不能再给她的朋友们添茶倒水，也不再陪伴她而感到沮丧。

这时候，富兰克林埋头做他的生意。他对一个前来采访的人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年轻的资本家”，并把债券事务说成是“工业的一个平衡轮”，因为它防止人们弄虚作假。罗斯福在公司里究竟起多大作用现在还争议不休，但是布莱克把纽约办事处在罗斯福就职后的第一个月即 1921 年 2 月份的工作说成是“世界第一流的”。

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一个在竞选中失败的副总统候选人是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因此，他广泛参与政治及社会活动，以吸引公众注意。他对组织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给予必要的帮助，并且领导了为盲人灯塔会筹集二百万美元基金的运动，担任大纽约童子军委员会主席，也是哈佛监督委员会委员。他发表政治声明，保持通讯关系，这使他能和 1920 年竞选中的友人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敦促全国各地的民主党领导人草拟开明的内政日程，为 1922 年的竞选作准备。

威尔逊主义崩溃后，党内衍生出派别，在北部和东部的城市派以及在南

方和西方占优势的农村派之间产生了分裂。罗斯福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生气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在观点上是适度进步的。在纽约州北部，他计划重建一个崭新的民主党组织为下次竞选作准备。下次竞选中，他很可能是州长或参议员的候选人。党的重建从基层开始，每一个有一定声望的党员必须交纳一小笔党费，以便使党的机构得以灵活地运转。

8月上旬的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罗斯福驾驶着范—利尔·布莱克的140英尺长的游艇“萨巴洛号”来到坎波贝洛。布莱克邀请他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岛上去看看，罗斯福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样他不用坐火车长途跋涉了。他的新秘书玛格丽特·利汉德写信给埃莉诺说，“他出发的时候看上去很累”。“萨巴洛号”在缅因州附近海面上遇到了坏天气。布莱克游艇的艇长对这一带水域不熟悉，因此罗斯福接过来掌舵。接连几个钟头，他驾着轮船向东北方向驶过弗伦奇曼湾和马蔡亚斯湾，穿过大麦纳和卢贝克海峡。海图没用了，熟悉的地物标志被重重大雾所吞没。罗斯福就凭着浮标钟声和低沉的雾角声航行。连富有经验的布莱克也感到担心。罗斯福请他放心，说他曾驾驶一艘快速驱逐舰安然通过这个水域。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很累人的事情。直至“萨巴洛号”在韦尔什普尔港停泊后他才松了口气。埃莉诺带着孩子们和路易斯·豪一起到码头上来迎接他。为商讨1922年的选举前景，路易斯·豪来到了坎波贝洛。

罗斯福尽情享受愉快的假期。他和孩子们一同游泳，一同打网球、打垒球，一同爬礁石。8月10日，他们乘24英尺长的单桅小帆船“维力奥号”出航。他们在一个小岛上看见一股渐渐升起的蓝烟，就上岸参加扑灭林火的战斗。据安娜说：“那情景真是令人生畏，当你站在一棵松树旁边，看着它突然起火，听见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心里觉得骇人。”到了下午，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罗斯福后来回忆道：“我们的眼睛都给烟熏模糊了，浑身沾满了烟灰，精疲力竭。”他建议去游泳，带着大家慢跑了两英里路，穿过坎波贝洛，到了格伦塞文湖，这是一个淡水湖。到了那里，大家都下水了，痛痛快快地一头扎进海湾冰凉的水里去游了一阵。每次这样游泳后，他都会觉得精神焕发。可是这次罗斯福大吃一惊，他“并没有像所预料的那样得到平时游泳时的乐趣”。

回到家里，邮件已经送来了。他穿着一件湿漉漉的游泳衣坐在门廊里看了起来。过了一会，他觉得发冷，太劳累了。他后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发冷，又浑身疼痛，很早就上床了，以为是腰部有点风湿痛。夜间他起来上厕所，埃莉诺发现他是爬着去的。第二天清晨，安娜用托盘送来了早点，他对她高兴地笑笑，还说了句俏皮话。当他刮脸时，他的左腿软弱无力。他说：“我相信，我腿上的毛病是肌肉过分疲劳，运动运动就会好的。可是这条腿不听使唤了，后来另一条也不行了。”

几天以后，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喃喃地对豪说：“路易斯，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他脸上露出了疼痛和绝望的表情。埃莉诺忧心忡忡，请来了乡村医生。E·H·贝内特医生诊断后说他患了重感冒。可是他的病情急剧地恶化，把医生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剧烈的疼痛扩散到他的背部和两腿。不久他胸部以下的肌肉就都麻木了。甚至床单盖在腿上他也会觉得疼痛。他的体温一下子升到华氏102°，暂时失去了对身体机能的控制。孩子和别的客人都给打发出去了，家里就留下埃莉诺和豪侍候他。

有两个星期，埃莉诺就睡在他丈夫房里的帆布床上，不分昼夜地护理他。

她给他洗澡，给他喂饭，还要想办法使他打起精神来。而她自己却因为大夫甚至不能诊断出他的疾病而日益焦虑。她能求助的惟一的人就是路易斯·豪。豪不分昼夜地守在朋友的身旁。埃莉诺说他“从那时起他便把整个心献给我丈夫的未来事业了”。他们遵照基恩大夫误人的建议，一连几个小时地为躺在床上的这个病人按摩四肢，后来却发现这种按摩不仅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而且会使他已经瘦弱的肌肉进一步受到损害。

罗斯福病倒后过了两个礼拜，他的舅舅弗里德里克·德拉诺把波士顿小儿麻痹症专家罗伯特·W·洛维特大夫请到坎波贝洛来。根据罗斯福向他叙述的病情，他怀疑罗斯福患了小儿麻痹症。在经过检查之后，他的诊断得到证实了。但是医生认为病并不严重。他告诉埃莉诺说，她的丈夫有可能完全康复。

洛维特命令立即停止使病人痛苦的按摩，但又说，除了帮助睡眠的溴化物药剂外，其他药物没有什么用途。他建议用热水沐浴，“因为热水沐浴能使病人得到鼓舞，因为在水里病人的两腿可以自由地活动”。他特别强调要使病人打起精神，因为精神萎靡不振有时会使人烦躁不安……”因此，每人都为了使他高兴而装得非常乐观，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在8月月底结束了每年一次的欧洲旅行之后，她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走到病榻旁边去看他的情况：“我知道，为了富兰克林，我得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他大概也是为了我才装得满不在乎。因此这次见面还是很使人高兴的。”

罗斯福的病给豪带来了交际上的危机。豪清楚地意识到，“小儿麻痹症”和“瘫痪”会对他的朋友的政治前途带来可怕的影响。他想避免在罗斯福的病情好转之前在报端登载有关罗斯福患病的消息。在坎波贝洛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快传到了外界。豪以一向对新闻记者开诚布公而闻名于世。但是这次他没有向来自东港的新闻记者透露任何实质性的情况。直到8月27日才首次出现关于罗斯福病情的报道。新闻报道说这位前副总统候选人在害了一场重病以后“渐渐康复”，没有提到小儿麻痹症。

9月中旬，豪巧妙地把罗斯福转移到纽约市的长老会医院。弗里德舅舅安排了一节专用火车车厢，把他从东港接上火车，一直开到纽约市。这样就不用波士顿换车了。在老朋友富兰克林·考尔德上尉的指导下，罗斯福被放在一张临时改装的担架上从楼上病房抬了下来，又抬过一个陡坡到达罗斯福码头。他被抬进一艘汽艇的底层，经过海湾，到达东港。担架每走一步都引起他一阵剧痛。但当罗斯福看见七岁的小富兰克林时，他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令人愉快的笑容”。为了不让记者们看见他这样可怜地躺在担架上，豪骗他们说，汽艇要在镇那头很远的码头停靠，然后却悄悄地在近处的码头把他抬上岸了。人们把担架从车窗抬进了火车车厢里。之后不久《纽约世界报》记者前来采访时，“罗斯福先生正在抽烟，并说他胃口满好。尽管他还不能坐起来，但他说他觉得舒服多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对于罗斯福说来是极阴暗的，因为他面临疾病的危机。他的视力暂时减退，右膝僵硬收缩，右腿弯曲，为使左右腿伸直，不得不上石膏。每天罗斯福都好像在中世纪酷刑架上一样，要把两腿关节处的楔子打进去一点，以使肌肉松弛。但在富兰克林身上蕴藏着极大的勇气。不多久，就出现了病情好转的迹象。他手臂和背部的肌肉强壮起来了。最后他能够坐起来了。

1922年2月，他第一次戴上了用皮革和钢制成的架子，这副架子他以后

一直戴着。既很累赘，戴久了还会引起疼痛。借助于这副架子和拐棍，罗斯福就能凭藉身体和手臂的运动来“走路”了。

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若是一辈子残废，政治就成了他惟一的出路。在政治上，需要的是头脑，而不是身体。豪以罗斯福的名义和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们保持联系，并敦促罗斯福定期发表声明来表明自己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他也让埃莉诺走出去，让公众团体和个人不忘记罗斯福的名字。

1922年秋天，罗斯福回到信托储蓄公司工作。开初他每周工作两天，慢慢增加到三天，最后每周工作四天。范一利尔·布莱克在他的健康恢复期间很大方地付给他工资，并让豪也进公司工作，当他的助手。罗斯福不仅需要工作以给他的生活带来活力，也不仅以此来向别人证明他不是个毫无用处的残废人，而且考虑到他治病所必需的巨大费用，考虑到为使他一家能按照原来那样生活所必需的大笔开销。但是他对律师事务所的事务却并不十分积极，主要是因为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华尔街的那幢大楼的入口处有一段阶梯。如果他要通过这段阶梯，就得有人抬着他走才行。他认为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他同意豪的看法，如果让人看见他不能行动自如地通过这一段阶梯，那将是个“很大的失策”。

罗斯福是仅次于前州长艾尔·史密斯的颇孚众望的民主党人。因此，他被选出来发布竞选呼吁。他在写给“亲爱的艾尔”的信中说，“毋庸置疑，广大的民主党员希望你参加竞选”。史密斯在给“亲爱的富兰克林”的信中接受了这个请求。于是赫斯特放出的试探气球就被戳穿了。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以前，罗斯福邀请史密斯到海德公园村会面。这一举动不仅可以使民主党人见见这位候选人，也可以看看罗斯福在与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搏斗中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这两点上，他们都对亲眼看到的情况表示满意。史密斯请罗斯福出来竞选参议员，但是罗斯福没有同意。埃莉诺当时是首次进入政界。她作为史密斯的拥护者出席了代表大会，并领导达切斯县的代表为他作宣传。史密斯易如反掌地赢得了胜利，这使他成为1924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一位主要竞争者。

罗斯福在得病两年后来到了阳光充足的佛罗里达。他租了一艘游艇“维奥纳1号”，在那儿愉快地度过了几周。他泛舟于海湾上，钓鱼、用海水沐浴。深信日光对他的肌肉有益处。他能不凭藉外援站在齐肩深的水中。他写信给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说：“除开这副支架外，眼前正是我一生中感到身体最舒适的时候了。”

两个月以后，为了消磨时间，罗斯福开始撰写美国历史及约翰·保尔·琼斯的传记。但在写作上他并没有获得许多成果，尽管他的历史感很强，可是他缺少写出长篇巨著所必需的那种毅力。罗斯福那些没写完的论著成了他和朋友们笑谈的资料。因此当有人约他合写一篇关于国际事务的文章时，他很敏感地回答说：“在要我动笔写作这件事上，我总是很乐意地说声‘行’，不管是写什么，不管是给某家杂志写篇文章还是一部十二卷的海军史，——只是要在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写完它。”（利汉德小姐点点头说道：“你说对了，说对了！”）

但是，罗斯福确实写完了一本书。书中阐述有关实现世界和平的设想。他想凭藉这本书去参加著名的杂志发行人爱德华·博克举办的有十万美元奖金的竞赛。大体说来，他设想了一个由各国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会有使美国人民拒绝国际联盟的缺点。在序言中，他宣称，“我们不想卷入其他国

家的纯地区性事务”，美国也不会承担“没有得到宪法程序给予的充分自由而要求使用武力的义务”。就罗斯福来说，重要的是使美国人民加入一个能维持国际和平的组织，而不是去关心加入组织所附带的条件。

罗斯福以前总是坐不住，总是以极大兴趣到处收集第一手资料，现在，他病后行动不便，只得呆在一个地方，这就使他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去干手头的活。有一次路易斯·豪回忆说：“突然，他只能在床上仰卧，除了考虑事情而外什么也不能干。……他的思路开阔了，眼界更广了。他开始了解别人的观点了。他想到那些患病的人，那些受折磨而又亟需帮助的人。他思考了许多他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他躺在那里，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罗斯福是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神秘主义者。在他轻松的逗乐后面有着他能在公共生活中追名求利的极大抱负。与小儿麻痹症的搏斗使他取得了他年轻时所缺少的深沉气质，使他同情受苦受难的人们，也在他的开朗的性格上增添了阴暗的一面。但是，疾病并没有使他脱胎换骨，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和基本哲学，他还保留着他对生活的看法。

第十二章 智勇双全

富兰克林在身体上的灾难使他超然于斗争、宗教偏见、互相冲突和宗派主义之上，他能向每一个错误和不良行为施以抨击，使他的对手们胆怯畏缩，以至于屈膝投降，每个听他讲话的人都感到他在政治战场上不仅是个诚挚的，而且是个正义的勇士……

罗斯福乘“劳罗克号”巡游回来后不久，党魁墨菲就建议他联合其他州的代表支持史密斯。史密斯很晚才开始他的竞选。伍德罗·威尔逊的女婿（前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是他的主要对手。表示支持麦卡杜的代表为数更多。罗斯福和豪当然不相信史密斯有取胜的希望，因为他和坦慕尼厅关系密切，他信奉罗马天主教，他还起劲地反对禁酒法令。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赞同纽约州所支持的候选人。

墨菲看来身体还好，但是在罗斯福家开完会回去后几天就因心脏病发作而辞世了。罗斯福曾说这个人是在“漆黑的地下最艰难的政治甬道中”工作的人，他现在说“纽约失去了一位最强有力的、最聪明的领导人”。史密斯州长的主要支持者的去世使拥护他的人们感到沮丧。但是墨菲的去世却是变相的好事。对史密斯来说，坦慕尼厅所造成的负担消失了，他成了民主党纽约州内的当然领袖。

从表面上看，1924年是民主党大走红运的一年。不仅是史密斯在两年前当选为州长，而且在其他各州，民主党也赢得了胜利，使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几乎消失。华盛顿的共和党政权极为腐败。沃伦·哈定在前一年8月去世，美国人都很沉痛地悼念他，认为他是一个和蔼的总统。但是卡尔文·柯立芝刚接替哈定当上总统后不久，茶壶盖事件及其他丑闻就从白宫里一个接一个地传了出来。倒霉的哈定连一分钱也没有多拿，可是人家揭发他的朋友、助手及内阁成员与不法商人有勾结。哈定的内政部长已被捕入狱，司法部长也差一点坐班房。他的海军部长因无能和严重失职而被迫辞职。哈定留下的丑闻中还包括退伍军人局里的骗局、外侨财产管理处的贪污案以及司法部的阴谋等等。

新上任的内政部长艾伯特·B·福尔早就盯上了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及茶壶盖地方的石油储备了。他劝哈定把石油储备从海军部管辖下划出来归他控制。福尔把埃尔克山储备租给以爱德华·多哈尼为首的一家公司。不久后，多哈尼的儿子把一个小黑口袋交给了福尔，里面装有10美元。茶壶盖石油储备以三十多万美元和流通债券租给哈里·辛克莱。石油出租的消息不久就传出去了。参院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但是共和党人不愿调查他们自己的政府。因此，这事就由蒙太拿州民主党人，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来办理。沃尔什在一大堆互相矛盾的文件和伪证中查清了事实真相。福尔最后因受贿而被捕入狱。但是行贿的两个人，多哈尼和辛克莱却没有遭受惩罚。

这时候艾尔·史密斯出来当候选人就成了民众瞩目的人物。他总戴着褐色的礼帽，叼着雪茄，操一口生硬的纽约口音，他代表着美国乡村人憎恨和害怕的事事物物。史密斯是位进步的州长——他的“小小的福利州”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改革了房屋法，帮助未成年的孩童，重建医院，扩建公园，增加教师工资，改组州政府——但是，在乡村选民的眼里，他当候选人会招来酗酒和其他意外事端。

罗斯福意识到，如果史密斯不扩大他的地盘，那么他在竞选中肯定要失

败。因此，他劝他不要拼命地反对禁酒法，设法团结那些经济上贫苦的农民。在罗斯福的敦促下，史密斯发表了一项旨在缓和他对禁酒法所持的反对立场的声明：“不管我们对沃尔斯蒂德法持有什么想法，但这是国家法律，我们必须支持它。”不过，没有任何人为他耍的这套文章把戏所欺骗。在劝告史密斯关心农业问题和农村救济方面，罗斯福收效更少。后来他回忆道：“有一次史密斯与一批堪萨斯州代表见面时，这样说：‘你们好，小伙子们。很高兴见到大家。从威斯康星州来了几个人，我向他们学到了些东西。我总以为威斯康星是在湖的那一边，谁知是在这一边。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很高兴对这块出产好啤酒的地方有更多的了解。’史密斯对坚决支持禁酒法地方的人竟说这种话。”

整个代表大会期间，罗斯福力主两派妥协，尽力避免党内分裂。当选举一轮轮进行的时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厄尔·卢克说，代表们“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他”。“若是罗斯福被提名的话”，他就会使“代表们都来投他的票……自从他发表了那次有关史密斯提名的演说以后……不管他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他一直是代表们所瞩目的人物。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但却为他自己做到了他为他的候选人所做不到的事。”纽约《世界晚报》评论说：“不管史密斯州长在选举中是否获胜，富兰克林·德·罗斯福在192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总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从1925年4月16日到5月25日，罗斯福为《电讯报》写了八篇专栏文章。报纸把这些文章排在社论版上，并冠以醒目的标题：《罗斯福说》。这些文章基本上重复了他以前在讲演中提出的主题。也像二十年前他为《红色哈佛报》写的社论一样，这些文章语气温和，避而不谈有争论的问题。罗斯福想把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界同时在几家报纸上刊登，但是只有亚特兰大的《宪法报》对此有兴趣。

1926年4月，罗斯福花了19.5万美元从乔治·皮博迪手中买下了温泉。他先付2.5万美元，剩下的款项在十年内还清。这对他是个不小的负担。那时他有一个男孩正在哈佛求学，三个小孩就读于格罗顿学校，还有一个女儿快要出阁。起草契约的巴西尔·奥康纳劝他不要买温泉，他母亲也不主张在温泉投资。罗斯福终于购买了那座破破旧旧的温泉旅馆、几幢小木屋、游泳池、附近山坡上的1200多亩森林。他把温泉视为治疗小儿麻痹症患者的中心，也是富翁们度假的胜地。罗斯福对疗养地热心地加以修整。他总是乐意去改变荒凉地区的面貌。埃莉诺说，他曾对她说过，他离开白宫后要到中东的荒岛上去修建花园。现在他买下疗养地修建房屋，挖池塘，修路，并计划修筑一座有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

罗斯福喜欢佐治亚温暖的阳光、桃花的芬芳及那一望无垠的林海。温泉这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奇迹，但他却从轻松的气氛和安静的生活中受益不少。一位灵巧的机械师把一辆小型福特车改装得完全能用手操纵。罗斯福每天都开着这辆小车子去小路上转悠，或是去探视农民。从和农民的闲聊中，他知道了他们的不少问题和苦衷。温泉的生活也是他和他妻子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埃莉诺自从第一次抵达温泉后，一直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而且她自己的事也越来越多。因此她很少到佐治亚来。利汉德小姐于是来料理罗斯福身边的大小事情。从此时起，罗斯福夫妇很少在一起居住。各人忙各人

罗斯福把为专栏写的这些文章的稿酬给了洛伊勒斯，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钱。

的事……

共和党的报纸一面表示对罗斯福个人的敬佩，一面又假惺惺地掉几滴鳄鱼眼泪，攻击艾尔·史密斯为了自己的野心无情地让一个瘸子作出牺牲。针对这种谣言，罗斯福宣称他要在本州各个角落与选民见面。他说：“我不是被州长逼迫而参加竞选的，……我被提名是因为党内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我经常表示拥护史密斯州长的政策，我这次竞选州长是向选民们所作的惟一的保证。这些政策是会继续执行的。”史密斯以他一贯的直率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个州长不一定得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不是因为他能作后滚翻或前空翻。州长干的是脑力劳动。”

为了使自己能与更多的选民接触，罗斯福在竞选的后期改乘汽车而不是乘火车。这使他能在这几十个村庄和路口向选民们演讲。如果他还是乘火车，这些地方是去不了的。还有两部大轿车（一部是记者们用的，另一部载着速记员、竞选用品和油印机）跟在他的汽车队后面。他们驶过满山秋叶的莫霍克谷来到奥尔巴尼，又沿着赫德森河驶往纽约市。罗斯福在竞选的最后三个星期中总共行程 1300 英里，发表了 50 来场演说。这使许多跟随他的人都疲惫不堪，也使人打消了对他的健康和精力的猜疑。他高兴地嚷道：“若是再竞选 12 个月，我就可以把手杖扔掉了。”

北部选区的选举结果很快就揭晓了，形势渐渐地变得对罗斯福有利了。在所投的 425 万选票中只以多得 25 564 票取胜。罗斯福诙谐地把自己称为“百分之零点五的州长”。但这次胜利——不管多么微末——把他推到了全国政界的注点上。弗吉尼亚的州长哈里·F·伯德说：“民主党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第十三章 投票赞成

选举结果已经揭晓，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以 750 001 票的多数取胜……

美国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在参议院也赢得了足够的席位。看情形在 1932 年，罗斯福很有可能入主白宫。

1928 年除夕，罗斯福和埃莉诺驾驶一部小汽车在那鸣着刺耳笛声的摩托车队的簇拥之下，开向奥尔巴尼华丽的州长官邸。艾尔·史密斯在大门口的台阶迎接他。“上帝保佑你，富兰克林”，他说。“欢迎欢迎，屋里已经生了火，你会觉得在这里生活是很舒服的”。当选州长也同样彬彬有礼，他说：“我希望艾尔·史密斯能再在这儿住上两年。”次日罗斯福在人如潮涌的议会大厅里，两手紧紧地按着家里那本荷兰版圣经宣誓就职。三十年前的今天，西奥多·罗斯福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宣誓就职的。但是权力移交时表露出来的亲切掩盖了新旧州长之间的紧张关系。

史密斯建议新政府保留他的“厨房内阁”里的两名重要成员：敢作敢为、说话刻薄的州务部长罗伯特·摩西和他的女智囊贝尔·莫斯科维茨。史密斯说，摩西是位有魄力的行政人员，非常熟悉新近通过的行政预算计划，并负责执行史密斯政府的公园及医院的建设计划。莫斯科维茨夫人深知如何处理政府事务，也是一位笔头很快的讲演稿起草人，她已准备好为罗斯福起草就职演说了。罗斯福意识到史密斯的这两位同事，尤其是摩西瞧不起他。摩西曾嘲笑地说“他可以是个出色的候选人，但却是个蹩脚的州长”，因此，罗斯福很快就藐视他了。但是，摩西留任州园林管理局长。埃莉诺和路易斯·豪都担心莫斯科维茨所效忠的是史密斯，而不是新州长，因此他们主张不准她担任任何职务。埃莉诺说：“她总是会倾向艾尔的。”罗斯福犹豫了片刻，同意了。

罗斯福一家很快就适应了州长官邸的生活。这幢陈设着格罗弗·克利夫兰时代家具的维多利亚式大厦也和海德公园住宅一样使人觉得毫无拘束。男孩子们从格罗顿或哈佛回家时带来他们的朋友，常和政治家们及官员们厮混在一起。安娜的德国种牧草犬“奇夫”在大厅里嬉戏。书籍、杂志随意乱放着。秘书们进进出出拿着重要文件让州长签署。用膳时也是乱哄哄的，好像每个人争先恐后地说话。雷克斯·特格韦尔后来说，“把所有来访者都当作高贵客人一样招待，这是罗斯福的习惯”。埃莉诺在奥尔巴尼时，每天下午餐厅里总要摆上茶和糕点，当时家里的每个人，不管他是朋友，还是记者、秘书或是州警察，都一律被邀请去用茶。

罗斯福是位出色的州长，从艾尔·史密斯手中，他接过了一个运转自如的州政府。史密斯已经为实行有益的社会改革奠定了基础，因此，他的主要任务是履行前任州长的职务。他一直盯着白宫，对未来不抱侥幸心理。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的基本思想和社会目标在奥尔巴尼四年期间的讲话及文告中都能找到：“从 1929 年到 1932 年的这些文告和讲话中，你能看到他建议州采取适当行动的那些领域就是后来他敦促国会采取行动的那些领域：最低工资、最高工作时数、老年保险、用公共工程及其他手段减少失业人数、失业保险、管理公用事业、对银行和对别人的金钱的使用加强控制。”罗斯福在奥尔巴尼的确表露了他想进行新政试验的意图和充分利用政府权力的决心。

作为纽约州州长，他制定了一个旨在使民主党加强在本州内的地位并引起其他州的好感的计划。罗斯福以农民的面目出现，强调对农业的救济、植

树造林、由州政府来开发电力资源等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据田纳西流域采用的方式制定的治理纽约州的地区性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消除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差别的。农民没有分享 20 年代经济繁荣的果实，而不断增长的税额及销售费用又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罗斯福把城市和乡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着重指出美国不能继续处于这种一半繁荣一半萧条的状态中。他说：“如果农村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新鞋、新衣裳、新汽车，那么工业中心也要受苦。”

水力发电是罗斯福的建设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像农民问题一样，究竟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来开发水力资源这个问题也超出了纽约州的范围。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会影响到西部政治家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的态度。圣·劳伦斯河是纽约州内未开发的最大的水力资源。但是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因为没有打破由谁来开发资源这个问题上的僵局，开发工作一直未能开展。富兰克林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道：“就在我向你们讲话的这段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的河流白白流入大海的能量足以使千百家工厂的机器转动，足以照亮成百万农户的家。”现在是充分利用这种资源并以廉价分配给消费者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电力，决不允许有人作为人民的代理人把这种电力送到他们的家中和工厂去获取无限的利润”。

在抨击共和党统治下政治和经济权力日益集中时，他说：“每度过一天，……就有一百家小商店停业，或是被称作联号的商业机构所吞并。这就是说，这一百个原来自己独立做生意的人不是改行，就是成了一架毫无人性的机器的雇员。我们在各种制造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银行业中都能看到这种倾向。”作为一个州长，他坚决反对权力集中于联邦政府。“如果某个州不能为本州的孩童供给足够的教育设施，马上就会有人叫喊，要求在华盛顿成立一个教育部。如果某个州不能提供现代医疗设备，马上就会有热心人主张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卫生部。”

没有几个美国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预料到股票市场的崩溃会引起大萧条。大家看到某些城市从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到工厂关门、商店倒闭、人们排起长队购买面包这种可怖的情况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萧条的到来不是像轮胎突然爆炸，而是像慢慢漏气那样。罗斯福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艰难时日的到来。他曾预言，这时期一到来，共和党就不能安稳地坐在白宫了。当纽约《美国人》杂志记者请他就“黑暗的星期四”事件发表评论时，富兰克林回答说，他缺乏详细情报，但他觉得经济状况基本上还过得去。

对罗斯福说来，1930 年的主要任务是连任州长。这样，两年后他就有了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资本。在他就任州长的第二年，他提出了一项对共和党 and 民主党都有吸引力的计划：改革刑事审判制度、养者金制度，改革银行法以防止利用小额存款者的钱去做投机买卖，严格管理公用事业，提供廉价电力。由于股票市场崩溃所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被大家感觉到，所以除了为已经安排的新建筑工程拨款 2 000 万美元外，尚未制订对付失业问题的计划。但是，他一直注视着失业人数，经常打电话向弗朗西斯·帕金斯索取最新统计数字。当他知道她和胡佛总统在失业问题的严重性方面发生争论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竞选州长的日子愈益临近了。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并不打算在提供廉价电力、农业救济及失业问题上展开一轮竞选活动，他们想利用坦慕

尼厅的腐败和禁酒法这些老问题与民主党进行竞争。随着经济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与日俱增。那年夏天，华盛顿政府办公楼中有 200 名女工的空缺，结果有近 5 000 名妇女排队要申请这份工作。在千千万万城镇中，挂着勋章的退伍军人人们在街头叫卖苹果……但是政治家们所关心的问题与选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却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贪污问题却使罗斯福处境困难，因为塔特尔拿出证据证明坦慕尼厅在任命法官方面大做交易。但罗斯福仍有戏法可变。在人家要求他采取行动的压力下，他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真出乎人所预料。他把这件事交给共和党的司法部长去处理，指定一个共和党的州最高法院法官去组成特别陪审团，并要求上诉受理司对低级法院进行调查。他还选择很久以来就反对坦慕尼厅的民主党人塞缪尔·西伯里去负责这次调查。他在采取这些不寻常的步骤后，就想法让共和党的这些调查人员陷入繁文缛节中，而自己则退居一旁。当坦慕尼厅的头目被召到陪审团面前，表示拒绝放弃豁免权时，他拒绝陪审团扩大权力的请求。他的哈佛同学，皈依教会的 W·拉塞尔·鲍伊牧师写信批评他。罗斯福在回信中提请他注意，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制度下，陪审团不能强迫证人放弃豁免权。他又说：“看上帝份上，请你记住我像你一样急于想根除这种贪污现象。”

这次竞选也许是罗斯福所有竞选中最顺利的一次。纽约是被他独占了，因此坦慕尼厅只得支持他，没有其他的选项。如果罗斯福不能再度当选，那末这个组织就只能受查尔斯·塔特尔的摆布了。法利在北部重建民主党组织的工作做得也有声有色。这一地区的组织原来一直是很混乱的。罗斯福预计自己能赢得大多数选票。他想借助共和党的选票来增大这个多数，于是他攻击共和党人在奥尔巴尼“蓄意妨碍议案通过”并在华盛顿表现出“无能”，而不是攻击共和党本身。豪让保险公司的医生给罗斯福检查身体，粉碎了关于罗斯福健康状况的流言——说他所患的不是小儿麻痹症，而是梅毒的谣传。保险公司的医生批准了他的总数为 56 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保险金的受益者是佐治亚温泉基金会。罗斯福在全州各地积极竞选了两个礼拜，取笑他的对手，而且从来不提及他们的姓名。当据报道塔特尔说他希望“到人民中去”时，他冷冰冰地说：“这下子人民可不胜荣幸了。”

共和党集中全力清算坦慕尼厅的罪行，因此，在罗斯福鼓吹他的成就时，他们很少去反驳。罗斯福嘲笑胡佛关于繁荣即将来临的乐观预言，指责说，如果政府在 1928 年或 1929 年就设法制止投机活动的话，崩溃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胡佛派了三名内阁成员到纽约去帮助塔特尔从竞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他们是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和财政部副部长奥格登·L·米尔斯。罗斯福奚落了他们，说赫尔利是俄克拉何马州人，对纽约一无所知；史汀生和米尔斯二人都曾经竞选州长，然而皆以败北告终。他说：“这个州的人民既然抛弃了他们，所以都能判断谁适合担任州长的职务。”罗斯福开初并不理睬对他宽恕贪污的指责，到了 11 月 1 日，在卡内基厅的最后一次集会上，他才勇敢地正视了这个问题。他向到会的人说：“如果现在还有贪污的法官坐在法院里，那就要把他们撤掉，采用法律手段而不是调查的办法撤去他们的职务，不是利用报纸的形式审判他们，而是依照法律规定的审判来撤去他们的职务。”

选举的日子渐渐临近了。吉姆·法利想发表声明，诉说罗斯福要以惊人

的 60 万票赢得竞选的胜利。但是罗斯福恐怕这样做会使党的工作人员过分乐观，于是把选票总数压到 35 万。在民意测验中，罗斯福自己预料能获得 43.7 万张票的多数。但是当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他以 750 001 票的多数赢得了胜利。罗斯福不仅把两年前由于他以微弱多数取胜而引起的怀疑一扫而尽，甚至还在看来难以取胜的纽约州北部地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前所未有地赢得了许多县份的信任。看情形，他们很有可能在 1932 年进入梦寐以求的白宫——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中大有希望的人选了。

第十四章 黑暗的社会

“一场噩梦”接踵而来，先是英国，继而是法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美国的一些银行本已由于国内债券和抵押证券的疲软而摇摇欲坠，现在由于它们所投资的外国债券价格下跌而一一垮台。经济萧条，失业人数超过 1500 万，占了整个劳动大军的 1/4。农业品价格已经降到最低点。同一时期的国家收入比以前大约减少了一半。恐慌和失望的波澜几乎蔓延到全国。

当全国更深地陷入萧条之中时，美国人民日益频繁地提出如下的问题：罗斯福的堂堂仪表和奇妙的微笑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他能否使工厂开工，使国家重新发挥作用？他有无克服危机的魄力？抑或只是另一个野心勃勃而无所作为的空头政治家？担任州长顾问的雷蒙德·莫利对罗斯福作出了最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他这样写道：“……人们根据罗斯福的迷人风度就以为他性格软弱的看法是很错误的。当他热衷于某种事业时，他显得坚决、顽强、机智而无情。我经常由于观察不细心误以为他的和蔼可亲只不过是贵族老爷对农民的故作谦恭，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热情显得非常自然，仿佛是因为他像一个迷人的妇女一样很愿意扮演使人感到欣悦可亲的角色……这个人的精力惊人，他对各种事物的兴趣一直使我感到惊奇。他的思维深入到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去……他的知识多半是从与人交谈中获得的；当他收藏起谈话之网时，他自己也根本弄不清他获得的东西之中哪些是自己说的，哪些是别人说的……”

1930 年，罗斯福在赢得州长选举的彻底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就开始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活动。路易斯·豪松开衣领，任凭衬衣前襟沾满烟灰，喜形于色地构思着借助吉姆·法利的名义向报界发表的书面声明：“我不知道罗斯福怎能逃脱被本党提名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即使无人将此事公开提出来。”豪担心罗斯福会阻止他向报界发表这一项声明，因此，他在事前未向这位首长请示；法利也担心罗斯福会反对先斩后奏的做法。罗斯福一到奥尔巴尼，就有 5 000 名群众冒着冷雨夹道欢迎他，向他高呼：“我们的下一任总统，欢迎你！”法利给州长官邸打了电话。州长满不在乎地回答：“吉姆，怎么说都行。”接着罗斯福召见了新闻记者，再次声明自己仅对履行州长职务感兴趣。

豪和法利设计了一种双层的竞选活动。他们试图造成罗斯福并不谋求总统职务而是责无旁贷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在幕后拉票，联合了一大批代表，而候选人则谦恭地采取低姿态，预防别的觊觎者勾结起来反对罗斯福。他们对公众声称罗斯福必将得到提名，而每一步行动又必须仔细加以考虑。

法利已 40 开外，出生在罗克兰县，他的父亲是砖窑工人，家境清贫。法利在未满 21 岁的投票年龄时即已被选为家乡斯托尼角的办事员，虽然这里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早先他支持艾尔·史密斯，因为他有这位快乐勇士作后台，他才爬上了纽约州的政坛。罗斯福的风度、精力和政治潜力吸引了他，因此他贡献出自己的才能为罗斯福效劳。1930 年的竞选以后，罗斯福在给法利的信中这样说：“你干得出色，我用不着对你说，我是多么感激你。”

1931 年初，豪和法利就创立了一个掩护竞选活动的秘密组织“罗斯福之友”，向力争提名公开跨出了第一步。他们在麦迪逊大街比特莫尔饭店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处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竞选州长的班子。他们从这

个拥挤的场所操纵着一架政治机器。其目的无非是控制民主党。他们在充满内部纷争的党内各派成员之间巧妙地施展着权术。小心翼翼地笼络着每一个人。在南方，罗斯福得摆出保守派姿态，与艾尔·史密斯在禁酒问题上的“主张泡在酒里”的立场保持一段距离。在东部，他采取自由派姿态，并不反对滴酒不沾；在西部，他则是进步主义的白衣骑士，高举着标榜农业救济和公营电力的大旗。

正当吉姆·法利受州长罗斯福委托周游全国、探测政治形势并争取广大民主党党员支持罗斯福做候选人时，经济出乎意料地开始好转。工业生产、工资和股票价格都开始回升，建设速度加快了，一些失业者恢复了工作。最坏的情况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转眼之间，好像是离去的风暴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来——这次是从大西洋彼岸刮来，席卷美国银行界。

那些靠同美国进行贸易和向美国贷款维持现状的欧洲国家受到了股票市场崩溃的极大冲击。193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霍利—斯穆特关税税率，使外国货物几乎全部不能进入美国，这更加破坏了欧洲经济。胡佛总统担心欧洲金融机构会崩溃，遂以老练政客的手腕同意欧洲延缓一年偿付欠美国的战争债款。不料奥国最大的信贷银行倒闭了。而国际金融机构也遂告分崩离析。

经济萧条给普通美国人带来严重的影响。失业者无休止地寻找工作，但毫无结果……储蓄无情地减少……持续地节衣缩食使生活变成苦难……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的产煤区几乎被饥谨笼罩。城市里到处可以看见施粥站，多达200万大人和孩童偷乘货运列车到处漂泊……这个可怕的困难时期似乎无异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许是48个州长中处理经济萧条最积极的一个。但他也像胡佛一样，摆脱不掉向预算平衡的图腾顶礼膜拜。虽然他在1931年1月致议会的年度咨文中强调有必要扩大公共工程计划以提供就业机会，但是费用仍受到州的岁入的严格限制。可是罗斯福的天性——由他父母和皮博迪博士灌输给他的那种高贵者理应慈悲为怀的意识和他对社会正义的信念——正在使他冲决正统经济学的樊篱。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个保守的经济学家向州长保证说，让供求法则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克服危机。这时州长冲着这位经济学家说：‘要知道人民不是牛马！’我永远忘不掉他当时脸上浮露出的愠怒之色。”

罗斯福逐渐认识到用一切旧办法来医治经济萧条的溃疡是完全无济于事的。他在1931年6月说：“至少必须试验一下新的补救办法。”一百多万纽约人失业，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的资金即将告罄，当年冬天仅纽约市一地就需要2000万美元用于救济。罗斯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处理危机的成败，于是他告诉萨姆·罗森曼说，如果华盛顿不愿意负起责任，那么每个州就应该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或食品。他说：“政府决不能心安理得地期待私人慈善机构甚至地方政府来办理这件事。”但罗斯福在未获得议会许可前还不能采取行动，而议会要等到1932年1月才开会。有趣的是，由于共和党人正专注于坦慕尼厅腐败案，使得罗斯福得到了有利的机会。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通过一项给予证人豁免权的法律，他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这是赢得对失业者进行某种直接救济活动的时机”，他通知罗森曼说。

罗斯福亲自向议会发表演说，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新政”基本概念的

主题。他说政府的职责在于减轻公民的苦难，增进他们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仆。

1931年年底正式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很快就被报界简称为T.E.R.A.，成为新政机构最早的简称。协助筹集罗斯福竞选资金的杰西·施特劳斯担任救济署署长，施特劳斯又挑选了一个年轻的专职社会福利工作者，纽约肺病和保健协会会长哈里·L·霍普金斯担任执行主任。霍普金斯不理睬行政机构的人事规定，从私人福利机构里招募了一批能干的工作人员，对最严重的灾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短期内难以完成。1932年初，纽约州至少有150万失业者，而且人数还在与日俱增。不久，救济署就得向全州大约10%的家庭提供救济，每月平均大致23美元。救济金额虽说微不足道，但饥饿现象总算得到了控制。

新的一年开始时，罗斯福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力求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图。1932年1月22日——在他50岁生日前八天——他同意报名参加北达科他州的预选，因为根据州的法律，候选人需要宣布他要求竞选，然后才能把他的名字写在选票上。选择这个角逐机会让罗斯福以积极的候选人姿态出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北达科他州的九个代表都在吉姆·法利的把握之中。在罗斯福生日的那天，艾尔·史密斯发来了“敬贺五十大寿”的电报，但只字未提宣布竞选这件事。不提的原因不久就弄清了，因为这位爱戴棕色礼帽的快乐勇士自己也宣布参与这场政治角逐了。

在芝加哥开会确定候选人提名之前，罗斯福需要有一个工作班子来提出主张和起草声明，并在思想理论方面奠定竞选活动的基础。豪和法利以及弗林都是不善于处理全国竞选事务的政治技术员；罗森曼不相信工作班子中有人能够应付这种挑战，因此他在3月份的一个晚上告诫罗斯福说：“如果竞选活动现在就开始，我们会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在诱导这位州长注意到这点后，罗森曼就建议召集一大批教授向罗斯福出谋划策，草拟有关农业救济、关税、铁路、政府债务和私人贷款这些复杂问题的备忘录。莫利素有足智多谋、善撰演讲稿的名气，因此委派他招聘其他成员，并由他来领导这个班子。这也许是罗森曼的外交手腕，因为莫利与他有所不同，他同豪的关系密切，因此可能有助于缓和这个小心眼人物对其他左右罗斯福的那些人的猜忌。总统候选人往往都有自己的顾问团（通常由实业家、金融家组成）。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学者只会高谈阔论，学究气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样，罗斯福对于开拓新天地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最后他同意了，但坚持只在纽约招揽人才，一是因为经费不足，二是顾问可以随传随到。由于有这些限制，莫利只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仁中招聘人才。这些人年轻，富有想象力，抱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并不全都仰慕这位州长。

智囊团通常是在傍晚乘火车去奥尔巴尼，到了那里刚好赶上吃晚饭。席间的谈话是闲聊，但是一到隔壁书房里围炉而坐时，罗斯福就会提出他想了解的某个问题，正如莫利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快步前进，这既令人兴奋，而又令人疲乏”。罗斯福是个“学生、盘问者和法官，他经常是先倾听几分钟，然后就突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习惯地穿插一段奇闻轶事或赞许对方的谈话，藉以缓和一下严肃的气氛。但是罗斯福的这些连珠炮似的问题很像是夜晚节拍器的滴答声。两声滴答的间隔越来越短，而问题本身却越来越有分量——这明确无误地表明罗斯福在夜晚补习中很有长进。到了深更半夜……州长不屑再提问题，而对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明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不时地挥动着烟嘴以强调自己的论点。”

罗斯福面临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纽约州州长，他一直关心的只是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他的智囊团的任务就是要为实施调整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职能不是替州长思考，而是提供选择方案。按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有时简直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家作为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太快太远。特别是特格韦尔想推行的改造纲领过于激进，使得这位候选人难以接受。

罗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顾问们更有经验，对政治现实和美国人心情摸得更透。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标是获得候选人提名。法利、豪和弗林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可能会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但是罗斯福仍然难以达到获胜所必需的2/3多数。不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占有优势，他获胜的机会有可能丧失。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超过民意，真是一种鲁莽行为。比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用自己的观点和激情唤醒美国人，但从未当选为美国总统。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施以教育，伯利的确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在过了多年以后这样说：“在我们给罗斯福提出的主见和办法中，他只选用了能够付诸实施的那一部分。”

智囊团的第一个成果是莫利草拟并由罗斯福在4月7日向全国广播的十分钟讲话。虽然这次讲话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下发表的，但这位候选人为了对自己有利起见，提出了一项旨在消除自由派对其进步主张所抱有的种种疑虑的计划。他以具有预兆性的语言驳斥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所提出的“涓涓细流”建议，而要求采取一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把信心再次寄托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身上。他呼吁把复兴金融公司的部分资金借给面临破产的小商人、农民和房主——这一切都将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在以后的演讲中把这种鼓吹进步主义的调子缓和了一些，但在1932年5月23日，当他在亚特兰大市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又把调子变得强硬起来了。这次讲演有一个奇特的来由，当时这位候选人偕同几名随访记者在温泉野餐，记者当面说他的一些讲话内容空洞，言中无物。罗斯福于是提出了一项要求：“……若是你们这帮人不喜欢我的讲话，何不亲自起草一份呢？”《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欧内斯特·林德利前不久发表了一本有关罗斯福竞选活动的记事，他这次接受了挑战，写出了一份讲稿，道出了“新政”的基本纲领。

“大胆的，持续的试验……”很可能是林德利的手笔，但在颇大程度上却代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思想。他在纽约州制订了救济失业者和贫困者的计划，表现出愿意与传统决裂的务实态度。显然他是在这个方面仔细考虑全国性问题的。但是明智的政治策略要求他在召开民主党代表大会前暂不侈谈任何重大的改革。事实上，他的有关试验的谈话激怒了路易斯·豪。难道罗斯福没有认识到激进的谈话会把选民吓跑吗？难道这能帮助他多得一张选票吗？

罗斯福听从了这个警告。他在再次获得自由派的信誉后，就谨小慎微地不去发表这类言论了。但是在奥格尔索普大学发表演讲的前几天，萨姆·罗森曼已经到达温泉，带来莫利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照埃利奥特的说法，这

份备忘录概述了“构成 1933 年至 1937 年期间国内新政政策”的大部分建议。莫利极力主张民主党务须支持旨在获取工农选民的自由与人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对公司和富翁征收的捐税，以便重新分配收入。他还建议联邦政府担负起救济责任，并提出一整套扶贫济困工程与公共工程计划，其经费必要时可用赤字开支来弥补。其他建议包括承认苏联以扩大贸易范围并吸收街头的失业青年参与保护自然资源工程的建设，大大改变了已往的方针，不是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而是用控制作物的办法来对付农业危机。莫利的备忘录在经过修正和更改之后形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施政纲领。

第十五章 运转乾坤

竞选结束时，罗斯福给人的形象是决心、信心和希望。人们激动地期待着他……幸福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以 2280 万票对 1575 万票获胜，当选为美国总统。

1932 年 6 月下旬，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云集芝加哥，他们坚信美国下一任总统必将是民主党人。在同一个城市里，共和党人召开了给人以凄惨之感的全国代表大会，怏怏不乐地重新提名赫伯特·胡佛为候选人，民主党人的一切疑虑和担忧从而消除了。他们三三两两地簇集在湖滨饭店的休息室里和高级的酒店里。这些人互相拍肩道贺，互相传达最新消息，并且秘密地共同计议竞选的事情。《纽约时报》的安妮·奥哈拉·麦考密克说：“共和党人说政治是业务，民主党人说政治是乐事。”

富兰克林感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不太方便，所以未去芝加哥，他留在奥尔巴尼，独自一人无拘无束地作出战略决策。路易斯·豪、吉姆·法利和埃德·弗林在国会饭店设立了一个总部，但是每一次重要行动都得向首长请示。弗林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同他商议。”在州长官邸与设在 1702 号房间里的路易斯·豪的指挥所之间建立了专用电话线。代表们到达时，由法利出面迎接，把他们带到那边去听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罗斯福欢迎“来自内不拉斯加州”或者“印第安纳州”或者“亚拉巴马州”的“我的朋友们”的令人欣慰的话音——罗斯福正在为赢得他们的选票而开展宣传活动。

罗斯福喜气洋洋，当时他正在奥尔巴尼通过电话与芝加哥保持联系，抽空同萨姆·罗森曼一起草拟接受提名的讲话。《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声称他已听到不远处罗斯福的竞选车正隆隆开动。

“在此悬疑时期，精神紧张的程度几乎超过了身体所能忍受的限度”，法利说。“我每天工作十八九小时，与几百人交谈，不断地和其他领导人商量，接受每个代表团送来的汇报，每天至少两次接见几百名记者。我吃的是普通的便餐，通常是三明治加牛奶；在天亮前睡几个小时。人们围着我索取我所没有的大会入场券，这又增加了我的负担。还有其他几百个人也同样忙得晕头转向……”由于暑热的缘故，路易斯·豪的气喘病加剧了。他躺在办公桌旁边的一张小床上，缩着两腿把膝盖顶在胸口上，大口大口地呼吸，同时从收音机里收听大会的实况。他的一个秘书莱拉·斯泰尔斯担心他会一命呜呼。“真见鬼”，一名记者说，“路易斯·豪竟病得这样厉害，半死不活的；但你知道得很清楚，他不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是决不会瞑目的。”

三天来的暑热使得代表们疲惫不堪，管风琴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乱七八糟的主题歌，使人震耳欲聋，直到 6 月 30 日下午，代表们才开始提名总统候选人。罗斯福是由达切斯县的约翰·麦克提名的；20 年前，他把罗斯福引进了政界。罗斯福原想让克劳德·鲍尔斯或者罗伯特·瓦格纳参议员来提名，但鲍尔斯害怕激怒他的雇主赫斯特；瓦格纳则决意不得罪坦慕尼厅。正当麦克要走向讲台时，莱拉·斯泰尔斯急冲冲地闯进了豪的房间，豪躺在一张小床上。

“天啊，你怎么啦？饭店失火了吗？”豪高声问。

斯泰尔斯小姐告诉他，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认为罗斯福的主题歌《起锚》听起来像一首挽歌，而适合他的主题歌应是《幸福的日子又来了！》，“你也这样说！”他吼了起来，用手抱着头。埃德·弗林也曾对他说过《起锚》听起来像是一首葬礼进行曲。“他们在会场里把我追问得心烦意乱。我们得演奏什么曲子？我们得演奏什么曲子？管风琴手只隔 5 分钟就打电话来问我。他们要想演奏什么我满不在乎。”

斯泰尔斯小姐满口称赞主题歌《幸福的日子又来了！》，她唱了起来，在房间里翩翩起舞，还捻响手指打拍子，豪吃惊地在旁观看；接着他嘟哝了一声，拿起电话筒，吩咐管风琴手在罗斯福得到提名时立即演奏主题歌《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后来，在为罗斯福的提名出过力的每个人都一致声称自己在使胜利成为定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巴兹尔·奥康纳对罗斯福开玩笑似地说：“在自称曾到芝加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 55000 名民主党人中，无疑有大多数人竭尽全力地促成了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加纳的决定保证了罗斯福得到提名。他为什么作出这种决定呢？不是为了当副总统，因为他认为这个职务并无实权——一泡尿也不值——他宁可继续当众议院议长。加纳是一个优秀党员，他不愿看到代表大会陷于僵局并选出一个难望取胜的折衷候选人。

“麦卡杜好样的！”罗斯福叫喊起来，霍地又坐回椅子上去，咧开嘴笑。在芝加哥，闹剧还在继续。法利挤开人群在这位加利福尼亚州人的背上击了一拳。塞尔麦克抓起话筒宣布伊利诺斯州有 58 个代表投罗斯福的票。管风琴奏起了《幸福的日子又来了！》随着这轻快的节奏，罗斯福的对手一个个地爬上了罗斯福的竞选车。只有史密斯的 190 又二分之一的票没有支持罗斯福。当有人问他是否支持党内这位候选人时，这个失意的勇士既恨又恼，狠狠地咬着雪茄烟回答说：“无可奉告！”豪同自己的工作人喝着用纸杯装的香槟酒表示庆贺。在奥尔巴尼，罗斯福夫人、格雷斯和利汉德小姐互相拥抱；约翰·罗斯福和埃利奥特·罗斯福把他们的计票单撕成碎片撒向空中。朋友、同事和祝贺者都拥进州长官邸——过去五天来这里几乎无人问津——去和这位被提名的候选人握手。而在华盛顿，已确保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仙人掌杰克·加纳对一名记者说：“政治是滑稽可笑的。”

按照传统的做法，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等待委员会给他送来得到提名的正式通知书——这个手续可能得花费几周的时间——但是罗斯福告诉全国代表大会，他将于次日飞往芝加哥亲自接受提名。

罗斯福这时已是一个把握民心的老手。他意识到一个沮丧失望的国家会欢迎一种表示与过去决裂的惊人举动。空中航行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总统候选人坐飞机旅行更是破天荒。

上午八点半钟，罗斯福和随行人员——埃莉诺、两个儿子、三个秘书，两名警卫人员，还有萨姆·罗森曼——搭乘一架三发动机的福特型包机，在阴沉的天空中飞离了奥尔巴尼。记者们早已在机场上注意到这架飞机，并且得知总统候选人乘坐专机进行一次竞选旅行。“我们准备骑自行车到芝加哥去”，罗斯福假装正经地说。强劲的逆风冲击着飞机。约翰·罗斯福开始晕机了。罗斯福和罗森曼不顾噪声和寒冷，最后一遍审阅了接受提名的讲话稿，不时地加以修改和润色。由于天气恶劣，飞机越来越落后于时间表，无线电报告说，有些不耐烦的代表不等听罗斯福讲话就离开了体育场。

从奥尔巴尼起飞经过九个钟头后，飞机在芝加哥降落了，受到了一大群

人的热烈欢迎。小约翰头一个跌跌撞撞地走下飞机，紧接着是罗斯福夫人和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走出机舱时满面春风，安娜和他的另两个兄弟急忙走上前去迎接他，他和他们一一拥抱接吻。看到人群中这种热烈的情绪，人们对罗斯福是否深得民心的任何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罗斯福在汹涌的人群中发现了法利，他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臂喊着：“吉姆，你干得挺好！”罗斯福向莫利和特格韦尔招手。豪也喜气洋洋地走到罗斯福身边。在激动之中，罗斯福的帽子被挤掉了，眼镜滑到鼻梁上，幸亏他没有负伤。罗斯福一坐进塞尔麦克为他准备的一辆大型白色旅游车后，豪就把他自己草拟的一份接受提名的讲话稿塞到他手上，并且一个劲儿地批评起在奥尔巴尼写的那份稿子来。“真见鬼，路易斯，我是被提名的候选人！”罗斯福不以为然地说——但一想到豪对自己这份讲稿如此重视，他于是就用一只手翻阅讲稿，用另一只手向前来参观车队飞速通过闹市区街道的人群挥手致意。

到了体育场，罗斯福就径直走上讲台。他紧紧抓住放讲稿的台座，好不容易地把身子平衡在两腿支架上，踌躇满志地凝视着狂热欢呼的人群。全国大约有 1000 万人簇拥在收音机旁，不安地期待着听到充满希望的讲话。豪同法利和党内高级领导人一起登上了讲台。这是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自己在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抛头露面。喧声稍减，罗斯福就开始讲话。他的声音清晰洪亮。“我在履行使命之前就打破了一个荒谬的传统，那就是一个候选人要在几周内对所发生的事假装一无所知，一直等到数周后才由人向他通知这件事”，罗斯福说。“你们提了我的名，而我也知道这件事，我现在上这里来就是要感谢你们给予我的荣誉。让这件事也作为一种象征，表明我这样做就是要打破传统。”但是，有一个传统他希望能得到保持，那就是民主党要成为“自由与进步的旗手”，成为“使国家不断地走向正义之途，全体公民享受平等之途”的先锋。他继续说，“美国人的良知和信念使我们在面临经济危机情形之下不至于推行‘疯狂的激进主义’，而为防止激进分子得势，我们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重建纲领’”。

“美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罗斯福问道。“我认为他们需要两件东西：包括一切道德和精神价值在内的工作，还有适度的安全——自身的安全、妻子的安全和儿女的安全。工作和安全——这不能空谈而已，乃是一种精神价值，是我们的一切重建工作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为实现这种目标，罗斯福提出了类似他作为纽约州州长所提出的那些计划：为贫苦大众提供联邦救济，兴办自给的公共工程项目以提供就业机会，废除禁酒法，植树造林以便合理地使用土地、降低对房屋和农场抵押品的利息、调节证券交易，自愿执行农作物控制计划以减少剩余农产品以及降低关税税率。

引人注意的是罗斯福讲话的结尾充满近乎宗教热情的话语：“我向你们宣誓，我为自己宣誓，要执行有利于美国人民的‘新政’。让我们全体同仁都成为未来那种富有成效的新秩序的预言者。这不仅是政治竞选，而是战斗号令。请你们帮助我，不仅是为了赢得选票，而且是要在这次进军中取得全胜。”

第二天，罗林·柯尔比的一幅漫画上出现了一个农民，他扶锄而立，迷惘而满怀希望地仰望着天空中的一架飞机——罗斯福乘坐的专机——，机翼上赫然标有“新政”二字。不久后这两个字就成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政治信仰的口号。

“竞选于今晚 10 点钟开始！”

当欢呼声还在芝加哥体育场中回荡时，罗斯福就热情洋溢地开始了竞选总统的战斗。大家都认为他已胜券在握。“你务必坚持到大选那一天”，加纳对他说。路易斯·豪和罗斯福的顾问们都持有这种看法。他们主张“在家门口”竞选。但罗斯福欣赏有一定声势的竞选活动——匆匆的集会、发表演说、乘火车到各小站去拉票。此外，他还想在公共场所露面，藉以平息人们有关他的身体和工作能力的谣言。

罗斯福让自己的助手们去组织竞选工作，自己却钓鱼去了。他由三个较小的儿子陪着，乘坐一艘40英尺长的小帆船“神话二号”，沿新英格兰海岸航行，撰稿人与顾问们乘坐的一只包租的游艇和一艘记者船跟在它后面。每天晚上船一进港停泊，他们就去见罗斯福。罗斯福的意图如果是想给人造成一种他的生活丰富多彩的印象，那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因为报纸上登满了这位朝气蓬勃的总统候选人把舵扬帆的照片。他宣称：“我喜欢水上生活，它真是其乐无穷！”

竞选本身倒显得平平常常。罗斯福旅行了大约13000英里，发表了几十次演讲，而且从火车——“罗斯福专车”——后部的讲台上发表了无数次不拘形式的谈话。竞选的目的在于取得美国人民的信任，据莫利说，“对他来说，竞选是天大的乐事。这里有宽广的河流，绿色的森林，玉米摇曳，麦浪翻滚；这里有三五成群的朋友——从坐在行李卡车上向飞驰而过的车窗内的笑脸挥手致意的人们，直到赛马场上或市集上汗流浹背的千千万万人，这里有伸出来表示欢迎的手，亲热的问候的话语和能映照出微笑的一张张脸孔。”

表面上，罗斯福还像平素一样非常快活，但他所看到的景象却使他深感不安，情况要比他想象的更糟。他对安妮·奥哈拉·麦考密克说：“我观察过千千万万个美国人的面孔，他们露出了迷途羔羊似的惊惶之色。”罗斯福于是忆起了停战后的欧洲，仿佛又看见了人们在夹道欢迎伍德罗·威尔逊时呈现出来的那种渴望的心情。“当时他们想到战争，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也许这个人能够把我们的后代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现在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我们碰到了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某事某物，也许这个人能够拯救我们了。’”早先罗斯福曾用以下几句话概括了他对胡佛政府的指责：一、胡佛政府凭藉错误的经济政策鼓励投机倒把活动和过剩生产；二、它企图尽量缩小总崩溃的涵义，使人民认识不清它的严重性；三、它把总崩溃的根源错误地归咎于其他各国；四、它拒绝承认和消除自己给国内造成的不幸，它迟迟不施行救济，它把政治、经济改革置之脑后了。

罗斯福再三提出这类批评，直到竞选将近尾声时，他才在巴尔的摩宣布要掀起一场战争来打垮“共和党领导的‘四骑士’：破坏、延误、欺骗、失望”。人们想从罗斯福的历次讲话和声明中寻找出始终如一的治国政策，但是失望了。经过仔细检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建议往往暧昧不清，有时甚至前后矛盾，正如他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所许下的诺言，既要平衡预算，又要增加用于紧急救济的支出。例如，莫利声称，有一次罗斯福收到两份互相矛盾的有关关税政策的草案，他随口对莫利说：“把这两份材料合编成一份”，弄得莫利无言以对。

在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时，罗斯福建议对银行和股票市场实行广泛的改革，主张拆散托拉斯者表示赞成，但他同时又许诺不准“无孔不入的官僚机构”过多地干预人民的生活。在托皮卡时，他根据约莫25人提供的材料炮制了一项农业政策，其中隐约暗示了实行国内分配计划以减少过剩的产品，而

同时又许诺不增加消费者的费用。在匹兹堡时，他因为受到像巴鲁克这种保守派的怂恿并得到路易斯·豪的赞同，一反以前避免表态的策略，表示愿意把政府开支缩减 25%。罗斯福宣称：“我认为减少联邦开支是政府能对实业界做出的最有效的贡献之一。”在苏城时，他批评胡佛铺张浪费和扩大官僚机构。外交政策几乎被完全忽视。在底特律时，他拒绝讨论劳工问题。因为那天刚好是礼拜天，他需要休息。他在关税问题上迅速地改变立场，难怪胡佛轻蔑地说他是“一条穿苏格兰方格呢的变色龙”。

罗斯福并不介意这些根本上互相矛盾的地方，而知识界却对此感到心灰意冷。一个知名的新闻记者埃尔默·戴维斯说，他敢肯定罗斯福是赞成废除禁酒法的，但他摸不透他在其他问题上的态度。他这样写道：“对他提出的任何一项原则，他都没法提出反对意见，很少能提出异议。至于这些原则的含义，那只有罗斯福和上帝心中才有数。”某些诋毁他的人称他是“民主党内的哈定”，而门肯则挖苦他是“小字辈罗斯福”。斯蒂芬·怀斯先生曾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说，他后悔自己为何要支持罗斯福。他说：“这个人肚子里没有文墨，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为人和顺，讨人喜欢，但立场不稳。他全身是用泥巴捏成，里面没有岩石。”弗兰克福特这样回答：“我拥护罗斯福，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当前最紧迫的要求是把胡佛赶下台去……也许你有时 would 忘记，政治就是选二等货色。”威尔·罗杰斯发表意见说：“依照大部分人的心情看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宁愿不推选任何一个人。”这几个字道出了美国人对竞选过程感到失望的心理。

但是，罗森曼和莫利后来都认为，“新政”的每项重要计划，除开国家工业复兴法、赤字开支和放弃金本位这几项而外，都已在罗斯福 1932 年发表的竞选演说中预先提到了。他们指出，罗斯福在盐湖城曾提出振兴铁路的计划。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他赞成把公营电力的发展作为“全国的尺度”，并主张政府管理公用事业。在波士顿时，他说过“不能饿死一个人”，并答应实行联邦救济计划、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甚至在强调预算平衡的匹兹堡演讲中也留了一条后路：“如果我们的公民中有人忍饥挨饿，必需我们额外拨出一批资金，因而使预算难以保持平衡，我就会毅然把全部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并要求他们批准拨出这笔额外的开支。”威廉·E·勒西坦伯格有不同看法，他指出罗斯福的竞选活动中没有提到有关新政的某些里程碑式的内容，比如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计划、联邦建房和清除贫民窟、成立田纳西水利局、大大增加对富翁的征税、通过联邦制裁来推行集体谈判以及实施广泛的救济计划。

罗斯福在旧金山给联邦俱乐部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最富有说服力，也是他的进步主张得到充分表现的标志。从这个提倡全国一盘棋的演说中可以看出新政的计划和指导思想，可以看出罗斯福的意图是想发挥国家作为社会福利保证人的作用。他着重强调，美国有必要巩固已得的利益，而不要进一步扩张，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成熟了。他在回溯 1912 年的特罗伊演说及其新民族主义含义时着重指出，私人经济实力已成为众望之所归，如果企业界不能负起伴随实力而来的责任，如果市场不再起到平衡的作用，那末国家就有责任迅速采取行动来保护公众的利益。“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利，而且这意味着他也有享受舒适生活的权利”，罗斯福说。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就是维持一种平衡，使得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使得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希望的安全，使得每个人都能获致符合其能力的权力……”

大多数美国人可能还猜不着罗斯福的想法，但赫伯特·胡佛则不然。他一开头就从对手的轻率诺言中洞察到面临变革的危险性。他被迫在竞选中顽强抵抗，虽然他已失去获胜的信心，又缺乏罗斯福的那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和辩才。总统的公务已很繁重，但他仍旧亲笔起草讲演稿；这些讲演华而不实，他在发表时语调低沉。里面既有关税激进主义临头的警告和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又有对复兴在望的乐观预告，这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人们有时向他喝彩，但多半是面露愁容，有时甚至是阴森可怖。在威斯康星州，胡佛的火车有一次误了点，因为发现有个人在铁轨上偷拔道钉。底特律有 25 万人靠救济维持生活；当胡佛到达火车站时，一群暴民向他狂呼：“吊死他！吊死他！”在内华达州，州长拒绝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胡佛成了一种原始冲动的牺牲品——大萧条的替罪羊。

1932 年 10 月 31 日，总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竞选中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这次竞选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竞赛，也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竞赛，而且是两种统治哲学的竞赛。”罗斯福及其追随者“主张变革和所谓新政，它只会从根本上破坏我国现有制度的根基”。胡佛急中生辩才，他把这批主张革命的人——点名——休伊·朗、智囊团、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罗斯福当选后，这些人一定会得势。“这批民主党要人和帮手所提倡的革命变革非常彻底而深刻，这些变革一旦实现，美国便不再是我们过去熟知的美国了”。结果将是赤字开支，通货膨胀，政府干预企业和“联邦政府的无限扩张”。与此同时，“官僚政治的滋长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无数都市城镇的大小街道上杂草蔓生，千百万亩良田荒芜……”

罗斯福在波士顿的一家旅店里收听到这篇演说时忿怒万分。他斩钉截铁地对助手说：“我决不能让胡佛怀疑我的美国主义。”助手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在晚间的讲演中不要理会胡佛的这番话。正如欧内斯特·林德利指出的，在 1932 年，罗斯福还不是一个“人们膜拜的伟大偶像”。“全国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但罗斯福先生的外貌和声音都不像是一个救世主。他甚至还不配称做布赖恩……这个教养有素、风度翩翩的贵族，演说时有根有据，妙趣横生，但从他的仪表和谈吐中完全看不出有半点革命的气质。他没有许愿要建立乌托邦，他冷静地声称自己不懂得万灵药方，也不相信有万灵药方……但他肯定是斥责执政党的一种潜力……”

竞选结束时罗斯福参与了波基普西传统的大选前夕的活动，这时他脑子里浮想联翩：“……内布拉斯加州麦库克的日落、进步的农民、苏城、密尔沃基、芝加哥、底特律……遭受苦难而又无畏的比尤特矿工……洛杉矶，在顷刻之间——按历史的时间量度——建成一个城市的奇迹……在佐治亚州的老家的乡邻……儿童们坐在温泉边的轮椅上……波特兰、波士顿、普罗维登斯……把我目睹的一切编织在一起……为了实现美国人民的理想与希望，人人都需要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本人意欲成为这次复兴运动的一个平凡的象征。”

11 月 8 日一早，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村投票后回到了纽约市；他一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比特莫尔的民主党总部听取这次选举的结果。只有路易斯·豪不在场。他还呆在麦迪逊大街对过的一间办公室里。这里现已几无人影，他在竞选活动所遗弃的一片废墟中忧虑重重，惟恐在最后一刻会出现不幸。罗斯福一跃领先，但豪对这些报告不太乐观。他说：“败北者在失败前总还要挣扎一番。”罗斯福洋洋得意地亲自接听现场指挥人员打来的电话。“你是说

顽固的宾夕法尼亚州也投了我的票吗？”当他得知这个基石州 60 年来第一次投向他民主党时，他哈哈大笑起来。罗森曼注意到有两个穿黑衣裤的人溜进屋里来，整个晚上都在州长左右值勤。他们是特工人员——罗斯福今后终生都要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生活了。

最后，连豪都深信罗斯福会以绝对优势获胜了。当法利和罗斯福及埃莉诺一同去请路易斯·豪参加欢乐人群的行列时，他们发现豪“像守财奴数点黄金似的”正在埋头统计投票结果。他宁愿亲自打电话表示祝贺。“你好，富兰克林”，他说。“看来我现在总算大功告成了。”罗斯福请他过去，以便当众宣告：“为赢得这次胜利，有两个人功劳比谁都大。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和同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上校，另一个是美国人的模范吉姆·法利。”

罗斯福以 2280 万票对 1575 万票获得全胜。选举团票数的多寡更具有决定意义。胡佛只赢得六个州的拥护，其中除去两个州外均在新英格兰。民主党人在国会里赢得了多数。赫伯特·H. 莱曼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在胡佛败北后，洋洋得意的罗斯福就返回第 65 街自己的住所，母亲在门口拥抱他。“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夜！”他这样宣告。接着他的儿子詹姆斯扶他上床。这时候这位当选总统罗斯福已经平静下来了，陷入了沉思。当詹姆斯弯下身子吻他父亲并且祝他晚安时，罗斯福抬头望着他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一生只害怕一件东西——那就是火。今晚我觉得我害怕的是另外一件事。”

“爸爸，你害怕什么？”

“我担心我也许没有精力去出色地履行这个职务。”

于是他请求儿子替他祈祷。

第十六章 危机四伏

……倒闭的银行越来越多；在纽约和芝加哥爆发了反饥饿示威游行；在底特律，失业的汽车制造工人发动了骚乱。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在南、北达科他州、依阿华州和堪萨斯州，没有销路的谷物被付之一炬，刺激性的浓烟笼罩着天空……

整个的金融机构摇摇欲坠……黄金外流已接近 25000 万美元，黄金储备已低于支持通货所需的数量。财政部已发不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美国已经陷入极端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罗斯福要到 1933 年 3 月 4 日才能宣誓就职。罗斯福疑心胡佛会企图施展手法使他接受这届威信扫地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在他尚无权力制定政策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为政策承担责任呢？

罗斯福在他自己可以自由行动的情况下，他宁愿利用接任前的这段时间稍事休息一番，准备向赫伯特·莱曼移交州长的职位，并悄悄地组织新政府的班子。事实上，他曾考虑赴欧洲旅行，以避避风头。但经济危机容不得他耽搁过多的时间。这年冬天是萧条的最低点。胡佛曾小心翼翼地通过由复兴金融公司向工商业提供贷款的办法使经济回升，但是这种回升现在已经失去势头……休伊·朗发动一次“分享我们的财富”的咄咄逼人的运动吓破了富人的胆；而一个名叫查尔斯·E·库格林的蛊惑人心的神甫则在电台上喷吐着未经消化的宗教、经济教义和民粹主义的杂烩，散发出一股法西斯主义臭味。

旧秩序业已崩溃。全国的企业界领袖应召到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去协商解决危机的措施。这些最有权势的人物提供的意见令人泄气、令人沮丧。只有伯纳德·巴鲁克提出的意见带有普遍性：“平衡预算。停止挥霍金钱……征收捐税……向每个人征收每件物品的税金。”

有些人建议，与其等一个季度以后再实施早已许诺的“新政”，倒不如立即就让胡佛辞职，把白宫移交给当选总统。但是胡佛则认为罗斯福缺乏责任感，因而警觉起来，决心取消十一月份的决议，想说服继任总统接受他所提出的扭转经济萧条的各项政策。后来，胡佛相信，正是这种惧怕罗斯福执政的情绪使国内经济一蹶不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姑无论他的新政是否正确，这些政策一下子就使我们的企业界停顿下来，听候来自白宫的消息，商品和证券价格立即下跌，失业人数亦随之剧增。”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斯福和胡佛之间的利害冲突并不是由于国内问题，而是由于国际纠纷引起的。在竞选期间，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性问题，当时他对莫利说：“胡佛的外交政策还不错。”1932 年 11 月 13 日，罗斯福忽然收到胡佛总统拍来的电报，请他去商讨有关欧洲战争债务的重大问题。英国和其他债务国一致照会华盛顿，不仅要求暂缓支付将于 12 月 15 日到期的欠款（后付期限为一年），而且还要求重新研究整个战争债务问题。国际主义者主张把债务一笔勾销，但是胡佛和多数美国人则提出异议。胡佛认为，可以利用修订债务一事作为手段，说服欧洲人恢复金本位制。由于任何协议都要由新政府执行，因此胡佛建议罗斯福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十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在 1 月 20 日，而不是在 3 月 4 日结束，但是这个修正案直到 1933 年 2 月才得到批准。

由于不便拒绝与即将下台的政府合作这一建议，11月17日，罗斯福给胡佛打电话，要他做好会晤的具体安排。胡佛吩咐一名秘书在另一条线路上秘密监听，并将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这件事明显地证明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猜疑。

五天后的一个晚上，罗斯福在莫利陪同下抵达白宫，受到传达长“艾克”的迎接，在威尔逊时期罗斯福就认识他，罗斯福还认识一个看门人，他扶罗斯福下车，并同他握手。罗斯福和莫利乘电梯到了红厅，总统和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正在红厅等候他们。

“纽约州州长来了”，传达长通报说。

“见到你很高兴，州长，谢谢你光临”，严肃而又不安的胡佛说，并走上前去同罗斯福握手。

罗斯福和米尔斯互相打趣地交谈了片刻；米尔斯是罗斯福在达切斯县的邻居和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围坐在格兰特、杰斐逊、麦迪逊和约翰·亚当斯画像下方的桃花心木桌旁；胡佛和米尔斯各点燃一支雪茄烟，罗斯福和莫利正抽着香烟。总统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债务问题的背景及其与正在进行的日内瓦裁军会议和行将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之间的联系，谈话长达一小时左右。总统在谈话中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罗斯福。胡佛给莫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胡佛“掌握具体情况，并且能够明晰地分析问题，这不能不令人钦佩”。

胡佛认为，不管是一笔勾销债款或者拖欠债款，都会损害国际信用制度，给美国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胡佛一直凝视着编织在红地毯上的美国国玺的图案，这时抬起头来对着莫利说话，显然他认为这些来宾中只有莫利一人比较有学问。胡佛建议说，在欧洲人如数付清下月份到期的债款后，理应让他们和华盛顿就整个问题展开讨论。罗斯福表示同意，但对胡佛所提出的恢复债务委员会的这一建议却不肯明确表态。罗斯福不时地提出事先拟就的各种问题，有时点点头——胡佛以为这是表示赞成——其实这只是他表示了对方的谈话的一种习惯动作。

胡佛自恃地以为，只有他才能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因此他认定自己的任务是对继任者进行教育，使他不致偏离既定的路线。胡佛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写道：“我对罗斯福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和蔼可亲、讨人喜欢的人，他很想为民效力，但又缺乏见识。”胡佛看到罗斯福似乎为人很随和，以为他已同意恢复债务委员会的建议，实际上罗斯福一跨出白宫的大门就对新闻记者说，这个问题“和他不相干”。第二天他发表一项声明说，任何修改债务的事莫如借助外交途径磋商。这项声明竟使胡佛火冒三丈，他说他上了罗斯福的当。这样一来，一次旨在促进团结、共同解决危机的晤谈反而加深了现任总统和接任总统之间的矛盾。

本届国会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进步分子占多数。罗斯福打算利用开会期间通过一些措施，以使新政府一成立就有向萧条发动正面进攻的势头。

政府实行分工负责制：亚利桑那州具有保守倾向的议员刘易斯·W·道格拉斯和战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斯沃格·舍利负责削减预算和改组政府工作。著名的农业杂志《华莱士农民》的前主编、共和党人亨利·A·华莱士、蒙大拿州立大学教授M·L·威尔逊、特格韦尔和摩根索负责草拟农业法案。伯利一方面做农业救济工作，一方面配合威廉·伍丁等人加速制订关于失调的工业、特别是铁路系统的破产程序。一向主张对证券交易实行改革的塞缪

尔·昂特迈耶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实业家查尔斯·W·陶西格则在证券管理方面发挥顾问作用。

罗斯福在组阁时持有以下几点指导思想：一、他虽然以绝对优势击溃了胡佛，但民主党还是一个少数党，因此，他必须把共和党人的选票吸引过来，以便在 1936 年重新当选；二、委派保守的南方人领导国会中审核立法计划的几个要害委员会；三、在内阁中任命一位妇女；四、他不拟优待反对他竞选的那些民主党领袖，如艾尔·史密斯和牛顿·贝克等人。罗斯福已经确定吉姆·法利为邮政部长，还确定犹他州州长乔治·德恩为内政部长，科德尔·赫尔为国务卿；卡特·格拉斯参议员为财政部长。

混乱和失望笼罩着 1933 年这个阴冷而灰暗的冬天。衣阿华州 1/3 以上作为抵押的农田被取消了赎回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屋不致被抵税拍卖掉，农民们联合起来紧握手中枪，准备战斗。街头巷尾又出现了苹果小贩……人们又在忍饥挨饿。结婚的人数还不及平时的一半。为了节省几个钱，家庭主妇又重操腌水果和制肥皂的旧业了。多数存户对未来都不放心，纷纷从银行里提取存款。储备减少了，金融危机已在酝酿之中。

新年过后六星期，银行开始关门了。风暴席卷了密执安州。2 月 14 日，为防止州的银行机构倒闭，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宣布各银行放假八天。第二天下午，连日来乘搭文森特·阿斯特的豪华游艇“诺尔马哈尔号”在巴哈马群岛旅行的罗斯福抵达迈阿密后登了岸。当选总统罗斯福心情愉快，容光焕发，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但是这些讲话并没有给朝不保夕的人们带来什么安慰。“这 12 天来我始终未曾打开公文包”，他说。他还告诉记者，他已把巡航日记锁了起来，以免他那年轻人的情调被他们的喜欢窥探的眼睛所发现。后来他和莫利单独地进行谈话。莫利到迈阿密来向罗斯福汇报他与未来的内阁成员磋商的情况。这次会晤很快就结束了，因为罗斯福当晚要在海滨公园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

罗斯福乘坐一辆敞篷旅游汽车前往公园，一列车队跟随着。汽车驶过一条灯光昏暗的林荫道，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棕榈树。文森特·阿斯特与莫利和克米特、罗斯福同乘一部汽车，他对罗斯福很容易被刺这一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能向他开枪。”莫利回答说，在竞选期间始终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虽然危险是难以排除的，但罗斯福并不怕在人群当中出现。他对暗杀的危险泰然置之。数周前，约翰·加纳曾警告他可能有人想杀害他，他回答说：“我记得西奥多·罗斯福曾这样说：‘来自暗杀者的惟一危险是当暗杀者将其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时。大多数亡命之徒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晚上 9 点钟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汽车开进了灯火辉煌的公园，这时数千名群众把他的汽车围得水泄不通，他被举到了后座的最高位置上，以便大家都能看见他。“我离开这个地方已经七年了，但是现在又回来了”，他说。“我决心今后还要来。12 天来我在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水域中钓鱼，觉得很惬意。这次旅游的美中不足就是体重增加了 10 磅左右。”在笑声和喝彩声中，罗斯福大约讲了两分钟话，然后就下来坐在原来的那个座位上。他拒绝了一个新闻影片摄影记者请他重复一遍演说的要求，他向芝加哥市市长塞尔麦克打招呼，市长正在迈阿密参观访问。塞尔麦克打算商量一下关于复兴金融公司给芝加哥市一笔贷款的问题。会晤即将在待命载送当选总统返回纽约的火车车厢内进行。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爆竹似的声音；随后又听见几声”，罗斯福后来告诉记者说。站在近旁的莫利以为这是枪走火了。一个留着卷发的男人站在离当选总统不到 20 英尺远的凳子上向他开枪。惊骇的旁观者莉莲·克罗斯夫人抓住了谋杀者的手臂，使得他接连发射的四枚子弹没有命中目标。传来了一片喊声、尖叫声和一阵突发的骚动。鲜血染红了塞尔麦克市长的衬衫前襟；一个妇女被子弹击中腹部；另外三个人，其中一名是特工人员受了轻伤。犯人被广大观众和警察打翻在地。

“我没有事！我没有事！”罗斯福在喧嚣声中高喊着安慰大家。他的司机把汽车向前开过去，但当选总统命令他停车，因为他看见塞尔麦克胸部负伤，正摇摇欲坠。特工人员拼命向司机吼叫，要他赶快开车，但是当选总统下了相反的命令。

当汽车开到杰克逊纪念医院急救室门口时，躺在罗斯福怀里的塞尔麦克神志清醒。他立刻被送上手术台。罗斯福一直等到他被送进手术室，并同他一起呆了几分钟。市长轻声对他说：“我感到高兴，我代替了你。”当选总统在返回“诺尔马哈尔号”以前，还看望了其他几位受害者。正在纽约约定演说的罗斯福夫人当晚回到家里时，管家唠唠叨叨地向她叙述了这次未遂暗杀事件的经过。当一个记者给她提供了详细情况时，埃莉诺仍然镇定自若，她说：“这原是意料中事。”当她同守在市长床边的丈夫打通电话后，她对记者说：“他挺好，他一点也不惊慌。”在事后一周内对未遂暗杀犯进行了审判，判处他 80 年徒刑；当塞尔麦克于 3 月 6 日死去后，他又被改判为死刑，用电椅处死。他差一点把历史改变了。

一回到纽约，罗斯福就被卷入银行业危机的漩涡。克利夫兰、孟菲斯和旧金山等地的银行倒闭了。每个城镇的银行周围布满了长蛇阵，因为储户们急于取出他们的存款。装甲卡车夜晚穿梭于城市之间，将现金运送至被围的银行，但仍无法控制迅速蔓延的经济恐慌。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揭露出美国的金融巨头滥用资金，这一事实更加深了公众的疑虑。人们贮藏现金，把现金藏在床垫下，或者埋在院子里。外国人从纽约各家银行里把存款换成黄金取出来，几乎每开走一只船，美国的黄金就有一部分随之外流。银行不敢贷款，国家的金融机器已停止运转。卡尔文·柯立芝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银行倒闭了，这位前总统发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伙伴双手捧着头趴在办公桌上。柯立芝把一张 5000 美元的支票放在他身旁，然后悄悄地离开。

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宣布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积极主张降低关税的科德尔·赫尔担任国务卿。卡特·格拉斯不相信罗斯福会赞成保守派的财政政策，因此谢绝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这一职务就由威廉·伍丁来担任。汤姆·沃尔什担任司法部长，但未上任就死了，于是这项职务就由霍然·S·卡明斯来担任。曾在威尔逊政府里担任国内税收专员的丹尼尔·C·罗珀被任命为商务部长。罗斯福本想委派乔治·德恩担任内政部长，但因公营电力鼓吹者坚决反对他，于是这项职务就由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具有进步党思想的共和党人哈罗德·L·伊克斯来担任。德恩担任陆军部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克劳德·斯旺森担任海军部长。斯旺森老而且病，因此罗斯福本人实际上就成了海军部长。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农业部长，他的父亲在哈定和柯立芝执政时曾担任这个职务。吉姆·法利被任命为邮政部长，并负责授赠官职事务。弗朗西丝·珀金斯被任命为劳工部长，成为第一名进入内阁的女官。

3月2日晚上，当罗斯福同家人到达华盛顿时，天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他们随身带来两份总统公告的草稿：一份是宣布全国银行放假，另一份是召集国会开一次特别会议。当火车在寒冬的一片萧条的大地上行驶时，人们注意到，在美国的这个中心地带，工厂烟囱停止了冒烟。21个州宣布银行部分或全部放假，其余的银行也摇摇欲坠。

罗斯福到达五月花饭店时发觉银行危机已接近顶峰。即将下台的政府中的主要财政官员，例如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局的尤金·迈耶等人都敦促胡佛暂时关闭所有的银行以避免彻底破产。但胡佛只同意颁布一个禁止提取存款和黄金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一定要得到罗斯福同意后他才愿意签署。国会中的民主党领导人应召到罗斯福的套间来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不采取联合行动，只要胡佛还在执政，就应由他来负责采取行动。

第二天下午，罗斯福与夫人、儿子詹姆斯到白宫和即将离任的总统一家人共进茶点。按照传统，这是一种正式社交活动，但传达长艾克·胡佛却轻声地告诉当选总统罗斯福说，胡佛总统已叫米尔斯和迈耶在隔壁房里待命，以便对危机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当寒暄叙谈正在红厅内平平淡淡地进行时，莫利从五月花饭店匆匆地走来。在双方的助手的参与下，胡佛便和罗斯福就处理危机的最后责任问题再次地展开争论，但没有取得结果。胡佛自己已经明白罗斯福不愿意采取联合行动的原因，他心里十分生气。十天前，一个名叫詹姆斯·兰德的工业家对他说，特格韦尔在进午餐时对兰德说，罗斯福的顾问们认为银行体系会在几天内崩溃，“其责任势必推在胡佛身上”。

罗斯福认识到这次谈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决定缩短谈话时间。他弯下腰来把支架摆好，想使那感到烦恼的胡佛摆脱一项吃力的义务，他说：“总统阁下，我知道你很忙，如果你不能回访，我完全谅解。”后来，罗斯福对格雷斯·塔利说。那天下午，胡佛总统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他，接着回答说：“罗斯福阁下，你在华盛顿呆上像我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便会知道，美国总统不拜访任何人。”听完这番话，罗斯福便叫他们一家人离开这个房间，他敢肯定，吉米想对着胡佛的眼睛猛击一拳。他在离开时说：“总统阁下，我将在饭店里恭候裁夺。”

整个晚上，罗斯福和顾问们讨论了这场危机。美国银行体系显然没法子顶住再营业一天的压力了。人们带着形形色色的建议进进出出。电话铃响个不停。胡佛打来两次电话，最后一次是在罗斯福宣誓就职日凌晨一点打来的。私人之间的敌意日益加深，事到如今是不可能达成协议了。罗斯福提议他俩都上床休息。莫利和伍丁却到财政部去了。米尔斯·迈耶和副财政部长阿瑟·巴兰坦正在主动地设法说服州长将银行关闭，以免重新开始营业。除伊利诺斯州州长亨利·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莱曼以外，其他州长都点头同意。伍丁和莫利也一同协助办理这件事。尽管即将上任的总统和即将卸任的总统彼此有恶感，他们的高级助手们还是和睦地相互配合。莫利说，他们“已经忘记自己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了……”。凌晨四点钟以后，他们总算说服了这两位州长。莱曼州长宣布全州各银行休假，霍纳也几乎同时下达了同样的指示。

华盛顿天刚拂晓，世界上这个至为伟大的国家的金融心脏停止了跳动。宾夕法尼亚大街刮来了一阵寒风，忿怒地吹动着庆祝宣誓就职的游行队伍所经过的马路两侧的美国国旗和彩旗。

第十七章 叱咤风云

“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像过去那样生存下去，将会复兴和繁荣起来……我们所必须畏惧的惟有我们自己本身。”罗斯福这番充满信心的话像战斗号召一样响彻这块灾难深重的国土。“这个国家要求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对非常时期作战的广泛的行政权力，如同我们真的受到外敌入侵时应授予我的那么大的权力。”很少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像这位新总统在1933年3月份一个阴冷的星期六下午如此充分地表达了民众的情绪。

富兰克林·罗斯福作出的实施“新政”的保证，他的决心，他的轻松愉快的乐观态度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美国人民有了一位不为无所作为寻找借口的总统；现在有了一位准备发动攻势的总统。罗斯福旨在克服萧条的决心在各地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有在施粥所排起长蛇阵的挨饿的百姓，有在各大城市郊区的破烂不堪的房屋中居住的穷人，有平原地区企图造反的农民。在演讲后的一个星期内，表示拥护的信件成千封地涌向白宫。埃莉诺·罗斯福发现人民毫不犹豫地愿意接受这种多少有几分令人心寒的独裁统治的前景。她说：“你觉得只要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在那以前不久，罗斯福曾向《纽约时报》记者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大致描述了他对总统职责的看法。他说：“总统职务不仅是一种行政职务。这是总统职务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它主要是一种管理职责……特别是在道义上起领导作用。”

罗斯福为了使他的政府行动起来，他便请求参议院立刻批准他的内阁，他的内阁没有经过听证会的程序就匆匆被批准了。当夜幕降临华盛顿的时候，内阁成员们都在白宫楼上的椭圆形大厅里集会，由罗斯福总统的老朋友，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主持宣誓就职仪式。罗斯福总统观看了由骑兵队和40个行进乐队举行的历时五个小时的庆祝游行，民众都兴高采烈。这次“小型家庭聚会”是新内阁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宣誓就职时举行的集会，也是在白宫首次举行这样的仪式。罗斯福同内阁员们一一握手，并把由他签名的委任状交给每位阁员，并且宣布，今后要称呼珀金斯小姐为“秘书女士”。就职仪式结束后，罗斯福前往白宫红厅接见应邀从佐治亚温泉赶来参加就职仪式的13位残疾青少年。

一位记者注意到，在内阁宣誓就职的时候，罗斯福的孙儿孙女们在各个大厅里嬉戏玩耍，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川流不息。埃莉诺邀请了约莫75位亲戚，其中有艾丽斯·朗沃恩以及她的兄弟克米特和阿尔奇·罗斯福，参加当天晚上的自助晚宴，并且破例在门口迎接客人。除开这个家庭聚会而外，罗斯福未曾参加庆祝就职的其他活动。罗斯福由他的夫人带领一群欢天喜地的亲属和朋友代表他在各个场合应酬宾客。

内阁于午餐后再次在白宫聚会，出席会议的还有副总统加纳、众议院议长亨利·雷尼、豪和莫利。珀金斯小姐回忆说：“总统有条理地描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实情以及存在的法律问题。”总统在那次会上正式询问卡明斯究竟什么时候能就“与敌国贸易法”的有效性提出自己的看法，卡明斯回答说：“总统先生，我现在谈谈我的看法。”接着，罗斯福会见了国会领导人，询问国会能否在3月9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国会领导人表示赞同。那天傍晚，罗斯福签署了要求国会召开会议以及宣布全国银行休假四天的文件。为了不

亵渎安息日，银行休假直至午夜过后才生效。全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闭了，禁止金银外运，禁止囤积居奇，违者罚款 10000 美元或者判处 10 年徒刑。总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惊人的果断措施来履行他作出的“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的保证。

与此同时，伍丁、莫利、米尔斯、巴兰坦以及他们的助手们为了使银行重新开业而昼夜辛劳。总统要求银行家们协助提出解决办法，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有些人业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人人都担心在银行重新开业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货币来满足起码的需要。有人在谈论怎样使银行体系国有化、保证存款和发行临时通货的问题。但是伍丁认为，必须寻求一种比发行“膨胀的通货”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伍丁是实业家，不是银行家。他认为，这个问题既是金融问题，也是恢复信心的问题。

翌日早晨，伍丁跑去找莫利，莫利正在忧郁地用早餐，他对莫利喊着说：“我想出办法了！我想出办法了！”他说他在上床睡觉以前拿起了吉他，琢磨着发行临时通货的问题。“我弹了一会儿吉他，又看了一会儿书，睡了一会儿，又想了会儿。老天爷作证，我就是这样想出了解决办法！我们不用发行临时通货！……我们不妨用银行的全部资产作保证金发行货币……这样它就不会使人们担惊受怕，它就像真正的货币一样。”这是一种最简便的办法。伍丁和莫利急忙赶到白宫向总统汇报这件事。总统听了很高兴，立即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莫利补充说：“接着我们便离开白宫，在财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法案的起草、咨文的起草等细节争论了 48 个小时，并和国会领导人共同磋商。”

银行紧急状态法使总统宣布关闭银行有了合法依据。只准资金比较雄厚的银行重新开业，不太稳定的银行在暂停营业时由政府指派“监督人”管理。财政部受权发行联邦储备钞票，为防止挤兑提供足够的货币。星期四即 3 月 9 日拂晓，精疲力竭的伍丁离开办公室时对新闻记者说：“是的，解决了。两个比尔都完成了。你知道我的名字叫比尔，所以我的使命也完成了。”

在银行紧急状态法案问题上，众议员们经过半小时的辩论后高呼“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因为来不及将法案付印，几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法案副本就匆匆送至国会山。只由众院的几位领袖审阅了法案，没有举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众院共和党领袖伯特兰·斯内尔众议员说：“房子就要烧光了，美国总统却说这就是灭火的办法。”这项法案在战时危机的气氛中以呼声表决通过，并提交给参议院。参议院的辩论却不草率。像小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之类的进步党人争论说，应当对银行加以更严格的管理。但是这项法案终于在上午 8 时前不久以 73 票对 7 票获得通过。这项法案被急忙送到白宫，罗斯福总统在他实行的新政中的第一项立法成果上签了字，新闻摄影记者们拍下了这个镜头。

星期一以前银行还不能重新开业，但是这种拖延是有裨益的。因为它使罗斯福有机会亲自向美国人民说明这一复杂过程，并说服他们在恐慌期间取出的钱再存入银行。他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时经常采用炉边谈话的方式——一种非正式广播讲话，他采用达切斯县和温泉的邻里乡亲所能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些复杂问题。这一次，采用炉边谈话的方式作说明是最时宜的。

礼拜天晚上 10 点钟，罗斯福总统开始向全国发表首次讲话，共有 6000

法案英文为 Bill（比尔），与伍丁的名字同音。

万人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总统说：“我想花费几分钟时间同美国人民谈谈银行业问题……我要告诉大家过去几天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那么做，下几步怎么走。”他用普通公民容易听懂的话就银行危机问题谈了20分钟，他的语调是热情而又令人放心的。罗斯福敦促民众把他们节余的钱存入银行。他说：“把金钱存入重新开业的银行比放在床垫下更保险。”最后他又回到就职演说时的话题。“让我们团结一致消除恐惧心理。我们已经成立了恢复我们的金融体制的机构。现在要由你们支持这个机构使它能够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我们团结一致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罗斯福以其巧妙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新政”宗旨。

城市居民曾估计，银行在次日早晨开门照常营业时会有许多人取款。仅在纽约，第一天的存款数就超过取款数1000万美元。到了周末，由于财政部作了最大努力才为银行评级后准予开业。全国大约18000家银行中约计有75%的银行重新开业。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都不稳定，但是伍丁亲自指示一小部分银行重新开业。他说加利福尼亚人不能没有自己的银行。只有一家被董事们放弃的银行错误地准予开业。至于其他银行，重新开业的信心使它们能够经受住这场风暴的考验。

3月9日晚，罗斯福把银行法案签署为法律后刚过一个小时就抓住这项法案产生的势头，将国会领袖们召集到白宫。林德利说：“午夜过后，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离开了白宫，有的人感到茫然，有的人决心已定，有的人愤怒万分。”他提醒国会领袖们记住民主党在竞选中所作出的把联邦预算削减25%和实现预算平衡的保证，并透露了这位总统提出的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政府节约计划。预算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拟定了这项节约计划，它规定把退伍军人的津贴削减一半——减少四亿美元，并把政府官员的工资，其中包括国会议员的工资，减少一亿美元。

第二天，即3月10日，罗斯福把这项节约法案提交给国会。他在提交法案时所附的一封信中说：“三年多以来，联邦政府始终走在破产的道路上。”胡佛在任期间积累的巨额赤字（每年50亿美元），正在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而只有厉行节约，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信心。“在近代历史上，开明政府常常由于实行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

在执政的第一周，罗斯福无视胡佛关于总统毋须拜访任何人的劝告，在已退休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92寿辰时前去登门拜访。出于对霍姆斯怀有的敬意，罗斯福步履艰难地登上很高的台阶，来到这位大法官家里。在告辞之前，总统征求了他对克服这场经济危机的意见。这位在内战中冲锋陷阵的退伍军人回答说：“团结起来，战斗吧！”罗斯福走后，霍姆斯转过身来对一位老同事说：“他的才智是二流的，但性格却是一流的。”

罗斯福开始了一个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立法时期，即“第一个百日”。全国已到了谷底，没有别处可去，只能向上攀登。每届新政府都同美国人民欢度传统的蜜月；1933年，人民的善意胜于往常。人人都希望新政成功，甚至共和党人也是如此。国会无疑地还像1917年那样备受战争心理的支配，以惊人的速度对罗斯福的要求进行表决。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党的忠诚是肯定的，他在民众中深受欢迎，国会议员们欣然接受白宫的指导。然而，随着危机的气氛逐渐消失，国会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它的领袖们有才能，经验丰富，尤其是控制委员会结构的南方巨商，他们不想充当橡皮图章。罗斯福作为调停者的技能在力求国会批准他的法案方面发

挥了重大作用。他性格豪爽，没有教条主义作风，只要基本原则不受到损害，就允许国会给新政立法打上它的烙印。

3月16日通过了农业调整法，立法高潮开始了。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助理部长特格韦尔根据许多农业领导人提出的各种建议仓促地草拟了这项法案，其目的在于恢复农业收入，减少剩余产品。这项法律基本上确定了一项国内分配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农场主限制耕种面积可获得津贴。以对加工厂厂主征税的办法来筹集支付津贴的资金。而这种税收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罗斯福承认，这是“一条没有走过的新路”，但是他强调说，要恢复农业，就必须采取一些步骤。在5月12日通过这项法案之前，国会提出一项修正案，授予总统全权来实现通货膨胀，做法是减少美元的含金量或者发行纸钞。财政上的保守分子刘易斯·道格拉斯叹息道：“西方物质文明就此终结了。”

3月21日，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宣告成立。在第一个百日的立法中，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是最符合罗斯福心愿的机构。这个机构表明了他一生中对于森林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浓厚兴趣，其目的在于招收25万失业青年，根据造林和防洪计划，把他们分配在森林和国家公园中工作。3月31日，国会以呼声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过了个把礼拜，第一个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的营地在弗吉尼亚州卢雷附近建立起来，招收了2500名青年。

3月21日，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案。因为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所以联邦政府直接负责帮助经济上的受害者。总统曾谋求一笔五亿美元的拨款，打算凭借贷款和赠款的方式分发给各州，用以解决失业问题。5月24日，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从而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也就是后来根据新政为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就业机会而成立的许多机构的前驱。哈里·霍普金斯本来在纽约担任临时紧急救济署署长，这时他心甘情愿把薪金从每年15000美元降低到8000美元来到华盛顿负责管理联邦紧急救济署。霍普金斯说：“饥饿是毋容争辩的事实。”他刚上任2小时就发放了五亿多美元赈济受害者。

3月27日，农业信贷管理局宣告成立。这个机构是根据行政命令成立的。它把几个本来应该帮助农场主的政府机构合并成一个机构，小亨利·摩根索负责管理这个机构。农场押款法旨在向即将被取消押款赎回权和失去农场的农场主提供贷款。

3月29日，国会通过了“证券真实”法案。总统说：“这项法案要求买主和卖主都要认真地对待证券交易上的规矩。它使卖主有责任提供证券真实情况。”凡是出售证券的人都应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供全部情况，违者应受到严厉惩罚。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授权阻止出售黑市（隐瞒真相）证券。5月27日，国会通过了这项立法。随后，1934年总统又提出管理证券市场的证券交易法案。老华尔街投机商乔·肯尼迪被任命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罗斯福对批评这项任命的人说道：“让贼去捉贼嘛！”

4月10日，田纳西水利局宣告成立。这项法案反映了罗斯福本人长期以来对发展国营电力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兴趣。他开始制订雄心勃勃的地区性计划。参议员乔治·诺里斯长期以来为在马瑟肖尔斯的田纳西河建立国营电站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运动扩大为开发几个州的大约64万平方英里的整个流域的一项惊人的计划。田纳西水利局强调社会规划和政府的作用，它因此是新政最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一项措施，嗣于5月18日顺利地经国会批准，已经成了地区自然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非常成功的范例。

4月13日，国会已提出房主贷款法案。6月13日，通过了这项法案。它对城市房主所起的作用同农场押款法对农场主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房主贷款公司凭藉出售债券筹集了20亿美元的周转性借贷基金，它向房主发放低息贷款，使他们按期支付押金，从而使得上万所住宅避免押金赎回权被取消的情事。多达1/5的押金住宅最终由房主贷款公司重新提供了资金。

4月19日，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几种原因，罗斯福发布了一项长期禁止出口黄金的行政命令——实际上使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想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减轻债务人负担的农业州国会议员都不断要求通货膨胀，他在这种压力下，面临的抉择是，或则顺从，或则自己发挥领导作用。在厉行节约的口号下，他还对早期的通货紧缩作用感到担心，因而决定奉行一项受节制的通货膨胀政策。如果美元在世界各国的贬值货币中找到与自己相称的比价，也可使美国的国际贸易得到急需的促进。正是像小J·P·摩根索这样一个人物对放弃金本位制作为防止通货紧缩的一种手段表示赞成。尔后，5月26日，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废除了公共合同和私人合同中要求用具有特定的黄金含量的美元偿付债务的条款。

5月4日，国会制订了紧急铁路运输法。在美国工业系统中，处境最糟的也许是铁路了。绝大部分铁路完全是靠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维持运行的。6月16日通过了这项法案，其目的在于借助节约、加固线路和改革规章制度来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铁路运输系统。

5月17日，国会制订了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参议员卡特·格拉斯提出了这项法案。虽然它不是新政的产物，但是华盛顿盛行的改革气氛给予它以推动力。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成立了投资公司，靠出售证券来发财，而这项法律不准它们继续经营这种行业，使它们无法再来利用储户存款进行冒险了。依照这项法律还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防止储蓄存款由于出现银行倒闭风而遭受损失。虽然罗斯福当时只是勉强地改变自己的看法，同意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但是人们却认为，实行储蓄保险制是新政中极为重要的功绩之一。

4月6日，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项由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L·布莱克提出的法案。该项法案旨在把每周工作总时数从48小时减少到30小时来增加就业人数。罗斯福对该项法案是否符合宪法持有怀疑态度，并且认为它会阻碍经济复苏，因为它没有保持工资水准的规定。一项每周领12美元边际工资的工作可能变成两项每周领6美元的低于边际工资的工作。

5月10日，罗斯福召集一些对立团体在白宫开会，但是会议进行两小时之后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总统在盛怒之下指定了一个起草委员会，由前智囊团成员休·S·约翰逊将军任主席。他吩咐委员会委员把自己关在屋里，如果拿不出一项满意的法案，就不准出来，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产生了全国工业复兴法。

6月16日，也就是在国会即将休会之前，参议院以五票多数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后来就在大肆宣传的情况下急忙将这项法案送交罗斯福。罗斯福宣称：“通过我刚才签署的这项法案，是为了使人民重新获得就业机会。全国工业复兴法大概可作为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的和影响最深远的法律载入史册。”休·约翰逊被任命为执行这项法律的全国复兴管理局局长。哈罗德·伊克斯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局，这个机构有权修建公路、堤坝和联邦建筑物。

第一个百日过去了。15 篇咨文已呈送国会，要求对全国性问题采取行动；15 项重要法案已得到通过；罗斯福发表了十次重要讲话。这些法律中绝大多数是有争议的；一些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还是可疑的。但是罗斯福无意为美国创建一种新的体制结构。相反，他是在设法医治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通过护理使它恢复健康。只是因为常规疗法再也不能奏效，他才采用了试验性疗法。罗斯福在竞选中曾指责说，胡佛未能使美国经济复兴是因为他在使用现有疗法方面过分胆怯。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讲话时许下的诺言是，“要进行大胆、持久的试验”——目前他正在履行这一诺言。

罗斯福谋求同苏联和拉丁美洲改善关系，这是他承担世界领导作用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从未承认过在 1917 年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但因经济大萧条，保守分子改变了观点。企业家深信，苏联是美国出口商品的一个庞大的市场。罗斯福也小心翼翼地和苏联人谈判，并于 1933 年 11 月 16 日正式承认苏联。罗斯福曾夸口起草了海地宪法，如今也着手履行他在就职演说中作出的在本半球实行睦邻政策的保证。上任后刚过一个月，他在泛美联盟发表讲话时强调说，美国致力于谋求平等、合作和不干涉别国内政。

一些批评者根据事后的认识对罗斯福处理经济会议的做法加以挑剔。他们说，由于通过通货膨胀提高国内价格的前景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就无形中加速了走向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也许是如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总统力拒把价格稳定在人为的低水平是“极为正确的”。罗斯福并不怀疑自己在“新政”实施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声称：“这是我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罗斯福的行动是否正确，现在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果断措施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过了不久，罗斯福的对手们气忿地说，他不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发现，跟随这位罗斯福前进就像当年跟随西奥多·罗斯福冲上圣胡安山一样令人振奋。美国人民和总统建立了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他辞世。

第十八章 一往无前

1933年至193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96亿美元上升到568亿美元；国民收入也迅速上升；失业人数已经减少，农产品价格已经上涨，工业生产日益上升，银行的储户已不再担心存款的安全了……这些伟大的成果足以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其卓越的才能把不同观点的男男女女团结在一起，赢得了他们的忠诚。美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朝着“新政”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成立一个政府。在旧的智囊团解散之后，一些聪明能干的青年律师和大学教师就在执行各项新政立法的政府机构里任职。经济不景气使他们无法进入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名牌大学之门。现在时机业已成熟，他们于是涌向华盛顿市。这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是亚当·史密学派的保守分子，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者。他们起草了绝大部分的新政法案，并在各个部门中贯彻执行。他们当中没有什么人同总统有私人接触，不过当时在农业调整管理局工作的青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思回忆说：“他像巨人一样坐在办公桌后，洋洋得意地叼着香烟，谈论着你的工作多么重要和他对你的成果多么赞赏。”

这些新政执行者看不起那些由于不能应付大萧条而声名狼藉的银行家和大企业家，他们改变了企业和政府间的通常关系。权力已经从华尔街那些四壁镶板的董事会会议室转移到突然在整个华盛顿到处出现的家具陈旧的办公室。这些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同前一代的进步分子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他们冷酷无情，骄傲自大，玩世不恭。他们都认为，改革意味着实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变革——就是重新分配全国的财富。他们采纳了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地超道德规范。他们都认为这是总统的做法。哈里·霍普金斯同一些助手谈话时最恰当地概述了这种规范：“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们不怕在法律范畴内探讨任何问题。不论你想做什么事，我们的律师都能宣布它是合法的。”

全国复兴总署署长约翰逊甚至在被任命之前就开始起草管理工资、工时、物价和公平竞争的法规了。本来他的主要着眼点是钢铁、汽车、纺织、采煤和建筑这些大工业，希望对全国复兴总署能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低估了这些法规受人欢迎的程度。几乎每种工业都要求有它自己的法规。在全国复兴总署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约翰逊收到了制订260多项不同法规的请求。他们为棉纺工业制订了第一项法规，已准备于6月27日由总统签署。这项法规稳定了生产，确定了价格，规定了统一工资和工时，不准纺织厂雇用童工，从而结束了长期残酷竞争和剥削工人的历史。罗斯福在谈到对童工的限制时说，“在我到华盛顿以后所处理的事情中这件事最使我感到高兴了。”

新政的执行者们曾嘲笑赫伯特·胡佛依赖规劝的做法，但是约翰逊却发动了一场大力支持全国复兴总署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使以前的任何这类运动相形见绌。几乎每个社区都举办汽车列队游行、群众集会等活动。纽约市的活动规模最大，那里有25万多人打着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蓝鹰旗在第五大街游行，还有150万人观看喝彩。报纸的报头、商店橱窗的广告和电影明星的后背，到处都出现了蓝鹰。甚至胡佛也同意了它的原则，但是他还没有断定它有法西斯的味道。在舆论的影响下，一直抵制全国复兴总署法规的大工业也跟着行动起来了。一天，约翰逊跑进白宫，将三项法规交给总统签署，

然后就奔跑出去赶飞机，罗斯福冷冰冰地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见到他了。”9月间约翰宣布，已有将近300万工人重新就业。平均工资已从每小时42美分上升到52美分。批准的法规约计有550项，其中包括为瓶盖厂、奶罩厂和其他工厂制定的法规。

尽管如此，蓝鹰高飞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正如埃利斯·W·霍利在《新政与垄断问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全国复兴总署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面临的困境。他们有必要采取手段来满足对建立工业秩序的要求，而同时又保持美国的民主传统。全国复兴总署试图使商业、工业、劳工和消费者结成一种不稳定的联盟，从而使人人受益。约翰逊的宣传运动掩盖了使他们分裂的严重分歧。在这种欣喜的心情逐渐消失后，他们之间展开了斗争。

工会指责说，它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它还声称，全国复兴总署偏袒资方。尽管如此，在美国联合煤矿工人工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的带领下，他们成立了工业组织委员会，并宣称“罗斯福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他们开始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牌同业工会所忽视的批量生产工业内的不熟练工人组织起来。企业界予以反击，对组织者使用强硬策略，恫吓工人，开始成立公司联合会。劳资斗争的战线拉开了，美国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阵阵的暴力行动。

全国复兴总署在约翰逊的飘忽不定的领导下有崩溃危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罗斯福的耳鼓里，助手们也建议他撤掉这个将军，“但是他的心肠太软，不能把他撤职”，不太同情的目击者伊克斯说。“约翰逊坚决不走……并为继续呆下去而和总统仔细研究了各种戏剧性的行动。”约翰逊终于在1934年9月递交了一份辞呈，像一台狂怒的风车似的飞出政府，在报业辛迪加的一个专栏上发表文章，痛骂他以前的同事。全国复兴总署又勉强维持了九个月，一直到最高法院一致判定它违反宪法为止。

按照大部分衡量标准，全国复兴总署已宣告失败，而且在未留下体制痕迹的情况下消失了。它缺乏一贯性，代表政府批准了许多互相脱节和互不协调的垄断性协议，同时又在口头上表示决心遵守竞争的道德标准。即令是控制500多种行业，约翰逊都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长。若是没有伊克斯的大力合作，就拿不出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他们若是调换一下职务，全国复兴总署就会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伊克斯慎重地制订各项法规，如果约翰逊把钱慷慨地花在公共工程上，那么就有可能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1933年7月下旬的一天，得克萨斯州棉花农场主威廉·E·莫里斯同该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一道应邀去白宫觐见罗斯福总统。通过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林登·E·约翰逊想出的一些办法，农场主莫里斯依照政府关于减少剩余农产品计划头一个毁掉他一部分棉花作物。总统向莫里斯递交了一张517美元的支票，作为他毁掉47英亩农作物的“调整报偿”，当时周围挤满了摄影记者。

这个仪式标志着一项旨在挽救美国农业的激进策略的肇始。根据农业调整法的条款，农场主减少耕种面积可获得补偿。如果农场主有剩余的农产品，政府则可提供津贴以保证农场主的最低价格，而这种津贴可通过向面粉厂主和罐头厂主征税来筹集。由于已错失良机，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农业调整管理局局长乔治·皮克派人去说明棉花农场主将约计1000万英亩的棉花毁掉1/4，并且把大约600万头母猪和猪仔全部买下来，藉以防止市场出现供应过剩。

在人民挨饿的时候屠宰幼猪和销毁农作物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报纸上刊登了中西部的牲畜围场挤满了尖叫的幼猪的照片，结果使华莱士和皮克受到一连串的攻击，农业调整管理局也遭到公众的仇视，从此以后它的声名狼藉。人们谴责新政农业政策试图在富裕之时以消灭富裕来消灭贫困。

华莱士披头散发，露出一副害羞和踌躇的表情，看上去活像衣阿华的自耕农。舍伍德·安德森在估量他说：“他没有臭架子了。”在执行新政的华盛顿的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华莱士是一位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既像农场主，又像科学家，又像社会哲学家，这一切都被一种含糊的朦胧的神秘主义掩盖了。华莱士进行的实验培育出一种高产杂交玉米，这突出地表明了他的实用的一面。他认为，通过政府计划和对农作物的控制，能够建立一个“永久的粮仓”，从而打破美国农业中出现的时而丰收时而歉收的周期。

与此同时，罗斯福用操纵黄金价格的办法来抬高农产品价格——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沃伦早就敦促罗斯福采取这项合理化建议。沃伦声称，如果政府大量收购新开采的黄金并且经常小幅度提价，美元就会贬值，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正统经济学家们无视沃伦的理论，但是它给予罗斯福一个行动的机会。他在给威尔·伍丁写信时说：“我们都熟悉美国的形势。我希望，我们的银行界和经济界的朋友会从债务人阶级（也就是90%的美国人）的观点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而少从构成债权人阶级的百分之十的美丽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收购黄金的计划震动了整个金融界。商会谴责这个“货币试验”。艾尔·史密斯也随声附和。他说：“我主张积累经验，而不赞成进行试验。”他认为这是“骗人的美元”。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蜜月已经结束，罗斯福在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总结了他对银行家们的不满：“我们俩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从安德鲁·杰克逊时期以来，居于较大中心的金融界分子一直把持着政府，我这样说并不打算把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完全排斥在外。杰克逊同美国银行的斗争正在重演，只是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罢了。”在财政部长手下任职的迪安·G·艾奇逊对总统说。根据法律和哲学上的理由，他反对这项计划，总统要他辞职。伍丁也宣告辞职，主要原因是身体欠佳，尽管他也不赞成收购黄金的计划。

结果，沃伦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其他试验，其中包括使美元贬值和抬高银价。后来复苏的速度再次加快，但这是各种新政计划向经济领域注入资金和周期性自然复苏的结果，而不是操纵黄金价格的结果。不管是何种原因，罗斯福感到欢欣鼓舞。他宣称：“我们的困难明天还不能全部克服，不过我们在前进。”

在随后的两年里，“黑色风暴”更严重了。落后的耕种方式破坏了覆盖在大草原的保护性草皮（从加拿大边界延伸到得克萨斯锅柄地区）。堪萨斯和南、北达科他州栽种小麦的高地久旱无雨，太阳把表土层烤成黄褐色的硬渣，随后又被干热风刮走，土被刮走之后，人也跟着走了。约翰·斯坦贝克在他写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流动农业工人向西部迁徙、寻求新生活的情景。他们用破旧不堪的汽车装载着家眷和家具，沿着第66号公路向加利福尼亚驶去。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人受到了新的奴役，在果园和莴苣农场当农业季节工人。剩下的人就像风滚草一样被地方当局驱使着不断迁移。

罗斯福坚决主张建设一个农业社会，他认为，成立安置管理局是扭转人

口流入城市的趋势又是恢复杰斐逊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的理想的一个尝试。有前途的农业家庭得到了贷款，便可购买小农场并为小农场添置设备，或者用以偿还现有的债务和提高他们的地位。专家们教导他们如何从耕地中取得可观的收成，如何使用新设备和充分利用资金。许多贫困的农民，索性离开得不偿失的薄地，在土质较好的地方重新定居，大约有 1000 万英亩贫瘠的土地收归国有，以便改成森林或牧场。

然而，特格韦尔却从比较复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足维持生活的耕作，而是商业耕作能扭转美国农业中存在的人员和农场减少的现象。农场主要富起来，就得把实现工业革命化的技术革新应用于耕种土地。这需要大面积的耕地、机器和集中管理——这和总统所设想的小规模耕作是互相矛盾的。特格韦尔进行了合作村试验。在合作村，农场主联合起来购买共同使用的设备，成立食品及日用品商店，在专家的指导下出售他们的农产品。保守分子指责说，在雷克斯的控制下，美国农场主正像俄国农民一样实现集体化。特格韦尔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在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修建的三个“绿化地带”城镇——离上班的地方近，但是不受城市污染的花园郊区。“我的想法是，就在人口中心外面建设，购买廉价土地，修建一个居住区，引诱人们迁入居住区”，他说。“然后再回到城市，拆掉所有贫民窟，把它们建成公园”。

1937 年，国会通过了班克黑德—琼斯农场佃户法，以便帮助佃户和农场工人成为土地拥有者，并且取消了特格韦尔领导的机构。安置管理局被农场保险署所取代。农场保险署提供购买家庭农场用的低息长期押款，为复兴项目提供少量贷款，并为农业季节工人修建清洁的、管理妥善的劳工营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场保险署对白人和黑人一视同仁。但保守分子使这个机构一直资金不足，它在解决农村贫困方面只取得了较小的进展。

一天，联邦紧急救济署的一名助手拿着一份安排失业者就业的计划走到哈里·霍普金斯跟前说：“从长远利益来看，这项计划肯定会成功。人民不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每天都得吃饭……”，非常恼怒的霍普金斯厉声说：“他们每天都得吃饭。”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总结了霍普金斯的基本哲学；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不要苦闷地思索。由于失业人数已多达 1500 万，这种果断的做法很受罗斯福赏识。霍普金斯已经拿到五亿美元，可直接拨给各州和地方机构，用以帮助失业者和贫民。他甚至没等有了办公室就开始办公了。他在复兴金融公司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摆了一张办公桌，四周堆着包装箱，经常是雪茄烟雾弥漫，空气混浊。就在那里，他像美第奇王子一样任意发放资金。

罗斯福相信最终会实现预算平衡，并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在全国复兴总署、农业调整管理局和哈罗德·伊克斯的公共工程局（拥有 33 亿美元资金）开始复苏之前，联邦紧急救济署是一个解决失业问题的临时机构。但是，霍普金斯对使失业者都重新就业的前景并不那么有把握。现代技术造成了一个约有 700 万人的永久性底层社会。他认为，甚至在经济复苏之后，这些人都有可能继续失业，而政府必须为这批被抛弃者提供救济。但是霍普金斯蔑视施舍的主张，认为这样做会摧毁人类的灵魂。他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工作救济。这样，接受救济者就会从事生产并能保持他们的

自尊心。霍普金斯要求迅速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几乎立即使他同哈罗德·伊克斯发生冲突。伊克斯发放资金时行动缓慢而又慎重并保证资金花费在正当用途上，但是这却激怒了霍普金斯。他认为，伊克斯的办法带有共和党提倡的“向下点滴”的陈旧理论的味道。而他赞成一种“向上点滴”的理论：立即把钱发给人民，他们会合理使用这笔钱，并能及时找到适当的工作，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

罗斯福当时想实现预算平衡，这是他经常出现的想法。工会工人强烈反对政府创造的就业机会，因为这同工会工人形成了竞争。1933年10月底，霍普金斯在堪萨斯城和救济工作负责人开会时接到一位助手打来的电话。研究人员于是发现了工会工人的最初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的一篇讲话，他曾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求制订的正是这样一项计划。霍普金斯知道罗斯福喜欢按历史先例办事，现在他既然能够平息劳工对他制定的计划的反对行动，因此渴望同总统见面。

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共进午餐时，罗斯福问霍普金斯需要安置多少人就业。

“约莫400万，”他回答说。

“让我们考虑一下，”罗斯福一边思索一边说。“400万人——那意味着大约要拨出四亿美元。”

罗斯福认识到，国会不同意拨款，只有仰赖其他部门拨出这笔资金，他决定把公共工程局未用完的资金转拨给新设立的民用工程局。1933年11月15日，霍普金斯答应在圣诞节前给400万人安排就业，结果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到1934年1月18日，大约有430万人被安排就业，较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更多。到1934年初，有2000万美国人依赖各种形式的联邦救济物资来维持生活。在旱灾严重的南达科他州，1/3的人靠政府救济金来维持生活。

霍普金斯在寒冬到来之前急急忙忙地制定了一些工程计划。绝大部分工程计划所提供的是土木工作或类似的工作。一些工程计划是临时凑合的，细小而无多大价值的工作多得不胜枚举。一支100人的队伍在华盛顿市区的大街上巡逻，用拴着长线的玩具气球吓走在政府建筑物的遮阳下栖息的欧椋鸟。但是真正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民用工程局的工人修筑了大约50万英里的公路，兴建或翻修了40000所学校，大约50000万名教师找到了工作。他们约计修建了500个新机场，改建了大约500个机场。他们还修整了街道，清理了下水道并清除了公园的下层林丛。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处于绝望的几百万美国公民找到了工作。

霍普金斯希望能延长民用工程局的寿命，但是罗斯福对预算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保守分子提出的关于恣意挥霍的指责感到不安，因此命令民用工程局随着气候的好转逐渐停止活动。这类帮助原来只是作为应急措施，他担心会造成一个永久依赖救济为生的阶级。“我们不能把民用工程局维持到夏末”，罗斯福宣称，“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对民用工程局加以限制，人民都认为情况会好转起来。”

霍普金斯抑制住内心的失望，忠实地继续通过联邦紧急救济署发放救济物资。每月的家庭津贴从15美元增加到35美元，虽然还不够用，但却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和购买力。在1934年，他根据自己在民用工程局积累的经验着手制定一项联邦工程计划以替代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工作。这样一项建议的前

景取决于选民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是赞成“新政”抑或是否定“新政”。

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为即将来临的竞选定下了基调。他回顾了第七十三届国会的成就和新政的成就，使这次选举成为对他的政府的一次公民表决。“你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他问道，“你们的债务负担减轻了吗？你们的银行存款安全吗？你们的工作条件有些改善吗？你们对自己前途的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

在白宫的第二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经常对全国形势进行估量。总统在为美国人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全面变化奠定基础之后，便注意倾听吉姆·法利和副总统加纳的意见，决定给全国以喘气时间。虽然他对早期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是除了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批准科德尔·赫尔的互惠贸易协定法以外，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计划。“新政”是带着巨大的成就交给选民表决的。失业人数逐渐减少，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国民收入也与岁俱增。但是，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救济措施不足以满足贫穷民众的需要，大约1000万美国人还没有工作，除田纳西水利局以外，改革几乎完全是在银行和金融界进行的。人们已经没有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感觉了。

银行家和企业家在新政的帮助下恢复活力之后指责说，罗斯福和追随他的激进分子在摧残这个国家。紧急救济的开支大大增加了公债，他们为美国的偿付能力担心。他们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统一管理的趋势感到惊恐不安，谴责总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法西斯专政。

从传统上说，凡是入主白宫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都丢掉它在国会的一些席位。法利和豪对选举结果极度不满。他们认识到，这次选举会被视为“新政”是否成功的晴雨表，因此敦促罗斯福参加竞选。但是罗斯福为了树立一种无党派偏见的形象，决定不介入竞选。他总是认为，出海旅行是医治百病的灵药。他用夏天的部分时间乘坐“休斯敦号”轮船出海旅行，从加勒比海经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然后到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行程14000英里。“一路上受到盛大的欢迎”。总统对加纳说，“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就人民跟随我们前进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强大，也许比以前更加强大”。

然而，跟随罗斯福走的人究竟有多少，还有待于统计，他能把自己个人的名望转让给民主党候选人吗？法利本来对“新政”受到企业界的攻击感到担心，但是亲眼看到从全国各地发给全国总部的秘密报告之后又感到鼓舞。选举前不久，他作出了罗斯福认为是过分乐观的预言。法利说，民主党人不仅会保住他们在众议院的原有席位，而且在竞选的35个参议院席中，至少会获得26个席位，其中包括共和党的堡垒宾夕法尼亚的席位。

结果证明，他的预言过分慎重了。法利有关在参议院大获全胜的预言已成为现实（其中包括在宾夕法尼亚的竞选胜利以及哈里·杜鲁门的当选），但在众议院增加了9个席位，新的参议院将有69名民主党议员，25名共和党议员。在众议院，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民主党议员占322名，共和党议员占103名。民主党人在地方和州的竞选中也大获全胜，只有7名共和党人当选为州长。

这次民主党大获全胜被普遍认为是对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的大力支持。威廉·艾伦·怀特宣称：“民众几乎把他立为国王。”

第十九章 罗斯福画像

罗斯福把他自己比作橄榄球四分卫，他知道下一步比赛该怎么进行，但是不能再为后面的比赛制定方案，因为后面的比赛将取决下一步比赛的进展情况。

罗斯福的思想基础是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传统。虽然他不像前者那样才华横溢，也没有后者那股道义上的热情，但是他使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确信，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是取代右的或左的极权主义的可行办法。

“新政”反映了罗斯福总统对理论思考的厌烦情绪。虽然它标志着美国改革的顶点，并使美国的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持续不断的影响，但是关于它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地位，至今仍争论不休。它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是历史上几次成功的渐进主义革命之一，它把权力集中在国家政府手中，特别是集中在总统手中。美国从一个由个人主义者组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关心社会的大家庭，接受了福利国家和计划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方针就在于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新政是天真、人道主义、注重实践和愿意用社会和经济试验冒险的混合物。罗斯福从来不是一名理论家，他的脑子里可以同时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他被扣上了种种帽子，有人说他是资本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保守分子指责说，他在执行1932年社会党的纲领——这种指责使诺曼·托马斯大发雷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轻蔑地说：“罗斯福除非坐在担架上执行社会党的纲领，否则就无力执行。”雷克斯·特格韦尔说：“总统勉强地采取了赤字开支，每走一步路他都加以抵制——哈里·霍普金斯、伊克斯和许多新政执行者都能证实这一点。”

作为革新者和保护者，罗斯福发给美国人民一副新牌，而他自己却使用那副旧牌。1934年，他说：“新政……谋求使社会、富人和穷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结成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志愿兄弟会，为维护共同利益并肩奋斗。”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他强调了新政的保守主义。1936年他在竞选时宣称：“在私人获得裨益和自由企业制度被拖到崩溃边缘之后，正是本届政府挽救了这种制度。”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渴望实现预算平衡，他引以自豪的是，他已把普通政府活动费用控制在最低水平。他承认，由于一项平行的应急预算，扶贫济困的开支很大，但只是为了防止人民挨饿才采取了这种措施。罗斯福不想造成一支长期领取救济金的大军，他冀望使情况恢复正常，这导致了1938年的经济衰退，几乎抹掉新政的成就。

罗斯福对当代传记作者埃米尔·路德维格说，他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社会制度。他说“文明就像一棵出现枯枝烂叶的树一样”，激进分子说：“把它砍倒。”保守分子说：“不要动它。”开明分子采取折衷的办法：“让我们把它修剪一下，这样我们既不会失去老树干，也不会失去新枝。”

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使得罗斯福不得不超越中产阶级改革主义的范围，在陌生的领域实行改革。他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没有时间或者也不想被城市政治机器和托拉斯这些老恶魔分散精力。进步主义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确保市场上的竞争并且保护农民和小企业家，而新政却利用政府权力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正如卡尔·德格勒说的那样，在罗斯福领导下，联邦政府“成了社会上一支刚健而精悍的力量，给予社会以活力；如果有必

要，在普及福利要求时取代私人企业”。

新政是为应付一种紧急状态而制订的，它的执行者和罗斯福本人一样，拒绝教条主义的做法，因此它的发展格局既不清楚，也没有系统。尽管如此，它并非毫无原则的，罗斯福在他生涯的早期就对美国的政治逐渐地形成一种看法，后来他从来没有背离这种比较完整的看法。他把自己视为近代的杰斐逊，肩负的任务是极力维护美国的民主，防止汉密尔顿分子为他们的自私目的而控制政府。由于有这种观点，他对人们暂时的怀疑并不感到忧虑。

罗斯福在执政的第一天，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他召见了白宫首席守门人帕特里克·麦克纳。麦克纳刚一进门，总统就前去迎接，亲切地称他为“帕特”。他几乎晕了过去。他在白宫工作大约30年了，还是头一次听到总统称他为“帕特”。在一个星期内，罗斯福对白宫所有工作人员——秘书、办事员和服务员——统统称呼其教名或绰号。他们大家都觉得总统待人很亲切。

最初，总统给他的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之一是：如果遇到困难户给白宫打电话请求帮助，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罗斯福说，若是有人陷入绝望而给总统打电话，那就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想办法给予帮助。白宫多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有的是土地赎回权眼看要被取消的农民打来的，有的是即将失去住宅的住户打来的，罗斯福夫人亲自接过一些这样的电话，通常她总是能想出办法减少一些繁琐手续，为他们提供援助。

在白宫长期居住的人除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外，还有路易斯·豪和利汉德小姐。路易斯·豪感到，住在林肯厅“就像豆荚里的一粒豌豆一样”，空空荡荡，后来他把床搬到附近的一间化妆室里；利汉德住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安娜·罗斯福·多尔和她的两个小孩安娜·埃莉诺和柯蒂斯也长期住在白宫里。人人都把安娜·埃莉诺和柯蒂斯称为西斯蒂和巴齐。安娜结婚六年之后开始同丈夫柯蒂斯·B·多尔分居。1932年竞选期间，她爱上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伯蒂格。埃莉诺·罗斯福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起了促进作用。她很喜欢伯蒂格，说他是和她有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的人。多年以后，安娜和约翰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谈他双亲的爱情时写道，这种爱情也许使埃莉诺看到了她曾幻想和十分向往但又从未变成现实的那种亲密关系。安娜和约翰·伯蒂格都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伯蒂格离开了《论坛报》，1935年他们结婚了。《论坛报》后来已成为新闻界对总统批评最强烈的刊物了。

白宫里的房屋严重失修，破落不堪。埃莉诺从达切斯县雇来的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发现古旧的厨房到处都是蟑螂，并且抱怨说，她无法保持公用房间的清洁。在罗斯福搬进去之前，白宫没有图书馆。一名守门人兼任总统的理发师。罗斯福夫妇在白宫居住的12年中，二楼居住区看上去同海德公园的房子一样，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极不雅观。墙上挂着全家合影、孩子们和孙儿孙女的照片和海军的图片，此外，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和军舰模型。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书籍和杂志，有些是过期几个月的杂志。家具不太精致，其中一些是罗斯福家中的。有几件家具，其中有总统的床，是在维尔—基尔家具店定做的。埃莉诺把她祖父老西奥多·罗斯福的画像挂在门罗厅，门罗厅成了罗斯福家的起居室。本来她打算把她祖父的画像留在第六十五街房子里，后由于那座房子要出租，她丈夫坚持己见地说：“你不能把你祖

后来，柯蒂斯·罗斯福·多尔去掉了他最后的名字多尔，所以他现在叫柯蒂斯·罗斯福。

父租出去，让我们把他带走吧。”

在白宫二楼，既豪华而又均匀的椭圆形客厅成了总统的书房。墙上挂满了他个人收藏的海景画和海军图片，壁炉台上放着一个驱逐舰模型。其中一幅画的题目是“五月花号归来”，描绘了1917年第一批美国军舰到达欧洲水域的情景。它使人们想起他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日子。门上面挂着埃莉诺小时候的一幅画像，她披着一头自然卷曲的淡发，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身米色的皮肤。有一天，罗斯福看见弗朗西丝·珀金斯仔细地观看那幅画像。“我始终喜欢埃莉诺的这幅画像”，他说。“……这才是埃莉诺的真实写照，你知道，可爱的头发，美丽的眼睛。”书房里有两张写字台，一张是按杰斐逊的旋转写字台复制的，另一张是用“决心号”的橡木做的，上面有精致的雕刻。“决心号”是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用过的一艘船。

书房和总统的卧室之间有一扇门相连，总统卧室的陈设非常朴素。除床铺以外，主要的家具还有一个笨重的衣柜（白宫里没有壁橱）、一把摇椅和一张床头桌。床头桌上堆放着几本书、一本用旧的祈祷书、几支铅笔头、便笺、阿斯匹林、滴鼻药水、一杯水、香烟、烟灰缸和两部电话。在维多利亚式的大理石壁炉上放着罗斯福收藏的小猪模型，后面摆着全家和朋友们的照片。门上方挂着他父亲的有名的跑马格洛斯特的尾巴。

通常总统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在他早晨喝咖啡和吸第一支香烟之前，精神通常不饱满。著名的烟嘴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因为他的齿龈一触即痛，烟嘴上装了一个软头。他一边在床上吃早饭，一边浏览早报：《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和《先驱报》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沃尔特·李普曼和弗兰克·肯特这类专栏作家和报纸社论特别使他感兴趣。路易斯·豪还给他提供全国各地报纸的评论摘要，后来被称为《每日号声》。冬天为了御寒，他在睡衣上披上一件旧的灰色套衫，而不穿晨衣，因为这件套衫穿脱更方便。罗斯福纵容自己的孙儿孙女打断他早晨的活动。住在附近的套间里的埃莉诺有时不得不为他解围。一天早晨，她听到丈夫的卧室里传来喊叫声和呼救声，过去一看，两个小女孩正在他床上蹦蹦跳跳，叫喊着：“他是我爷爷！”“不，他不是你爷爷，他是我爷爷！”受到骚扰的总统正在设法用一只手保护他的早餐托盘，一只手拿着电话。“哈基，请等一等，”他绝望地告诉接线员，“我现在不能同巴黎对话”。

如果是星期二或星期五，厄尔利总是要谈谈总统很有可能在记者招待会上遇到的问题。平常总统审阅文件一直到大约十点半，然后乘电梯下楼前往西厅办公室。总统每隔十五分钟接待一批来访者，但是由于他喜欢谈话，也喜欢和陌生人见面，他总是要延长谈话时间。有时总统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来访者插不了几句话。他讲起话来就像一个人在解冻后站着一块块浮冰过河一样，一会儿谈这个问题，一会儿又谈另一个问题。众议员克劳德·佩珀当时是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他回顾了为一个最得意的项目前往白宫呼吁的情况。总统已经料到佩珀的来意，在整个谈话当中却没完没了地谈起他夫人的亲戚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事情。“在我的项目方面，我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佩珀回顾说，“但是在华盛顿，我是最了解罗伯特·利文斯顿的人了。”

助手们总是为大事四处奔走。史汀生曾经担任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即将担任罗斯福的陆军部长。他对一位朋友说，他对罗斯福不怕打扰仍能“把握问题的核心”感到惊愕。“他能够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作出决定并加以贯彻”。总统不喜欢冗长的备忘录，在有人向他提出简化备忘录时，他就

说，“把它压缩为一页”。尽管他善于交际并用一半时间打电话，他仍同很多人保持信件来往，有时他在信件末尾亲自写上几句话。譬如，在圣诞节，他一面打开别人送来的礼物，一面口授感谢信。

下午1点钟，总统在办公桌上吃午饭，通常和客人一起吃午饭，他的午饭可能有清汤或蛤肉、一块排骨或可口的烤鳟鱼。总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午饭不吃最后一道甜食。他吃饭时仍然滔滔不绝地谈话。但是，例如雷克斯·特格韦尔就想出了对付这种情况的方法。他总是吃了午饭后才进白宫的，在总统满口是饭的时候，他提出自己的见解。罗斯福不能站立起来在办公室内踱步，只得不时地提提问题，闲聊天或讲故事。同他密切交往的风险之一是不得不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他常常在重讲故事时添油加醋。一些助手听到他把这些故事讲了几十遍。

有一天，伊克斯突然说：“你是个好人，但你也是一个最难合作的人之一。”

总统回答说：“因为我有时太严厉吗？”

“不是，你从来不是太严厉，你对忠于你和你完全确信忠于你的人，也不说实话，你把牌紧紧地贴在怀里。”

“复杂”和“难以捉摸”是经常用来形容罗斯福的字眼。从表面上看他是最善于交际的人，然而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描述苏联那样，他仍然是一个谜中之谜。罗斯福富有魅力的部分原因是“他的性格就像棱镜一样；从一个角度看，他折射一种颜色；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颜色变了。”威廉·菲利普斯说：“要描绘罗斯福，你得描绘三四个人，因为他至少有三四种性格。他的性格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你常常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或者跟哪人谈话。”菲利普斯已当上副国务卿，从威尔逊时期就一直是罗斯福的朋友。弗朗西丝·珀金斯认为，罗斯福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复杂的人”。亨利·摩根索是罗斯福的一个老朋友，他说，罗斯福是“非常难以描绘的一个人……他的心情和动机非常复杂，令人迷惑不解。”

罗斯福对于自己那不可思议的性格对他人起的作用感到很满意。可能除路易斯·豪而外，他不准任何人穿透他那贵族气派的冷漠的盔甲。有一次，他告诉摩根索：“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干什么。”

“我是哪只手，总统先生？”他的老朋友问道。

“你是我的右手”，罗斯福回答，“但是我把左手放在桌子底下。”

摩根索认为，这是“我所听到的真正的罗斯福的坦率的表白，也是他的真正的工作方法”。

政治斗争增强了罗斯福在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内所养成的不露锋芒的习惯——首先是防止自己受母亲的支配，其次是防止受格罗顿和哈佛的轻蔑。在他的青年时代，一些人曾拿他取笑，说他是一名智力远远不够的“印第安人”。他被视为和蔼可亲的乡下贵族。在白宫，那些很早就同他相识的人发现，他们所熟悉的这位目空一切的人物同上任后一百天里的这位干劲十足的总统几乎是判若两人。《民族》周刊的主编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说：“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当中许多很早就熟识他的人都问他是不是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并不是奇迹。行使权力和来自责任的压力显示出他所固有的掌权的雄心和意志。罗斯福的朋友们一直认为不值得去探索他的雄鹰童子军的快活性格和常青藤联合会的学生胆怯心理的根源，他们若是进行这样的探索，就会发现罗斯福热衷于政治，他用成年的大部分时间研究过政治及其实践。在那

些年代里，他养成了敏锐的头脑，使他能够对美国人民的想法作出敏锐的估计。虽然他由于身体残废和所处的地位不能同美国人民同甘共苦，但是他具有能够想象人们的兴奋、挫折和需求的的天资。若是他像对政治那样对法律或商业也给予很大注意，他肯定会在其中一个领域同样地赫赫有名。然而，罗斯福的经历和行为准则使他不便公开表示他正为掌握政治作出认真的努力。

艾赛亚·伯林爵士认为，罗斯福属于像赫尔岑·米拉波以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这类贵族改革者之列。“他们心胸开阔，慷慨大方，而且首先是表现出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明智的开朗性格”，他宣称，“与此同时，他们在理智上支持一切即将出现的进步的、反抗的、新生的和未经试验的事物……”在许多方面，罗斯福同本杰明·迪斯雷利相似。他们都是贵族——罗斯福出身于贵族家庭，迪斯雷利靠个人奋斗成了贵族，他们都为改革而斗争。他们都具备演员的天资，并给政治带来色彩和刺激。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原则，倒不如说是对政治斗争的无限热情。他们都喜欢权力，为取得和利用权力而巧妙地施展手法。他们都被攻击为装腔作势的人，他们既受到人们的敬仰，又受到人们的憎恨。最重要的是，这位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明白，政治手腕的高峰是打着遵守不可改变的原则的幌子掩盖政策的变化。

罗斯福进入白宫意味着“新政”的开始，这不仅对国家来说是这样，对新闻界来说也是这样。他一当上总统，就宣布要改变沃伦·哈定定下的书面提问的规矩。但是未经他许可，不准任何人直接引用他的话，罗斯福和新闻界的关系与赫伯特·胡佛和新闻界的关系形成明显的对照。当萧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胡佛对来自社会人士批评的反应是不愿向新闻界提供消息，这使得来访记者的工作更加困难。罗斯福因为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并对记者的心理十分了解，所以很快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钦佩。就像他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关系那样，他很快就和经常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以教名相称，甚至喜欢和他们打打嘴仗。海伍德·布龙说，罗斯福“是个出色的报人”。

罗斯福与新闻界的良好关系在颇大程度上归功于史蒂夫·厄尔利。厄尔利就是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团中众所周知的人物，他敦促总统给记者们打开通向白宫的大门，不再采用书面形式提问，并要总统改变白宫的气氛，使记者们“作为君子受到欢迎，而不是作为间谍受到怀疑”。更重要的是，厄尔利知道怎样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万一他不知道，他也不怕去问总统。在为罗斯福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厄尔利也非常得力。他为总统准备有新闻价值的消息，向总统介绍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准备好答案。

罗斯福通常是诙谐幽默的。但他喜欢用锐利的语言对付批评他的人。有时，当记者想要从他嘴里得到消息时，他也会说些刻薄的话。他会说：“这是个未经确定的问题。”或者说“请不要盘问”。对行为越轨的人，他会说“戴上你的傻瓜纸帽，站到墙角上去”。罗斯福讨厌专栏作家。但有一次他批评专栏作家时，却讨了个没趣。代表新英格兰几家报纸的梅·克雷格说：“可是，总统先生，你家里也有一个作家啊！”这是指罗斯福夫人的每日专栏《我的一天》，这一说，引起了哄堂大笑。

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也像与新闻界的关系一样随便。实际上，内阁会议不起什么作用，因为罗斯福喜欢与个人或一小批人，特别是与各部门的领导人商量问题。内阁的作用在美国历史上始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它应该是个协商机构呢，或者仅仅是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乔治·华盛顿喜欢征求部长们

的意见，而后来的总统们都认为这些人太专业化，太注重他们本部门的业务，以至于未能提出带有普遍性的意见。但是，总统们都坚持设法利用内阁作为一个协商机构，罗斯福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的体会很快就与他的前任的体会一致，内阁会议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

罗斯福总是在全体内阁成员围着桌子坐定后才让人推着轮椅进入会议室，而且经常是一进会议室就开始讲话。有时他先讲一个他刚听来的故事，也偶尔一开始就谈他想商量的一个计划，接着，他就会转向高级官员、国务卿赫尔，兴致勃勃地问他：“科德尔，今天有什么想法？”赫尔讲完后，他会按次序让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所讨论的只是些普通的日常事务。因为经常泄密，罗斯福很少在内阁会议上谈论保密的事情。副总统加纳把消息透露给国会山上的老友。哈罗德·伊克斯在会上听到的消息也会出现在德鲁·皮尔逊撰写的政治闲话专栏里。

内阁会议多半被用来听取各个成员的报告，很少去讨论政策。1935年，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冷酷的事实是，我们都很少就重要事情发表意见。我们从来都没有畅所欲言地讨论政府政策或是政治战略问题。总统总是自行作出决定。就内阁而言，他未曾和顾问们商量……事实上，我从未想到要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政府中的重要问题。显然，其他阁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下午五点半到九点开饭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总统可以松口气。他在就任后不久修建起来的水池里游上一阵，有时也在那里处理事务。当他的远房堂弟尼古拉·罗斯福从匈牙利回国后，罗斯福在游泳池里和他一起嬉戏时听取他的汇报。接下来是按摩，稍打个盹，然后就是“孩子们的时间”了：在他的书房中喝鸡尾酒。他对自己调鸡尾酒的本领感到满意。他比较喜欢马丁尼酒或是用古旧方法调出来的鸡尾酒。他只喝两杯烈性酒。据说他有两种不同等级的杜松子酒。好的一种是用以款待他喜欢的客人的。总统在喝鸡尾酒时抽空出去喂喂自己心爱的苏格兰种犬——法拉，并教它学做各种动作。

有时他和家人在自己的餐厅里或在楼下的国宴厅里共进晚餐。在正式场合，总统在客人抵达之前已在桌旁就座了。晚餐后，客人就离开餐桌。罗斯福也放下餐巾，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罗斯福夫人经常邀请一些想与总统会晤的人共进晚餐。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也在白宫的餐桌上出现。一次，有位官员被安排在某位年轻妇女旁边就餐。她看上去非常紧张。那位官员问起她干什么工作，她回答说：“我是布鲁克林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营养学家。”

罗斯福夫妇二人对他们吃的东西都不太考究。有一次总统说他的消化能力和十头牛匹比——白宫的烹调也反映了这么一点。“普普通通”和“平平常常”这两个很客气的字眼是用来形容在内斯比特夫人指导下准备出来的菜单的。在白宫呆过一段时间的人说，他们一看饭桌上摆了什么菜就知道那天是礼拜几了。1937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应邀去白宫进餐。他形容吃的东西是“我所吃过的最不好吃的东西……我们喝了淡如雨水的汤，下一道菜是像胶皮一样难啃的鸡，用蔫了的菜做的沙拉，还有一块由慕名者送来的蛋糕。这个慕名者十分热情，但却没有什么手艺。”最后，连罗斯福也不满意了。当他招待显要客人的时候，他从外面请来一位厨师。在他母亲去世后，1941年，他从海德公园叫来一名厨师，安排在白宫三楼的家庭厨房中。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改变时间表以前，总统喜欢去看二楼宽敞的大厅里放映的电影，那儿几乎每天晚上都放映电影。他特别喜欢新闻片和米

老鼠动画片。他看了查理·卓别林演的《大独裁者》后非常高兴。他最喜欢的演员是默纳·洛伊和沃尔特·休斯顿。一次，凯瑟琳·赫伯思应邀到海德公园出席野餐。她从一个降落在赫德森河上的水上飞机上下来，涉水上岸，到斯普林伍德时光着一双脚，衣服还有点潮湿。他对她简直入迷了，亲自开车送她到瓦尔——基尔共进野餐。当他母亲也在看电影时，他会开玩笑似地说些有关电影中的女人体态多么迷人之类的粗话来逗乐她。如果她不喜欢那部影片，他的仆人就会扶他走进书房。他在书房中处理文件、报告，或是整理他收集的大量邮票。

国务院奉命将邮件上的罕见邮票送到他家里去。邮政部一出新邮票也总是先给他送来。他为新邮票提出主题，还抽时间去看设计，他自己甚至也设计了几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的一位官员建议盟军去占领一个美利坚感兴趣的岛屿。罗斯福说：“不，不是那个岛。不如占领那个岛附近的曼格里瓦岛。”这位新西兰人从来不熟悉这个岛的名称。罗斯福回答：“哦，这个岛在土阿莫土群岛，在邮政上属塔希提管辖。因为我集邮，我晓得这个地方。”

罗斯福通常在午夜前后上床睡觉，但在熄灯前，他常常要花个把小时和埃莉诺聊聊天。或者看看报告，或者阅读书刊。他在睡觉方面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他对一名助手说：“我醒着的时候，就不停地工作，尽力而为……该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

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了，罗斯福很想在温泉度个假，或者乘坐巡洋舰作一次长途旅行。但他总是回到海德公园，那是他的家，他向往的地方。他一向对这个地方抱着一种乡恋的感情。即使在他的儿女们都长大成人并各自独立生活后，这里还是他们带着子女来度暑假或其他假日的地方。特别是在圣诞节，总统常在炉火旁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夹杂着夸张的动作念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这成了一个传统的节目了。这时，小孩子们伸长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喜欢让来访的朋友们乘坐他的用手操纵的福特车去参观他的庄园。他会轻言细语地说：“多美啊，你看这有多美啊！”他在海德公园投票选举时，在职业栏上填写“林场主”，但是，在四次总统选举中，他只有一次在选民坚定支持共和党的达切斯县获胜。可是在温泉所在地，佐治亚州马里韦瑟县，他却能轻易地战胜对手。

萨拉·罗斯福活到 87 岁。她作为“总统的母亲”真使她由衷地高兴。在她的坚定的共和党朋友中，她是她儿子的个人啦啦队，从来不允许别人在她面前批评他一句。她平素很傲慢，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有她自己的看法。当有人问到奥伊斯特湾的罗斯福家族对海德公园这一支罗斯福家族的敌对情绪时，她说：“我想像不出他们敌对的起因，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仪表比他们体面些。”但是她一向看不惯那些到海德公园来访的政治家们。当总统招待休伊·朗的时候，她不满地问：“坐在我儿子旁边的那个面目可憎的人是谁？”她的儿媳带回家的一些客人也使他满不高兴。总统妈妈咕哝说：“这些客人是儿媳从哪里弄来的？”

罗斯福的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家里共有 17 桩婚事——使他的批评者有了不少的攻击材料。埃利奥特最令人头痛，他是最不听话的孩子，从格罗顿学校出来后，他就不想再上大学了。他和安娜一样，年龄还小就匆匆结婚

了。大概在他父亲第一次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他抛下定居在纽约的妻子和孩子，前往得克萨斯州，他在那里声明不仅要办离婚手续，而且马上又要和另一女人结婚。虽然在美国上层社会中，离婚的事情不是罕见的，但在总统的家庭成员中还是第一次。于是罗斯福的反对者就抓住了这一机会大做文章。虽然他和埃莉诺对孩子们的婚事感到很失望，但是他们并没有加以干涉。也许这是由于萨拉·罗斯福过去对他们的生活干涉得太多的缘故。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在谈到他们撒手不管孩子的婚事时说，“我也许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当有人向总统问到他孩子的问题是否已对他造成政治损害时，他回答道：“我相信应该用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来衡量一个政治家。”

埃莉诺说：“他们没有真正扎根于任何特定的家（他们一家人总是住在属于萨拉·罗斯福的住宅里），而谋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家，这就使他们这几个孩子更加需要迅速地自谋生计。”她又说，这些孩子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父亲的关怀，因为在他们成长时期，富兰克林忙于同小儿麻痹症作斗争，后来，他的时间花在政治上，并集中精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些孩子可能拿他们在会见爸爸前必须先约定时间这一点来开玩笑。但是罗斯福是作了各种努力来保持与家庭的密切关系的。他每月给他们写两次信，如果他们在华盛顿，他在晚饭前休息时，就与孩子们一同游戏。虽然他总是很热情、很亲切；但是，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放松警惕，不跟他们谈他内心深处的秘密。埃莉诺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孩子请爸爸就他自己的问题提些意见。总统在仔细听了以后，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说：“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我想听听你对这份文件的意见。”这个孩子对于受到这样的对待感到生气，他愤怒地对母亲说：“我永远不再找爸爸谈我个人的事情了。”

华盛顿的一位记者在《幸福》杂志上说，1933年6月的一个雾天，他在坎波贝洛与一个姑娘在森林中散步。

突然，在雾中不到五码远的地方，现出总统的福特牌轿车，总统的卫士、大个子格斯·杰内里奇靠着汽车轮子睡着了，汽车旁边是总统。他坐在树干上，两腿向前伸出来，双手捂着脸。突然，在他们移动之前，他双手放下，他的两眼凝视着几步之外的他们的眼睛，但却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就像一个人的脸端详着你，而由于一种闪光没有看到你一样；在他的口和前额上有一副怪相，就像一个人想看到他头脑中的某种东西，并感到十分痛苦。突然，他们可以看到他的双眼在凝视，而且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咔嚓一声关上一样，他的眼神又有了笑意，他喊道：“你好，比利，摘花吗？”他们转身离开那里。他们可以听到他们在他们后面的云杉林中哈哈大笑……

第二十章 官运亨通

大多数人把罗斯福总统在这次竞选中赢得的胜利比作某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如雪崩、狂风、海啸和地震等等。

除去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罗斯福在其余各州都取得了胜利。这个又一次当选的总统比兰登多得了 1100 万张选票。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多数。

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乡绅的化身，这个以农民的维护者和坦慕尼厅的反对者身份步入政界的政治活动家，这个本质上是劳工的守护神，已变成了穷苦大众崇拜的对象。他把劳工、黑人、城镇群众、学术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第二个百日来临了。

1935 年 5 月初，美国商会召开了全国大会，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指责“新政”。工商业者没有意识到罗斯福的目标是要拯救弊端丛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味盲目地攻击他的偏左言论，丝毫不注意他的实际行动。罗斯福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国际商用机械公司的托马斯·沃森说：“……在所有这些言论中，我认为没有一篇言论为平民、为老年人和失业者说一句话。”富人可能认为罗斯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可是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指出的，罗斯福觉得有理由认为是富人背叛了他。

罗斯福把国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交给他们一份“必须”通过的法案的清单，他用拳头砰砰地敲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国会必要时一夏天都得开会，直至通过这些法案为止。罗斯福要求通过的法案有社会保险法案、银行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另外他又增加了瓦格纳劳工法案和一项税收法案。随后，他丢开目瞪口呆的国会，兴致勃勃地去观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划船比赛。《时代》杂志说：“人人都能看到，这个令他感到不满的冬季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政府提出的这些适度的建议之所以较为容易被接受，社会保险法案之所以终于 1935 年 8 月 14 日获得通过，是因为议员担心拖下去势必导致批准更为激进的建议。全国 4800 万劳动力中约有一半人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老年人得到的救济金微乎其微，但是社会保险成为持续性的“新政”改革措施。政府第一次认识到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的社会权利。社会保险是把福利国家移植到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明年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我们要把它变成一场十字军远征。”1936 年 1 月 3 日，罗斯福以发表国情咨文开始了竞选连任的活动。为了大肆宣传起见，他在国会的一次晚间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国情咨文，这自 1917 年 4 月以来还是头一次——伍德罗·威尔逊当时在国会晚间联席会议上要求向德国宣战，罗斯福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不是对付外敌，而是对付本国“势力雄厚的一小撮人”和“声名狼藉的特殊利益集团”。他宣布：“我们已经引起斗争，我们已经招致盘根错节的贪婪势力的憎恨。”但是总统在发表这番挑战性讲话时没有要求进一步实行改革，罗斯福极力避免引起不满，强调决心削减拨款以实现预算平衡。

罗斯福对莫利说：“这场竞选中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我本人，美国人民要么支持我，要么反对我。”总统跟往常一样，切望投身到竞选中去，但 1936 年和以往不同，在 1/4 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他将第一次失去路易斯·豪

的帮助。路易斯·豪从进入白宫之日起健康情况就日益恶化，到1935年年初，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他那个充溢着香气和香烟味的房间里。他的眼窝凹陷得很深，脸上皱纹增多，呼吸更加困难了。由于通宵达旦不停地咳嗽，他心力衰竭，身体彻底垮了。在1936年4月18日逝世前不久的一天，路易斯·豪忧心忡忡地跟雇来给他念信读报的青年约翰·凯勒谈到秋天的竞选，谈到他多么希望参加竞选活动，凯勒要他放心：“你会去参加的。没有你，他们无法开展竞选活动。”

“不，我真不会去的”，路易斯·豪回答，“富兰克林现在能自立了。”

罗斯福同亲属和朋友们一起在海德公园，他在那里等待选举结果报告，而并没有到纽约市民主党总部去。总统轻松愉快，非常乐观。他和亲朋好友一起在书房里共进晚餐。美联社和合众社在那里安装了自动收发报机。罗斯福全神贯注地计算着一幅大图表上的数目字，定时通过专线电话同民主党总部联系。罗斯福的手下人向他报告说，他以15000票的优势在共和党盘据的纽黑文稳操胜券，罗斯福不信，要人再去核实一下，结果证实确乎如此。罗斯福仰靠在椅背上，朝天花板吐出了一个烟圈，兴奋地喊道：“哦，好极了！”共和党长期盘据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甚至兰登的堪萨斯州，一个接一个地归附过来了。过了不一会儿，罗斯福又回到书房里。汤米·科科伦拿出手风琴，正要领着大伙儿唱歌。

按选举人票计算，罗斯福和兰登是523票对8票，这是自门罗1820年胜利以来悬殊最大的一次选举。罗斯福同时还使民主党在国会取得了巨大多数。他认为，1936年的选举结果是一种授权，即是授予他实行改革的权力。选举结束后不久，乔治·克里尔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绝大多数人民的呼声代表全国的呼声。罗斯福认为，这种呼声所表明和强烈要求的是全国人民的意愿。”

第二十一章 经济衰退

1937年，似乎没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州不发生工潮。罢工、关厂，在纠察线和法院发生的斗争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全国……

在8月份，出现的猛烈抛售浪潮使股票市场受到很大冲击，农产品价格下跌，失业人数剧烈增加，过去两年的成就大部分付之东流。

1937年1月20日，朔风凛冽，天又下着雨，可是大群人仍冒雨聚在国会大厦前面，观看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次就职典礼。观众都躲在伞下避雨，从典礼台上望去，仿佛是一片黑蘑菇。当总统和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面对面地站在摊开的罗斯福家用《圣经》两侧的时候，他们之间充满着紧张气氛。为了怕被雨水淋湿，《圣经》蒙上了一层玻璃纸。观察家们注意到，在领读誓词过程中，当休斯念到“维护、保护和保卫”宪法这几个字时，他明显地加重了语气，罗斯福在跟着念这几个字时，也加重了语气。罗斯福后来对萨姆·罗森曼说，他当时真想高声喊道：“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问题，而不是你们最高法院用来阻碍进步和民主的那种宪法！”

人群中的新政派对罗斯福富有战斗精神的人道主义报以欢呼喝彩。两周前，罗斯福已向国会提出一项计划，要求通过工资工时法案和清理贫民区法案，改组政府行政部门，续订互惠贸易协定和建立几个地区性的类似田纳西水利局的机构。但是最高法院看来似乎是一心想破坏新政，他要怎样对付它呢？在审理的16项案件中，大法官们对11项作出了不利于行政当局的裁决，人们已表示担心，社会保险和瓦格纳法也会被宣判违宪。罗斯福在发表第二次宣誓就职演说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而是敦促美国人民“坚决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罗森曼留神观察了首席大法官听到这些话时的面部表情。他在离开时确信，休斯“懂得总统在念到‘每个’这两个字时加重了语气的用意。”

在过去两年里，罗斯福一直想到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他是美国第一位任职四年而未能亲自任命一名大法官的总统，这一点使他觉得很痛苦。他常常跟朋友和伙伴们谈论这个问题。有些人要他谨慎从事，他们之中有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艾休尔斯特参议员。他说，大法官们都年事已高，再过几年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因为随着大法官们的逝世和退休，最高法院会出现空缺，罗斯福可以用他的人来补缺。他预言：“命中注定由你任命的大法官要比华盛顿将军以后任何一任总统任命的都更多。”另一些人敢作敢为。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对总统说：“那些研究我国宪政制度和我国社会需要的学者，看到最高法院中多数盲目的、固执的大法官造成的这种僵局，都不会感到满意的。”这位教授接着说，司法部门的保守派显然在用他们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来维护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偏见。总统完全有理由要求用修改宪法的办法加以补救。

罗斯福说，实际上，最高法院对于收到的状书和上诉书有81%未予受理，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说：“联邦司法机构的人员不能胜任交给他们的工作。”他把这归咎于法官们“年事已高或体力不济”，可是仍一心想留在最高法院里。他接着说：“如果能不断地、有计划地补充年轻的血液，就能给法院增添活力，使它具备更好的条件，去认识和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和实际情况运用基本的司法概念。”

保守派政治家和报刊立刻对这项往法院里安插人员的计划给予抨击。赫伯特·胡佛盼望1940年的选举，希望届时能结束痛苦的游荡生活，重返白宫。他给罗斯福的反对者们提出一句口号：“不许碰最高法院！”股票市场价格下跌。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如弗吉尼亚州的卡特·格拉斯等人，指责这项计划不道德，是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如果罗斯福的建议成为法律，那就“会把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国家断送掉”。美国商会、自由联盟、美国革命女儿会、美国退伍军人团以及全国制造商协会都随声附和。一些律师协会、州议会、吉瓦尼斯俱乐部以及妇女俱乐部也纷纷通过决议，指责这项计划。堪萨斯州众议员尤利塞斯·盖耶模仿莎士比亚的悲恸腔调喊道：“我们这个皇帝吃的是什么肉竟然长得这么高大？”沃尔特·李普曼一本正经地说，提出这项计划是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富兰克林·罗斯福怒不可遏，他向美国人民陈述了他的立场。3月4日，有百元一客的筹款祝捷宴会上，他呼吁全体民主党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捍卫在过去四年里取得的成就。他不再佯称他只是想提高法院的效率，而是宣称新政的前途危在旦夕。他说，最高法院“掌握着否决”所有重大的“新政”立法大权。法院颁布的禁令已使瓦格纳法的实施陷于瘫痪，并鼓励大公司公然蔑视这项法规。水灾和旱灾波及全国，而低一级的联邦法院却颁布禁令，使田纳西水利局无法开展工作。总统接着说：“就是现在，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饥不饱腹，衣不蔽体，居住的条件极差！如果我们对信任我们的人守信用，如果我们要想使民主政体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

罗斯福无意后退，采取折衷办法可能了结这件事情。另外，关于改革法院的斗争已经发展，而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总统看来，这场斗争现在已经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决斗。哈里·伯德、米勒德·泰丁斯和沃尔特·乔治之类的保守派民主党人长期反对新政，但是从南北战争以后以及尔后的重建过程中开始形成的政治传统使他们不能同共和党人结盟。罗斯福认为，如果他放弃这场斗争，那就意味着把民主党的未来葬送在这些保守派的手里。他已表示不谋求第三个任期，如果他输掉这场斗争，他就不能提名他的接班人。所以，如果他希望完成他宏伟的计划，那么在这场彻底战胜新出现的保守联盟的斗争中，他就不能心慈手软。

“你看法院问题的情况如何？杰克”，罗斯福问加纳。加纳此时已从得克萨斯州回来，并对参议员的意见私下作了一番调查。

“你是希望通过原来方案，还是折衷方案？”

“原来方案”，总统笑着回答。

“好”，加纳回答。“那你输定了，你没有那么多票数。”

于是，罗斯福决定认输。惟一可行的，就是让加纳来缔结一个协议，保持总统已经下降的声望。7月22日，即在罗斯福首次宣布他的建议后的168天，这场斗争终于结束了，参议院悬殊的票数决定把法院改革法案送回委员会。一星期后，加纳强迫参议院通过一项软弱无力的替代方案。要求对比较低级的联邦法院实行无关痛痒的程序改革。对最高法院只字未提。

从表面看来，富兰克林失败后心绪还平静，然而伊克斯着重指出：“最近的打击使他头晕目眩。”他不仅由于最高法院改革的斗争而受到损伤，而且遭受到工潮的打击，面临着可能使新政的成就丧失殆尽的经济衰退。

经济情况继续恶化，而罗斯福对于采取什么解决办法举棋不定。一天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沮丧地说，他最近收到两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来信。“一封信说，全部问题在于资本转为信贷的速度，所以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购买力上。另一封信说，忘掉所有关于资本转为信贷的速度的数学公式吧。全部问题在于 1.3 亿人的购买力。”11 月，他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如果私营企业不对危机作出反应”，他声称，“政府就必须着手处理萧条问题。”

1938 年 6 月 24 日晚上，总统在炉边谈话中打响了清洗的第一枪。他谴责那些反对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民主党人是“毒蛇”。为了预防人们攻击他干预地方选举，他声称：“作为民主党的领袖……负责执行 1936 年民主党纲领中提出的确定自由主义的原则宣言，我认为我完全有权在少数几种场合中讲话，因为在这些情况中，力争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之间显然存在着涉及这些原则或者涉及滥用我的名义的争论。”

清洗的主要目标有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埃德”·史密斯、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内华达州的帕特·麦卡伦和科罗拉多州的阿尔瓦·亚当斯这几位参议员以及纽约州的众议员约翰·奥康纳。罗斯福采取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时罗斯福来自带头攻击，有时由代理人传达总统的祝福和诅咒。得宠的人受到热烈欢迎，被贬的人受到冷落，忠贞的党员对罗斯福的决定感到惊愕。法利想说服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但是法利这颗明星在白宫的天空中在暗淡下去。

由于干预地方选举，罗斯福就在道义上失败了。不久以前的斗争使人们想到“向法院安插亲信”，而“清洗”则引起了集中营、强迫劳动和行刑队这些不祥的幽灵。总统干预的必然结果是使那些受攻击的人成为烈士。

然而，要说 1938 年的国会选举是全面否定“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是不正确的。《幸福》杂志在翌年年初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60%以上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拥护罗斯福及其政策。尽管共和党大获全胜，罗斯福仍然连任总统，这是詹姆斯·门罗以来的第一次，而门罗在第二任期结束前，他的党还控制着国会。人们可能对新政感到厌烦，但是并不希望它解体。大萧条造成的紧迫感消失了，美国人寻求恢复传统的生存方式。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容忍改革引起的紧张和动乱。

但是，罗斯福不再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了。由于战争风云正从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席卷而来，他越来越关心外来的危险和美国的防务了。

第二十二章 维护和平

富兰克林呼吁实行国际合作并维护世界和平……与此同时，轴心国妄图使人类蒙受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罗斯福警告：“无辜的人民……无辜的国家正在被残酷地迫害并充当权欲狂的牺牲品。”

如果战争风云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任何人都不应当设想美国能逃脱过去，美国会指望得到仁慈对待，西半球能不受到进攻，而且还能继续保持平静与秩序。

如果热爱和平的国家想维护它们的自由，它们就必须同心协力反对那些违反条约和侵犯人权的国家。

罗斯福到底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希特勒及其盟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会给美国造成严重后果，这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当时，他把这些国家视为“强盗国”，雷克斯·特格韦尔声称，早在1935年，罗斯福就想对它们“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在“新政”的初期，对外政策并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事实上，罗斯福夫人在邀请《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用晚膳时就曾说过：“不知道你能否设法使总统比较关心对外政策。”

罗斯福曾经试图使美国加入世界法庭，但是没有成功，除此以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向30年代中期美国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挑战。从孤立到干涉的过渡是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放出的试探气球不计其数，民意测验做得像寻找金矿那样深入而细致。罗斯福在回溯伍德罗·威尔逊未能说服美国人支持国联一事时认识到，任何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在该国形成可靠的共识。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时，总统参与了往最高法院“灌输血液”的实验；次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他头脑中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衰退；慕尼黑危机结束时，他正在大肆“清洗”。事情的始终正是如此。当总统确实就国际局势的严重性发出警告和谋求加强美国的防务能力时，提出批评的人们指责说，他试图诉诸于战争冒险，藉以掩盖美国国内的失策。

没有几个美国人对希特勒或者日本军阀表示钦佩，尽管美国人十分同情被侵略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不肯介入欧洲和东亚问题。奈伊委员会指责说，由于盟国的宣传以及贪得无厌的银行家和军火商人的共同影响美国被哄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在修订论的历史学家和奈伊委员会这种指责的影响下，强烈地宣称：“再也不去打仗了！”美国大学生信仰和平主义，校园里发生罢课，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团。许多美国人坚决主张美国避免加入所有“纠缠性联盟”，就中包括为通过集体安全确保国际安全所承担的义务。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再次把美国拖入一场国外战争。“美国奉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受纠缠，无拘无束地处理国内外事务。”1936年1月沃尔特·李普曼宣称：“让我们奉行这项政策……让我们不加入任何联盟，让我们不承担任何义务……”

由于德拉诺家族在历史上同中国保持友善关系，罗斯福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同情无依无靠的中国人。他们感到同中国有感情上的联系，自从本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把自己视为中国的自封的保卫者。美国商人、传教士和教师造成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而对日本却采取越来越敌对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的扩张被视为对菲律宾和太平洋其他海岛前哨的威胁之后。为了抗议日本的进攻，美国人抵制日货，一些妇女宁可穿棉线长筒袜，也不穿用进

口丝织的长筒袜。

1937年12月12日，九国会议结束后三个星期，日本就向中国的首都南京西面大约27英里的水面上狂轰滥炸，当时美国炮舰“帕奈号”中弹燃烧。一些美国商人、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正在炮舰上避难，美孚油公司的三艘小油轮也在由它照管。“帕奈号”的天篷上刚刚涂上两大幅美国国旗，每艘船上飘扬着星条旗。下午1点30分以后，一群日本俯冲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人们来到甲板上观看。忽然间，这些飞机从晴朗的中国上空俯冲下来。“它们扔炸弹了！”一个人喊着：“隐蔽！”

“帕奈号”屡遭轰炸，弹痕累累，飘扬着的国旗慢慢地沉在浑浊的扬子江中。当乘客和船员们坐木筏和小船上岸的时候，日本飞机又来扫射。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意大利记者都中弹身亡，还有40人负伤，三艘油轮也受到轰炸和扫射，在下沉之前冲到了浅滩，油轮上的中国船员逃到岸上。同一天，在扬子江上几艘英国船也受到了袭击。

整个假期里，总统审阅了将于1939年1月4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草稿。在这些讲话中，完全看不到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所特有的独立主义残余。富兰克林在讲话中警告说，中立和绥靖不能防止侵略。他强调说，虽然战争已暂时避免，但是和平尚无保证，美国必须百倍地重视自己的防务。富兰克林一方面要求废除中立法中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条款，另一方面要求拨出20亿美元的防务经费，其中大部分用于增强美国的空中力量。为减少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情绪，罗斯福邀请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向他们秘密介绍国外和国内情况。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担心希特勒妄图称霸于欧洲，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有人向一位记者透露情况：总统说过莱茵河是美国的疆界。孤立主义者纷纷对总统大肆攻击。罗斯福义愤填膺，把这种说法斥之为谎言，说是出自白痴之口。

华盛顿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同伦敦和巴黎一样强烈。伊克斯说，总统对希特勒“越来越愤恨了”。他还想同德国断绝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表一项措词强烈的声明，谴责希特勒“在毁灭自由、独立民族的自由”！并宣布美国决不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

罗斯福说，我们要是能取消武器禁运，那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但是他的言论于事无补。他提出的这项建议受到了参议员博拉这类的孤立主义者的坚决抵制。总统把博拉和其他国会领袖召集到白宫，亲自向他们发出呼吁，但是博拉顽固不化。博拉宣布：“我们都不去作战。”副总统加纳问其他国会领导，改革方案是否有可能获得通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可能性。”加纳对总统说：“元首，我们不如面对现实。你得不到那些票，事情就是这样的。”

然而，在寻求和平的问题上，罗斯福还不肯罢休。4月15日，他毅然采取“星期六的突然行动”，呼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不止一次地谈到的和平愿望。他在电文中列举了31个独立国家，建议这两个独裁者保证至少在十年以内不向其中任何一国发动战争。这项令人大吃一惊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公众、伦敦和巴黎公众的支持，但是轴心国却置之不理。

第二十三章 总统的盛名

罗斯福的威望与日俱增，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这次竞选中他以 27 243 466 票获胜。美国民主党人不顾连任三期的争议问题团结一致爱戴他，对他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归根结底，他获胜是因为美国人民在面临严重危险的国际形势下，要求他担任危机时期的领袖。

对于美国人对谁寄予同情，这本是毋庸置疑的事。在回答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人当中，有 82% 的人希望盟国赢得胜利；只有 2% 的人赞同纳粹德国。但是，美国人深恐再度被拖进一场欧洲战争。9 月 3 日晚上，总统在向全国发表一次炉边谈话时说：“我希望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我敢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政府要为实现这一目的作出应有的贡献。只要我有权在握，和平决不会在美国覆灭。”为防止战火蔓延到大西洋彼岸，他在美洲国家周围画了一个离海岸 300 英里的防御圈，并发表了一项中立宣言。同伍德罗·威尔逊 1914 年的做法有所不同，他没有要求美国人在思想上保守中立。总统接着说：“甚至一个中立者也有权考虑事实。甚至也不宜硬要中立者不去思维，或者失去他自己的良心。”

总统在起草即将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时比平常更小心谨慎。在头天下午，他在白宫召见了两党的 15 位国会领袖，藉以讨论这项法案。他对萨姆·罗森曼和阿道夫·伯利起草的讲稿作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晚上 11 点，罗斯福上床就寝，但是格雷斯·塔利和罗森曼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早晨七点他们又起床，走进总统的卧室，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一上午。罗斯福坐在床上，周围放满了文件。他逐页审阅讲稿，在审阅完之后，就交给塔利小姐用打字机重打一遍。他在电话中同赫尔商量过几次，讲稿的最后文本直到下午两点钟发表之前不久才定了下来。

罗斯福不出头露面，而让支持政府的人去带头进行争取废除禁运的斗争。加拿大总督特威兹穆尔勋爵（《三十九级台阶》和其他惊险小说的作者约翰·巴肯）建议要他“悄悄前往”海德公园村讨论欧洲时局，而总统却坚持推迟一段时间，他说：“我简直是如履薄冰。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咨文，这项法案有可能如愿获得通过，此刻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幕后领导着这场斗争。他鼓励威廉·艾伦·怀特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通过修正中立法获取和平的无党派委员会，同孤立主义的论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削弱库格林的吸引力。他还亲自敦促天主教会和劳工组织领导人支持废除禁运的措施。六个星期的辩论以总统的显著胜利而告终。现在盟国需要什么物品，就可以在美国购买什么物品，比如火炮、飞机和坦克，只要盟国支付现金，并用自己的船只将补给品运走就行。

10 月 11 日，总统接见了来访的亚历山大·萨克斯。他是一位同“新政”有联系的经济学家，也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朋友。萨克斯带来了这位杰出的数学家的一封信和另一位难民科学家利奥·西拉德的一份备忘录，罗斯福从这封信和备忘录中获悉，德国在核裂变方面取得了成就，总统对这个神秘领域一无所知，而且思虑重重，所以对此漠不关心。萨克斯担心，罗斯福可能将这些函件束之高阁，不加以仔细研究，因此他坚持大声朗读一遍。爱因斯坦说：“这种新现象还可能导致制造一种炸弹，不难想象，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可能会被制造出来。”这引起了罗斯福的好奇心，他说：“亚历克斯，那么你们追求的就是保证纳粹无力把我们炸毁。”

“正是这样。”

罗斯福对沃森将军说：“帕，真需要采取行动。”从此萨克斯同国家标准局局长莱曼·J·布里格斯博士之间建立了联系，铀问题咨询委员会随即成立起来，由它的军事和科研人员去探讨这个问题。

1940年3月，在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夜宴上，一尊用制型纸复制的塑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肖像的狮身人面大雕像凝视着来宾。这尊雕像现出一副淘气的笑脸，得意地斜叼着烟嘴，嘲笑着在座的新闻记者和政客。1937年1月，总统的最后几句誓言还没有被人忘记，人们就开始揣测总统是否会竞选第三届总统，然而这尊不可思议的美国人面狮身大雕像坚决不去破解这个谜。表明这个揣测的新闻记者遵命“戴上圆锥形纸帽，靠边挨罚站”。由于7月15日即将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日益临近，设法摸清罗斯福的计划已经成为举国关注的事情。内阁成员和白宫助手同一般公众一样猜不中谜底，他们就根据同总统谈话的片断热烈地交换意见。甚至他夫人都不能肯定他拟订什么计划，直至1940年春天她还以为他不会再次参与竞选活动。

未来的继任者颇不乏人。据云，副总统加纳和除开弗朗西丝·珀金斯以外的全体阁僚，都在不同时期参与竞选，但是哈里·霍普金斯似乎是总统一手挑选的继任者。1938年12月，他采取了树立霍普金斯个人威信的第一个措施，委任他为商务部长，希望他能赢得企业界人士的信任，因为他担任工程兴办局局长时挥霍成性的履历曾经惊动企业界。总统只要公开露面，就一定把霍普金斯带在身边。总统夫人也在她的专栏中对霍普金斯倍加称颂。霍普金斯短暂的走运由于身体欠适而终结。罗斯福还鼓励华莱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O·道格拉斯和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参加竞选。加纳·法利和赫尔在保守派当中拥有一批追随者。候选人中还包括前印第安纳州州长保罗·V·麦克纳特和参议员伯顿·惠勒。但是，由于罗斯福拒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他们都无法放出试探气球。1940年1月和2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8%的民主党人赞成重新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而他的主要对手加纳的支持者只10%的票数。

盟军在德军闪电战的迅速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因此纷纷要求美国提供飞机、兵舰、大炮和弹药。德军的猛烈攻势使美国人目瞪口呆。以前，他们由于同欧洲的危险隔离而产生的舒适感如今已成为泡影。虽然在政策问题上的辩论仍在持续中，但是人人都认识到，纳粹的胜利危及美国的安全。

罗斯福建议大规模增强美国陆军和海军威力，就中包括实现每年制造五万架飞机的前所未闻的目标。5月16日，他对国会说，因为敌人拥有远程轰炸机，机械化部队、伞兵部队并且利用叛国分子，美国人民必须重新考虑如何保卫祖国的问题。

为防止在连任三届问题上的争论影响提名，罗斯福的支持者们打算指定他为总统候选人，而不采取点名投票的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些问题。加纳和法利这两个仍在竞选的候选人应首先同意将自己除名。7月7日，即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前一周，法利驱车前往海德公园，心情很不舒畅。最近几年，因为他认为罗斯福的激进主义思想日益严重，他和总统不知不觉地疏远了。他已不再应邀去白宫出席早晨的床边会议。当他的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也听不到对方那熟悉的声音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交性的，法利已公开表示，他不在乎从白宫内圈中被排挤出

去。但是，他内心感到痛苦，因为他怀疑罗斯福在社交方面对他非一视同仁。

新政分子和城市党魁们掌握的票数足以使总统在这次竞选中赢得胜利。提交大会的名单上除了有总统的名字以外，还有法利、加纳和米勒德·泰丁斯的名字，但是投票结果原属意料中事。罗斯福得到 946 票，法利 72 票，加纳 61 票，泰丁斯 9 票。票数清点完毕之后，法利扛着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闪闪发光的秃脑袋，从人群中挤到主席台上，提议大会一致通过总统候选人提名。会场上发出了普遍表示同意的喊声。提名不是指定的，然而总统候选人得到的选票接近于指定提名的选票。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同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们一起等待大选的结果。萨拉·罗斯福和几位老太太在靠近前门的一间小客厅里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几乎没有注意听电台用柔和的声音播送的投票结果。大部分客人在那间图书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踱来踱去。那里也有一架收音机，可以收听到大选的实况。罗斯福穿着衬衫，在餐厅里准备好了计票单和新闻自动收报机。埃莉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照看着所有的客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电台的广播。

到了 10 点钟，结果清楚了，他将以大多数票获胜。他而且担心，若是他落选，那就可能被视为绥靖政策的胜利，他对他夫人的朋友约瑟夫·拉希说：“乔，我们似乎防止了一场暴动。”总统和客人走到门廊去迎接海德公园邻居们举行的火炬游行。当天晚上，罗斯福格外兴奋，因为只有这一次他才在一贯投共和党票的选区内获胜。当罗斯福看到一幅仓促刷写的标语上写着“有把握连任三届”的时候，他尽情地笑了。

第二十四章 介入战争

从罗斯福当选第三届美国总统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为止的这一年里，美国的中立肯定已经名存实亡。总统在他自己的胜利鼓舞下，允许英国无限制地利用美国的工业资源。1940年底，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我们要成为民主阵营的巨大军火库。对我们来说，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情况。我们必须以我们将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爱国和献身精神，致力于完成我们的任务。”

总统的皮肤晒得黝黑，显得非常快活，于12月中带着一项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返回华盛顿。为什么不对英国需要的补给品和装备实行出租或者出借呢？12月17日，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用一个朴素的比喻透露了租借的大概轮廓。他说：“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我有一根浇花用的四五百英尺长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防栓上，我可能帮助他扑灭。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在他借软管之前我不说：‘邻居，我花15美元买的这根浇花用的软管出租给你，你得付给我15美元。’不，我们进行的交易是什么？我不要15美元，我希望在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

1941年1月6日，在对这项建议进行最后润色的时候，总统出席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他宣称，美国不会由于轴心国叫嚣，说我们向盟国提供援助，违反了国际法，是战争行动，而不敢提供援助。“提供援助并不是战争行动，即使独裁者片面宣布这是战争行动也无用。当那些独裁者准备向我们发动战争时，他们不会等待我们采取战争行动。他们并没有等待挪威、比利时或者荷兰采取战争行动。”他接着说，如果战胜那些独裁者，那就会出现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的世界。

四天以后，决定实行租借的法案 代号 H·R·1776 提交到了国会。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 H·R·1776 法案，1941年3月11日，总统将它签署为法律。欣喜若狂的丘吉尔为租借法欢呼，说“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上至为高尚的行为”。最初的拨款为70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盟国提供了大约50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由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指挥的几艘军舰一直在大西洋300英里以外的海域巡逻，以防破坏西半球的中立。4月10日，总统宣布将从太平洋抽调军舰加强大西洋舰队，巡逻区将延伸到大西洋的中点，即西经25°。丹麦拥有的格陵兰岛立即被置于美国保护之下。7月7日，美国将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派遣到冰岛——距英国不到1000英里——替换占领该岛已有一年之久的英国部队。这些步骤被称为西半球的自卫措施。美国舰只没有受权袭击德国潜艇和水面进攻舰只，但是可以通过电台把敌舰位置通知英国船队。当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防止英国舰只抄收这些讯号和袭击德国潜艇。

1941年的整个夏天，总统在派遣舰队问题上一直曲折地前进。5月27日，他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向美国人民公布了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目。他接着说：“现在，我们的巡逻有助于确保向英国运送所必需的补给品。为运送这些物资，将采取所有其他有利的措施……向英国运送必需的补给品是一项紧急任务。……这项任务必须顺利地完成。”人们纷纷

这个象征性的立法号码据说是一个无名的众议员拟定的，舍伍德指出，它听起来像“罗斯福式的概念”。

向白宫拍电报，表示支持这种坚定立场。总统惊讶地对舍伍德说：“95%的电报表示拥戴！我估计，对我这次讲话，若是支持和反对的人各占一半，我就能够走运的了。”人人都预料总统在这次讲话之后会发布命令，允许英国船只加入美国海军护送的船队，并谋求废除中立法。这样，美国船队就能把货物直接运送到英国港口。

史汀生敦促总统利用希特勒6月22日入侵苏联造成的心理优势，下令开始为船队护航。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希特勒的注意力从大西洋转移他处的时机采取行动。史汀生说：“直接率领军民去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的大门为你敞开了。”然而，总统再次拒绝被卷入这种漩涡。护航意味着开火，而开火意味着战争，他不想同纳粹德国公开发生冲突，他仍然希望保持一种半交战状态，由美国向英国和其他抵抗希特勒的国家提供战争工具。

8月初，总统高兴地向白宫记者团宣布，他将抽出一些时间去钓鱼。总统的游艇“波托马克号”在马撒葡萄园岛附近懒散地游弋了几天，然后仿佛被鱼雷击沉似的无影无踪了。直至8月14日，全世界才获悉，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阿金夏附近的普拉森夏湾举行了三天会谈。作为用基地换取驱逐舰的交易的一部分，普拉森夏湾已经转让给美国。总统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先到达该地。翌日，丘吉尔首相乘坐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驶进了薄雾笼罩的港口。当时霍普金斯也在这艘战列舰上。

罗斯福在阿金夏的主要目标是发表一项阐明战争目标的联合宣言。尽管他同丘吉尔保持着诚挚的关系，他并不完全相信英国人。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包括罗斯福提倡的“自由”，这使人们清楚地回想起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它还宣告各国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和对世界财富公平分配的权利。它宣布英国和美国不谋求任何新的领土。罗斯福坚决主张，在宪章上应该删除有关成立国联式的国际组织的所有字眼，以免引起孤立主义者的怀疑。在私下，他冀望美国、英国、苏联，也许还有中国——在全世界维持治安，以保证这个国际组织不会由于它的许多成员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陷于瘫痪。

如果罗斯福希望大西洋宪章能够激励美国人民拿起武器同纳粹主义作战，那他失望了。现有的战线只是得到巩固。民意测验表明，全国74%的人希望不介入这场冲突。另一方面，罗斯福显然自己已下定决心参战。到1941年秋，英苏两国在军事上的挫折已使他确信，希特勒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权威人士断定，他认为美国不必派遣大批部队去海外作战，美国的军事贡献可以只限于海军和空军的支持。

9月4日，美国海军驱逐舰“格利尔号”正在向冰岛运送邮件的途中，一架英国轰炸机向它发报说，在它前面大约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一艘德国潜艇。美国军舰没有受权袭击德国潜艇，而是对潜艇进行跟踪，广播潜艇的位置，以便通知英国的飞机和军舰。“格利尔号”赶到了现场，进行搜索，它的探测器紧紧盯住了目标。德国潜艇艇长被跟踪三个小时之后，显然他对捉迷藏的游戏感到厌烦了，于是向这艘跟踪的兵舰发射了一颗鱼雷，但是没有命中。美国驱逐舰发射了一连串深水炸弹，接着发现了一颗鱼雷向它射来，它躲开了，结果德国潜艇也不见了。

罗斯福利用“格利尔号”事件作为借口，宣布了他派遣舰只护航的新政策。当然，这艘驱逐舰同英国飞机互相配合，跟踪德国潜艇，是有危险的，而德国潜艇艇长也不能断定他的对手的国籍，罗斯福认为首先开火的是发射

鱼雷的潜艇而不是跟踪潜艇的军舰。总统已定于9月8日发表一次炉边谈话，在此期间，他前往海德公园去探望他的年老体弱的将近87岁的母亲。

这位老人看见儿子回来打起了精神，但是在9月6日晚，她的血液循环系统出了毛病，第二天没有苏醒过来就死去了。当时没有暴雨，没有狂风，也没有闪电，过了不到五分钟，庄园中一颗最大的枯树倒在地上了。总统在外表上对母亲的逝世没有流露出任何悲哀的迹象，但是，了解他一向念念不忘自己童年世界的每一种联系的朋友们知道，他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萨拉·罗斯福被安葬在圣詹姆斯教堂的家族墓地。她的41年前去世的丈夫就葬在身边。总统在没有特工人员陪同的情况下抛头露面，这还是第一次。当送殡队伍快到墓地的时候，特工处分遣队队长迈克·赖利对吉米·罗斯福说：“由你照管他一下，吉米，即使国会说那里属我们管，我想那也不是我们该管的地方。”

9月11日，罗斯福衣袖上戴着黑纱，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闭口不谈是“格利尔号”驱逐舰挑起潜艇开火的事实，而把这一事件说成是“海盗行径——从法律上和道义上来说都是这样”，并强调指出，任何暴力行动都不会吓得美国放弃在公海上航行的权利。“我们过去不想同德国开火”，他接着说，“现在我也不想同德国开火。”但是，“不管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保持合法的商业运输畅通无阻。……当你看见一条响尾蛇准备咬人的时候，你不会等他咬人后才打死它。这些纳粹潜艇和袭击者都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

总统的讲话没有错，但是他无视是“格利尔号”激起德国潜艇发射鱼雷的事实，则是利用了这一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毋庸置疑，他的用意乃在于鼓动美国人民拥护他向美国海军发布的“一见到鱼雷就开火”的命令。孤立主义者指责这种做法，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尽管仍然不肯参战，还是和他一样担心，纳粹的胜利必将危及美国的安全。

在“格利尔号”事件之后的不宣而战的海战中，又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刚过一个月，“克尔纳号”军舰在执行护航任务时被一颗鱼雷击伤，11名海员死亡。罗斯福在海军日（10月27日）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中说：“美国已遭到袭击，美国军舰‘克尔纳号’是我国海军的一艘军舰，它属于我国的男女老少。”他出示了旨在表明纳粹企图把南美洲分成为“五个仆从国”的文件，从而使人们回想起1917年的齐默尔曼电报。当时德国外交部打给德国驻墨西哥公使一份密码电报，敦促他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缔结德墨联盟。在美国人专注于欧洲事件时，墨西哥人准备越过边界，夺取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这些“失去的领土”。英国情报机关截获了这份电报，这对美国向德国宣战方面起了作用。罗斯福敦促国会取消中立法“约束性”条款，这样，美国商船就能够武装起来，并获准开往英吉利港口。四天以后，有四个烟囱的“卢本·詹姆斯号”成为美国海军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第一艘军舰。它在冰岛西面大约600英里的地方被德国鱼雷击沉，造成115人死亡。

大西洋的局势已经达到一触即发的阶段，公开战争迟早会爆发，除非德国甘愿放弃大西洋战役，否则德国就不能允许美国船只顺利地向英吉利提供补给品。孤立主义的势力还很大——中立法仅以微弱的多数得到了修改。任何要求国会正式宣战的试图，都会引起一场剧烈的辩论，使美国四分五裂，以致削弱总统的领导作用。此外，美国还没有作好宣战的准备。美国的防务

没有全面展开，远远未能成为民主阵营的军火库。

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 1861 年的做法如出一辙，为使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领导，不得不施展手法，引诱他的对手先开第一枪。这些因素可能有利于说明总统为什么在 1941 年秋季仍举棋未定。相对地说，他没有权力足以左右事态的发展，因此只好等待阿道夫·希特勒采取一些戏剧性的挑衅行动，迫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舍伍德说：“他再也没有戏法可变了。他从里头掏出许多兔子的那顶帽子已经空空如也。”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在大西洋作战的时候，它在太平洋上受到了致命的突然袭击。

就罗斯福而言，太平洋战争是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海洋打的一场不合适的战争。他的政策的基本宗旨是使英国能够维持下去——最好是采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同日本交战则会耗尽同主要敌人德国交战的人力和装备。罗斯福把太平洋舰队从原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的基地调到珍珠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行动使日本不敢发动侵略。但是这次调动受到海军上将詹姆斯·O·理查森的强烈反对，结果，他的职务由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接替。事实上，美英加三国的陆军和海军参谋人员 1941 年 3 月秘密制定的 ABC - 1 号计划已确定了“欧洲优先”的战略。如果美国被卷入一场两大洋的战争，它将通过防御性行动来牵制日本，直到希特勒战败，盟国准备对付它为止。美国的远东政策是要在经济方面压制日本，同时避免和它交火，因为太平洋舰队将一部分军舰调至大西洋以后，力量就很薄弱了。而日本海军却拥有更多的军舰和装备。罗斯福抱怨说：“我的军舰和装备实在不够用。”

总而言之，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和美国错误估计对方的意图所引起的。双方都主张和平，然而它们给和平下的定义有所不同。对美国人来说，和平意味着日本不再侵略中国和其他地方；对日本人来说，和平意味着日本有占领东亚的权利。这是日本不能轻易放弃的立场。日本人说，美国人自然明白，一个工业国必须获得原料和市场。作为第一流的工业国，日本不得不控制满洲、中国和东南亚（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美国的政策要把道德和现实统一起来。因为美国人民用理想化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所以美国就把它的远东政策的基础放在一个和它的基本利益无关的问题上，即放在中国自求解放的问题上。罗斯福从来就不相信日本会同西方国家交战而自取灭亡，他确信，他若是立场坚定，就可能迫使日本人收敛一下，到 1940 年年尾，除开石油之外，美国中断了向日本出口其他至为重要的军用物资。

罗斯福给予日本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他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大约 13100 万美元的财产，从而结束了美日之间的贸易——其中包括日本消耗的 80% 的石油贸易。然而罗斯福并不想勒死日本。此后不久，华盛顿表示，只有不适宜提炼航空汽油的低辛烷石油产品，可酌情颁发出口许可证。伊克斯说，总统担心彻底实行禁运会促使日本攻打东印度群岛，“因此美国仍不愿把绞索勒紧。他认为，莫如……不时地猛拉一下绞索”。

在美国实行禁运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继而停止向日本出售石油。日本人认为，这一行动无疑是西方国家从经济方面封锁日本帝国的最后一步。

1941 年，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极力主张出动航空母舰突然袭击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日本借此机会可以充分利用它在太平洋上占优势的海军实力——十艘战列舰对九艘战列舰，十艘航空母舰对三艘航空母舰。发动这样的袭击已有足够的先例。日本曾用优势兵力突然袭击俄国和中国；1940 年 11 月，几架英国鱼雷飞机摧毁了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作

战舰队。日本人并不知道，在 1932 年的海军演习中，美国一支航空母舰部队突然袭击珍珠港，“摧毁了”整个太平洋舰队。

“战争警报”传到美国驻太平洋部队司令，就中包括驻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和夏威夷卫戍区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他们知道美日谈判已经破裂，预料日本要在最近几天内向菲律宾、泰国或者婆罗洲发动进攻。他们已经奉令“部署适当的防御力量”。金梅尔认为，夏威夷目前不会遭受任何威胁，因而没有命令他的舰队全部处于戒备状态，没有安装防鱼雷网，也没有开始进行空中搜索。肖特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夏威夷受到袭击。他除了把飞机集中在机场以预防破坏之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华盛顿官员也有他们的失误之处，他们没有把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时转告金梅尔和肖特，也没有及时询问为应付这场危机采取了什么措施。

许多美国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美日会谈将以失败告终。在远东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人人都没有料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领土会遭到袭击。美国人往往瞧不起日本，因为日本飞机和军舰是模仿美国装备制造的，质地低劣。近视的日本飞行员不能击中目标，日本的茶馆经济在战时的压力下眼看就要垮台。纽约的小报《下午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上说到“我们怎样用两个月的时间战胜日本”的问题。多数美国人在过感恩节时没有极度不安的情绪，甚至罗斯福也设法前赴温泉度假，虽然他得把启程日期推延到节日之后。基金会的感恩节晚宴推迟到 11 月 29 日星期六，以便总统能够出席指导。他刚到温泉就去看望利汉德小姐，她自从 1940 年夏天中风后未能痊愈，目前正逐渐康复。总统回到小白宫后接到了赫尔的电话，说远东局势危急，有一触即发之虞。

“我想，我要是回到华盛顿，赫尔的感觉就会起变化”，他对格雷·塔利说：“但是，如果他再来电话，今晚我就能决定是否动身。”那天晚上，赫尔又打来电话，总统下令星期日返回华盛顿。他向利汉德小姐告辞了，她在总统离开时几乎流出了眼泪。他从她住的别墅慢慢地驱车来到佐治亚大厅前，病人总是在那里向客人告别。这是一次庄严的告别，他在临别前说的一句话是：“这可能是我和你们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了。”

12 月 6 日，罗斯福亲自向日本天皇裕仁呼吁和平。来栖三郎告诉他，这是防止战争的惟一手段。他在电报中说：“我们两个人都有恢复传统的和睦、预防人类进一步死亡并使全球避免遭受毁灭的神圣义务，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伟大祖国的人民，而且也是为了邻邦的人民造福。”

他把这份电报发出去以后便对一些出席晚宴的来宾说：“这个凡人之子刚刚向上帝之子发出最后的电报。”他向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保证，“一旦英国领土或荷兰领土受到进攻，我们都应该站在一边。”那天深夜，总统和霍普金斯坐在椭圆形书房里，一名特别信使送来了“魔术”破译系统截获的电报，这份电报指示日本使节通知美国政府，日本已拒绝接受那项建议。罗斯福用了大约十分钟看完电报，霍普金斯不安地在室内踱来踱去。

“这意味着战争”，总统把电报递给霍普金斯时说。

“既然这一场战争无疑将在日本人认为适当的时候爆发”，霍普金斯回答，“我们若是不能首先发动进攻和制止任何形式的突然袭击，那就太吃亏了。”

“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罗斯福说。“我们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

几个钟头以后，在地球那一方的中太平洋上，六艘悬挂着日本太阳旗的航空母舰掉转舰头迎风驶行，正准备出动致命的机群。当第一架飞机在旗舰“赤城号”飞行甲板上起跑冲向黎明的天空时，飞行员们庄严地三呼“万岁”，飞也似地前进。一刻钟之内，就有 183 架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飞机径直朝着大约 230 英里远的珍珠港疾速地飞去。

第二十五章 三军统帅

罗斯福满怀信心的乐观态度就像在失败后的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着光芒。他经常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报告战争的进展情况，确保美国人民战斗到胜利的决心永不动摇。

罗斯福作为战争领导人的伟大在于他能够使热爱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了丰功伟绩并把美国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总统摇电话给科德尔·赫尔，传达了有关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赫尔告诉他，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刚到国务院。日本给这两名使节下达的指示的最后一部分——已被电台截获——明确地告诉他们在夏威夷时间上午七点半转达日本拒绝接受美国和平建议的照会。这个照会显然是打算终断两国关系。但是，日本大使馆一片混乱。照会没有及时翻译出来，罗斯福指示赫尔接见日本人，但不宜提及袭击珍珠港的事。他必须对他们以礼相待，冷淡地“把他们打发走”。国务卿本来想拒绝接见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但还是遵从罗斯福的命令，因为这个消息不真实的“可能性仍占1%”。

这时，斯塔克上将已经给总统打电话证实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关于太平洋舰队受到严重破坏的消息也在慢慢地传到白宫。罗斯福向史蒂夫·厄尔利口述了一份新闻公报。聚集在总统书房里的人们的心情不断地发生变化。首先，人们听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时感到震惊，然后又为美国进行干涉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而感到宽慰。但是，当人们得知人员、军舰和飞机的损失严重之后，焦虑和惊恐的心情就更为突出了。罗斯福设法同夏威夷驻军司令打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该死的，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丘吉尔从伦敦打来电话，想证实一下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

“总统先生，关于日本，这是怎么一回事？”丘吉尔问。

“十分确实”，罗斯福回答，“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发动进攻，现在我们大家已经是风雨同舟了。”

在总统前往国会山要求向日本宣战时，在珍珠港被击沉的军舰露出的烟囱正冒着浓烟。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歪歪斜斜的三角桅杆和“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身在锚地上竖立着。“亚利桑那号”已经成为将近1100名官兵的坟墓。“俄克拉何马号”看上去就像一条试图冲上岸滩的巨鲸。一些小船慢慢地驶来驶去，从漂着一层油的水中打捞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总共有19艘军舰被击沉、击坏，其中包括太平洋舰队的全部用以作战的舰只。据统计，美国损失265架飞机，绝大部分是整齐地排列在地面上时被炸毁的。美国总共死亡2403人。1178人受伤；日本人损失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惨案。

罗斯福在他儿子詹姆斯的搀扶下走向众议院的讲台时，响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共和党人也鼓掌欢迎。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在全国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刻政治上的敌意已经消失了。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民团结一致，拥护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笔记本。他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了片刻，看看坐在前排的阁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各国外交使节，然后抬头望望座无虚席的楼厅观众席，他夫人和伍德罗·威尔逊的夫人坐在一起。在全国各地，美国人都聚集在收音机前，倾听人们熟悉的声音，罗斯福非常慎重地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臭名昭著的日子，美国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袭击。美国和那个国家原本处于

和平状态，并应日本的请求仍在和日本政府与天皇对话，期望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这次袭击使美国海军和陆军遭受到严重损失。许多美国人丧生……既然日本在 12 月 7 日星期日卑鄙地发动袭击，我请求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参议院没有经过辩论，在一个小时之内一致批准了总统的请求，众议院听取几个人的讲话，然后就投票通过，只有一个人反对。蒙大拿州众议员珍妮特·兰金投了一张反对票，此人还曾投票反对美利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也和美国一道向日本帝国宣战。三天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罗斯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领导。原来他是“新政老博士”，现在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博士”，虽然有不少国内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把绝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到战争上。总统在紧急时期总是精神振奋，以开始实行新政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担负起指导军事、外交和国内政策的重担。全部权力都集中在白宫，他也喜欢扩大自己的权力。赫尔指出，罗斯福由于发挥新作用而感到分外得意，并且愿意在国宴上以三军统帅而不是以总统的身份与客人会晤。罗斯福的当务之急是赢得军事胜利；因此，他必须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确保盟国在战后继续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要和苏联达成真正的谅解。

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罗斯福坚决执行文职人员控制的原则，他还在军事事务上保持着怀疑态度。当初他曾选择一个颇有才能的军事顾问班子来制定世界性的战略。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包括：陆军上将马歇尔、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和陆军航空兵上将亨利·阿诺德。航空兵是陆军的一部分，但是阿诺德仍被提升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以便使美国的指挥结构同英国保持一致，在英国的指挥结构中，皇家空军是一个独立兵种。威廉·李海上将担任总统的军事助手和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系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安排后勤工作，并制定派出人员、军舰和飞机参加战斗的指示。在参谋长们的帮助下，罗斯福挑选出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样一些能干的战区司令。丘吉尔常用一些考虑欠周的建议打扰他的参谋人员，而罗斯福却很通情达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干涉日常军事行动，这同丘吉尔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三军统帅，总统在陆军和海军之间，在各个战区司令之间，在向美国索取紧俏补给品的英国人和向美国索取紧俏补给品的俄国人之间，发挥了调停人的作用。因为他通常看重说服而不是发号施令，所以他没有严密地控制住军事战略这个环节，但是在什么问题上的发挥最高权威，则是毫不含糊的。正如威廉·埃默森指出的那样，罗斯福掌握“政治领导必须听取军方的技术性意见和建议”的原则，“但是不管以什么作为代价，政治领导必须支配和指挥军事工具，使之符合自己的目标，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在太平洋遭到失败后的黑暗日子里，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同德军交战是当务之急。在军事顾问的反对下，他坚持认为，希特勒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日本，德国能够生存，但是如果打败德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就活不久了。

珍珠港事件使许多动不了的齿轮又动起来了。罗斯福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更为清楚地懂得，现代战争不仅是作战部队之间的一场搏斗，也是互相竞争的技术之间的一场搏斗。他坚决要实现似乎是异想天开的生产目标。他在起草 1942 年的国情咨文时把他的部属提出的各种生产数字予以提高，把那年生产的飞机增加到 60000 架，坦克——25000 辆，高射炮——20000 门，商船——

—600 万吨，以填补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他对提出不同意见的霍普金斯说：“哦——如果生产工作者努力地干，就能够办到。”这还只是个开端。下一年的指标是 125000 架飞机，75000 辆坦克，35000 门大炮和 1000 万吨船舶。他还说：“这些数字和一些类似的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知道一点他们袭击珍珠港引起了何种后果。”

1942 年 1 月，罗斯福为了结束混乱不堪的局面，成立了一个以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经理唐纳德·M·纳尔逊为首的战时生产委员会，以便集中指导战时工作。战争生产委员会存在时间不算长，时常遇到风波，经历了挫折和斗争。总统如果不满意某个机构，就成立另一机构来接替它的职能，而不废除原来的机构。据一位权威人士说：“罗斯福组建一个部级机构的方式通常是把它从中间分开。”最后，1942 年 10 月，他成立一个以前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贝尔纳斯为首的经济稳定局，事后改称为战时动员局。贝尔纳斯为了从总统肩上接过治理国内经济的担子，辞去了最高法院的职务。无怪乎人们称他为“助理总统”。

据弗朗西丝·珀金斯说：“罗斯福是催化剂，通过他的努力可以创造性地驾驭混乱的势力。他与其说是一名小心翼翼的行政官吏，倒不如说是一种给予人以活力的药剂。关于罗斯福是否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的生产能力，斯大林大概是公正的鉴定人，这位苏联独裁者曾经宣称：‘没有美国的军事生产，联合国可能永远打不赢这场战争。’”到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工厂和造船厂制造了 299300 架飞机，72100 艘舰艇，4900 艘商船，86300 辆坦克，850 万支步枪，1400 万吨弹药和炸弹。与此同时他还动员了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军事力量。战争结束时，陆军和海军的男女军人共计 1200 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高峰人数约为 340 万。

罗斯福宣称：“时间是要素。”随着 1942 年年底的即将来临，战争的趋势出现了有利于盟国的迹象。珊瑚海战役已阻止住日本的扩张，一支日本入侵军在中途岛被击退，伤亡惨重。美国已经开始越岛作战，向日本挺进。德军向高加索的大规模强攻在伏尔加河沿岸的斯大林格勒停了下来，俄国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英军不仅守住了阿拉曼，而且在美国的 400 辆谢尔曼型坦克的增援下，于 10 月 23 日冲破德军的防线，使隆美尔的部队狼狈撤退。

罗斯福看到胜利在望的前景，觉得很兴奋，于是他接受了英国的战略，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推迟到 1944 年进行。由于进一步推迟开辟“第二战线”，美国就设法安抚斯大林，它答应给俄国增加补给品，并加紧从空中轰炸德国。美日继续交战的计划也获得批准。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这次会议还讨论了错综复杂的法国政治局势。1940 年法国沦陷后，当时的上校戴高乐逃到了伦敦，他在伦敦宣布他和他的自由法国运动是进行抵抗的真正象征。

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白宫成了一个寡于欢乐的地方，罗斯福也成了一个越来越孤单的人。埃莉诺绝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到处发表讲演或外出视察。他的四个儿子都在海外。哈里·霍普金斯又结了婚，搬到乔治城定居。马文·麦金太尔 1943 年去世，翌年利汉德小姐也辞世了。“看看谁在家里，请他们进来。”他在书房中为出席晚间的鸡尾酒会进行准备时，常对招待员这样说。有时招待员告诉他：“对不起，总统先生，家里没有一个人。”他经常独自一人用晚餐，饭后很早就睡觉。因为这么多的老朋友都不在了，总

统竭力地设法扩大自己的圈子。他总是喜欢周围女性，因为他可以向她们开玩笑，调节一下孤单的生活。

德黑兰会议从 1943 年 11 月 28 日开到 12 月 2 日，在忙忙碌碌的四天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用饭时都进行着磋商，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几次。罗斯福与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斗将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前后进行。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战斗发动一次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战争，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顶峰。罗斯福胜利地返回华盛顿，确信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已经奠定，“英国、俄国、中国和美国以及它们的盟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他在一次轻松愉快的炉边谈话中对全国人民说，“只要这四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侵略者就不可能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

罗斯福在萨布兰卡和德黑兰使美国走上领导全球的道路之后，重新提出了“新政”的开明议程，要求制定一项经济权利法案。总统在 1944 年 1 月 11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称：“除非国内安全，否则全世界就不能实现持久和平。”这些权利通用于所有的人——“不以个人地位、种族和信仰为转移”，——而且权利的范围很广泛：一、人人有权从事有益的、有报酬的职业……二、人人有权获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以及娱乐；三、每个农民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其本人和家庭过富裕生活；四、每个商人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从事贸易活动；五、每个家庭有权拥有豪华的住宅；六、人人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七、人人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八、人人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

人人都认为，经济权利法案是 1944 年总统竞选的前奏。除了罗斯福本人可能表示怀疑以外，没有任何人在罗斯福竞选第四届总统方面表示怀疑。“我真不想再竞选了”，那年年初罗斯福对海军上将李海说。他很想退居到海德公园去扮演政界元老的角色。到他的本届任期快满时，他在白宫执政已有 12 个寒暑了。这时他 62 岁，显露出积劳成疾的迹象。他眼眶下边的黑圈一直就没有消失；他点香烟时手抖动得更明显了。格雷斯·塔利说，有时他一边看信一边打瞌睡，醒来时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罗斯福近来容易患呼吸道疾病，在德黑兰染上了感冒，他不断咳嗽，面色憔悴，并且说觉得疲劳。1944 年 3 月底，他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们发现他心脏逐步扩大，高血压，还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他们建议他减少工作量，少吸烟和采用减轻体重的食物。

在圣选戈附近彭德尔顿营预定举行的一次阅兵式之前，吉米·罗斯福正在同他父亲谈话时，父亲的脸色忽然变白，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吉米，我不晓得我还能不能出席阅兵式——我疼得厉害！”他低声地说。小罗斯福吓坏了，想去叫医生，但是总统说，这只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他躺在普尔门式火车卧车的地板上，闭上眼睛，他的身体有时疼得痉挛起来。过了十分钟，罗斯福要他儿子把他扶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到了阅兵场，脸上露出了平常那种轻松愉快的笑容。总统从珍珠港回来后过了几个礼拜又向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的许多工人发表了讲话。罗森曼听见罗斯福讲话时的颤抖的声音，心里十分沉重。他担心总统竞选不成了。总统告诉布鲁恩，在他演讲的头十五分钟，他的胸部感到剧疼，已经扩散到两肩。但从讲完话后马上做的一个心电

图上看不出什么异常情况。

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取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和往日一样，选举团的表决是一边倒的，结果是 432 票对 99 票，但是选民投票的结果却是罗斯福历次总统竞选中最势均力敌的一次。他获得 2560 万张票，杜威得到 2200 万张票。对总统来说，选举中最令人宽慰的事情大概是选民以压倒优势抛弃了孤立主义。在全国各地，选民们再也没有选举两党中具有孤立主义记录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富兰克林·罗斯福始终是一个拘泥于形式的人，为了答谢杜威的贺电，他在那天一直等到深夜，但是贺电没有送来。罗斯福后来对一名助手说：“我仍然认为他是个畜生。”

1945 年 1 月 20 日，即是罗斯福的 63 岁生日前十天，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流宣誓就职，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短暂而且最阴沉的就职仪式。他也许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坚持要他的 13 个男孙子女孙和外孙外孙女都来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当时没有游行，也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罗斯福是在白宫南门廊而不是在国会宣誓就职。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发表了不到五分钟的讲话。他期望着即将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晤，在讲话中提到了他的指导原则：“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能单独生存于和平环境之中的；我们的幸福取决于他国——遥远的国家——的幸福。……正如埃默森所说的那样，我们认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

两天之后，他启程前往雅尔塔。

1945 年初，三巨头举行雅尔塔会谈已经刻不容缓。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已经稳操胜券。德军在西线发动的孤注一掷的攻势已在一个月前的凸出地带战役中被击退。美国部队刚刚攻克马尼拉，美国轰炸机正在轰炸日本本土，但是，盟军不攻占日本本土岛屿，就不可能结束太平洋战争，因为按照绝密的曼哈顿计划研制的原子弹还没有经过试验，能否试验成功尚无把握。解决以下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战败的德国前途；波兰问题；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地位，联合国组织和远东问题。

在为期八天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目标是使苏联加入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并诱使苏联作出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对苏联来说，由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德国入侵，高于一切的考虑是在东欧建立一个安全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承认俄国控制东欧的合法性。事实上，1944 年 10 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谈上，丘吉尔曾用数学方式在一张纸上写出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指导方针，他建议，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 90%，在保加利亚占 75%，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势力同英国相等，在希腊占 10%。斯大林当场表示赞同，后来罗斯福也表示赞同。

1945 年 2 月 11 日，罗斯福怀着三大巨头继续团结的乐观情绪离开雅尔塔。“我们确实从心灵深处意识到，这是我辈一直祈求的新的——一天的黎明”，哈里·霍普金斯说，“俄国人已经证实，他们能够通情达理，并具有远见卓识。罗斯福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毫不怀疑我们能够同他们和平共处。”

春天，佐治亚的乡下生机盎然。小白宫旁边开满了一簇簇白色、粉红色和黄色的杜鹃花。蓓蕾已经悬挂在松树山下的桃树枝头。1945 年 3 月 30 日耶稣受难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抵达温泉，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消瘦不堪，连老朋友们的问候都顾不得答理了。复活节做礼拜时，总统把眼镜掉在地板上，接着他又把祈祷书掉在地板上，丝毫也没有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第二个家园的那种无穷的魅力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恢复。

总统对布鲁恩大夫说，4月12日早晨醒来后，他的头部有点疼痛，脖子僵硬。而这位大夫和罗斯福的表妹戴西·萨克利和劳拉·德拉诺却认为，出乎意外的是，他的脸色很好。他打算干一天工作。那天傍晚，他将参加为他举办的一次野外宴会，他还答应去观看温泉的一些年轻病人上演的一场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歌唱表演的彩排。几天前，拉瑟弗德夫人已偕同艺术家伊丽莎白·舒马托夫女士从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艾肯抵达温泉，她委托舒马托夫女士画一幅总统的水彩画像。

舒马托夫女士进行速写；拉瑟弗德夫人默默地坐在一扇窗户旁边，能够看清罗斯福的面庞，她的脸上流露着温柔的笑容。劳拉·德拉诺跑来跑去；萨克利小姐坐在沙发上钩编织品。快到一点钟，她一边干活，一边抬头张望，只见罗斯福在寻觅什么物品，他的头部往前倾，他的双手在膝上乱摸。她走到他跟前，跪倒在地上，抬头望着他的脸问道：“您是不是把纸烟掉了？”

“他朝我看了一眼，疼痛得蹙起前额，想勉强地流露出笑容”，萨克利小姐后来回忆说，“他用左手摸着后脑勺说：‘我的后脑勺痛得很厉害。’他吐字很清晰，但是声音低沉，我想他人也许听不清楚。我告诉他把头靠在椅子上，但是他没法把头抬起来。这时，劳拉·德拉诺从她的房间回来，当他向前倾斜时，我们把他的椅子拉了回来。拉瑟弗德夫人和劳拉二人扶着椅子，我伸手去拨电话，请电话员叫布鲁恩大夫赶快到总统别墅来一趟。”

他们把不醒人事的罗斯福从椅子上扶起来，在光亮的地板上托着他的斗篷抱着他从惊恐万分的妇女身边走过去，来到附近的一间卧室里。罗斯福浑身冷得发抖，出汗过多，大约15分钟后布鲁恩大夫来了。他诊断后说，罗斯福患了严重的脑溢血，并采取了急救措施。罗斯福始终没有苏醒过来，但是在这个别墅里谁都可以听得见他那紧张的呼吸。舒马托夫女士和拉瑟弗德已经走开了，一批工作人员和亲友在起居室里焦急不安地守候，大家都默不作声。格雷斯·塔利翁动着嘴唇，喃喃地祈祷。下午3点35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了。

